

目 录

文 献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张闻天(1)

回 忆 录

- 从梨园口到尾星峡
——记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刘 琦(21)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李 锐(28)
在庐山会议上 万 毅(56)

专 题 资 料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
问题政策的由来及发展 杨亲华(65)
改革开放在浦东 徐建刚(81)
改革开放在珠海 刘利亚(93)
改革开放在厦门 黄顺通(109)



会议介绍

遵义会议 佟 静(119)

大事记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发展大事记(之三) 编写组(128)

史实考订

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
..... 钱昕涛(194)

小资料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
开展的反腐化斗争 叶成林(20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张 闻 天

(1945年5月2日)

代表同志们！本人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我党二十五年来三次大革命的实践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又一辉煌的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全部方针，已经被二十五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尤其是抗战八年来的实践所证明了与证明着的唯一正确方针，这方针不但已为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所拥护与实行，而且也为国民党区与沦陷区内广大人民所赞成。因此，这总结，一方面成了我党在革命现阶段的战略与策略的行动指南，而且也成了动员与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共同奋斗的战斗纲领。这是我党与全国人民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我们必须加以切实的研究与坚决的执行。

对于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我也完全同意。

因时间限制，我只能就毛泽东同志这个报告的最后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作了检讨自己过去所犯错误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体会的发言。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会议印发的草稿刊印，略有删节。

一段,发表一点意见。

在政治报告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同志用最简短与最精练的语句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作风,就是我党二十五年来建党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我党以后建党的方向。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作风,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作风。应该说,这种作风在党内经过了长期的斗争过程才被全党所公认,才能作为全党的建党方向,而提出到全党同志的面前。

我们党内曾经存在过,现在还多少存在着,而且在个别时期甚至统治过全党的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党内的一种歪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歪风的特点,正和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相反,正是理论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作风。而本人曾经在长时期内即为这种小资产阶级作风的代表者之一。

我曾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曾经以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资格参加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入党后,主观上虽是曾经决心做一个良好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但是我的这种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品质,并未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被加以彻底改造,就被送到莫斯科学习去了。因此,我当时多半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而是以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我当时还缺乏“全心全意为中

国人民大众服务”的深刻的观念。我当时还缺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为中国人民负最后与最大责任”的深刻的观念。因此，我当时还缺乏学习只是为了更能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学习，即“学以致用”的深刻的观念。相反的，我的学习态度，却只是为学习而学习，却只是为个人获得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而学习，为个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学习。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习态度，自然决不能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也决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结果，也正是这样。首先，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却反而把它当做了教条。我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并未领会其实质。我满以为我只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就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不懂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南，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相反的，一种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产生了，我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中国的事情就不值得研究了。其次，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反而使我背上了一个包袱，反而使我自己骄傲自大起来了。我满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依照这些词句来办事，中国革命就会很快得到胜利。我把中国革命看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从未想到中国革命有什么“残酷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因而，第三，我对于中国党内的领导同志，尤其是那些犯过错误留在莫斯科的同志，起了一种轻视与不信任之心；同时“物以类聚”的原则，使我和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同志发生宗派的结合了。这就是我的教条主义、盲动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之由来。这些错误，自然应该由我

自己负责，由我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品质负责，而决不能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来给我负责，因为他们都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做教条的！当然，共产国际在中国内战时期对于中国党的指导，也有错误的地方，它的七次大会已经做了自我批评，其错误所在，如像曼努依斯基所说的，“大半是宗派主义性质”，“把一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机械的搬到别国共产党中去”。我们的任务是在发展我们的自我批评，而不是在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

无疑的，四中全会后教条宗派的胜利，实是我们一类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胜利，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的胜利。四中全会“意义”的“伟大”亦在此？！这胜利，不幸给我造成了大大发挥自己错误的机会。我回国后不久（“九一八”前后），即被指定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这一超级的提拔，更增加了我的包袱，更增加了我的骄气，更使我糊涂了。我当时并未想想我有什么本领负责中央工作，反而觉得这是自然的，应该的。我当时毫未觉得责任之重大，事情之艰难，自己之力不胜任。因而我参加临时中央后，我毫无兢兢业业、谨慎将事，为中国人民负起最后与最大责任之心；却居然根据一点书本知识，及一些错误的决议，自以为是的发号施令起来了。当时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已经决定了我们以后失败的前途。

我们的这种理论与实践完全脱离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自然也使我们脱离了党内同志与党外群众，自然也不能使我們有任何自我批评的精神了。我们完全没有去考查我们的主张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是否为中国大多数

人民所同意,是否为全党大多数同志所拥护,然后以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对革命负责者的态度来纠正自己的一切错误。相反的,我们为了贯彻我们的错误路线,却一意孤行,并且还在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狭隘经验论”等的口号之下,完全错误的打击了党内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与富有中国革命经验的领导同志,大大的发展了宗派主义。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今天在这里,应该向一切当时被我们所错误打击的同志赔不是,我声明当时的机会主义者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左”倾路线者。此外,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与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的优秀同志受到了诬害。这实在是党的不能补赎的损失。党的七中全会已经决定给他们以昭雪,是完全应该的。这种错误的领导,曾经给党与中国的革命造下了极大的损失。大会同志们对于这种错误的义愤,是完全应该的。就是我们犯错误的人,看着自己犯的错误,也很难受,然而已经犯下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对于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我是应该完全负责的,特别在发挥教条主义,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及后期苏维埃工作方面。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的品质,我对于中国人民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曾是我的错误所以发展的根本原因。

关于党的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一时期的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党的七中全会已经做了完全正确的总结,我不必重复决议上所指出的一切,因为对于那个决议,我是完全拥护的。我认为,这决议既正确地总结了党的历史教

训,又正确地解决了党内错误问题,把全党同志在最高度的原则下,在毛泽东同志思想与作风上,团结起来了。无疑的,七中全会这一决议,使全党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更加团结起来了,使全党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与思想上更加坚强起来了。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的贯彻与实行。这是我党的伟大胜利。任何企图利用这个文件来进行挑拨离间的阴谋,是断然不会成功的。但是我们“左”倾错误路线的负责者,对于这种挑拨离间的阴谋,应该好好的警惕与戒备!

我应该说,我们对于党与中国革命在一个时期的危害,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对于党与中国革命,曾起一种怎样的破坏作用之生动的与具体的说明。不克服这种思想与作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遵义会议后(实际上我从长征开始,即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在中央内部反对当时中央的另一部分同志的军事路线),一般说来,我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故没有发生路线错误问题。在这个时期,我的政治上是有进步的,工作上也有些成绩的,但错误仍然有。主要的为:(一)关于过去“左”倾错误路线的估计问题,我在一九四一年中央九月会议以前,始终只承认是许多策略上的错误,而不承认是整个路线的错误。这表示我对过去“左”倾路线的错误认识不足。(二)对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忽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后,国民党在边区闹乱子,没有及时注意。对边区各种工作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这是对不起边

区领导同志与边区老百姓的地方。(三)十二月会议后,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员及非党员有自由主义倾向,只强调其好的一面的团结,而未注意其坏的一面的斗争。这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坏影响得以发展。(四)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内干部教育中教条主义倾向的发展等。……过去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作风没有彻底纠正,实是这些错误所以能够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种思想方法与作风的存在,自然使我不能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的重要性,而提倡在全党内加以研究与宣传了。在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当时是被我们所代表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所排挤、所抑制、所冲淡,而不能在全党内有力的与顺利的推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的坏影响,特别因为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分子的入党,到一九四一年变成极其严重了。当时如果不进行斗争来克服它,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党的车子就不能继续前进一步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自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即在他《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公开提出了同主观主义的思想与作风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我认为,这三年多来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整风运动,向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与作风展开全面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正确的。

我个人对于整风运动的意义的了解是比较迟缓的。

一九四二年全年，我因为出发了^①，实际上没有参加整风。真正参加，还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中央内部开始整风之后。所以我对于整风运动的意义的了解还是不多的。但是我想把我个人在整风运动中所得到的这一点切身经验，在这里谈一谈，请同志们批评指示。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因而妨碍了我在思想上与作风上的进步。骄傲的态度，即是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拒绝进步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整风运动，在改变我过去这种骄傲态度上，实在给了我莫大的好处。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的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良药苦口利于病”的这句中国俗语，实在是很有道理的。而且现在我觉得，药性愈猛，作用也愈大，虽有点“副作用”，也不要紧。

由于外力的推动与帮助，我开始反省我自己的一切错误，我开始严厉的批判自己，我开始抛弃自己的包袱，我开始虚心了。但是如果说，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没有内心的矛盾，毫无悔恨与不平的情绪的交替，一句话，毫无一个痛苦的过程，那我不是在说真话，而是在说谎。相反的，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

^① 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经中央批准从延安出发赴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调查，1943年3月3日返回延安。

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用空洞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自己从天上直摔到地下。一句话，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抛弃我的小“资产”，使自己变为“无产”者。这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灵魂说来，当然是非常痛苦的，然而不使它痛苦，它就肯轻易地把它的宝座让位给无产者吗？！

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慢慢的在斗争中占了上风。我终于慢慢虚心起来了。我开始认真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了。而且我觉得，我愈是虚心，我愈能接受批评与发展自我批评，我的进步亦愈快。虚心的态度，就是老实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人以为谦虚的态度是一种“客气”的虚伪的态度，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就是老老实实的思想与作风，实事求是的思想与作风。我如果没有这种虚心的态度，我就决不能学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因而我决不能前进一步，因而我就决不能很好的为人民大众服务。

我想，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必须说，骄傲态度是阻碍我们共产党人向前进步的第一号敌人。它使我们不能接受批评与发展自我批评，因而它使我们闭塞，使我们耳不闻目不见，使我们不能接受一切新鲜的事物，使我们装腔作势，使我们不务实际，一句话，使我们发霉，使我们腐化，使我们犯主观主义错误。我想，像我们这类错误很多的同志，当然不应有任何的骄傲，即对于那些错误较少的同志，也不应该骄傲。因为，为人民大众服务，原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任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得好，原来是我们的责任，骄傲是错误的。相反的，如果我骄傲了，我就不能

接受批评与发展自我批评,我就不能为人民群众很好的服务,我就不能很好的做一个共产党员。因此骄傲的态度,不是共产主义的态度,而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最好的共产党员,决不应该有骄傲的态度。

我深深的感觉到,容易骄傲常是我们一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的一大弱点。因为“骄必败”,已经成了历史上的一般规律。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这次报告中,谆谆教导我们“戒骄”之必要。不但我们对于个人的知识与成就不能有任何的骄傲,即我们对于我党今天所得的成就,虽然是空前的,也不应该骄傲。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同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来比较,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所已做的事情同我们将来要做的来比较,那我们所知道的与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渺小呵!我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我想,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模范,是毛泽东同志。他为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所爱戴,他受到无数的歌颂与赞扬,但他始终是谦虚的,始终愿意当群众的小学生,始终孜孜不倦的学习着,始终像生龙活虎一般的进步着,因此,他能够无愧为我们的领袖,无愧为人民的领袖。领袖而骄傲就会不成其为领袖了。在共产党内一切因一时成功而骄傲的“领袖”,是已经都被历史淘汰了的。

在整风运动中,我又深刻的感觉到,即使我们开始以虚心的态度来学习了,然而这种学习的进步还是不容易的。要在实际行动中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要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要使这种思想与作风变成我的血中血、肉中肉,实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说,我只要在口头上宣布我承认我过去的一切错误,只要我在口头上说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我在实际行动中就可以真正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学生,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那我不是在说真话,而是在说谎。我曾经在某一个问题上自以为我了解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后来一次二次的反复证明,我的了解是不对的。我曾经在某一种作风上,自以为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作风,但后来无数次的证明,我并没有学到多少。一种伟大的思想与作风的学习,必须要有长期的思想上的奋勉,及长期的实际工作中的锻炼,才能慢慢的有所进步。这里,牛皮是万万吹不得的!过去我们那种以不知为知,以假知为真知,以人知为我知,以小知为大知的,不做精密的调查研究的夸夸其谈的作风,实在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指示的“不偷、不装、不吹”的老实作风,来代替我们过去的那种虚浮与空谈的作风。我想,只要我是在工作中进步着,那末即使我的进步迟慢得像蜗牛的爬行一样,也是不足为耻的。但是,如果我毫无进步,却反而装出我有进步,甚至很有进步的样子,那或许反而是可耻的吧。

我想,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必须说,为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我们必须力戒小资产阶级的轻浮的与急躁的态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风,不但需要在思想上精通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而且必须表现在实际行动上。我们必须讲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而做的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首先就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因为言行一致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的本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测量我们究竟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到了何种程度。而要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轻浮与急躁的态度，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态度只能产生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像我们过去的那种“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言行不一致的假马克思主义。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传布，曾经使我们既欺骗了自己，又欺骗了别人。欺骗自己固然要不得，欺骗别人，尤其不应该。所以我说，我们应该认识，在实际行动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这件事情的不容易，因而应该以郑重的与谨慎的态度，来对付这件事情。同时，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以虚心的态度，以郑重的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的思想与作风，就会慢慢的建立起来，而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就会慢慢的被克服。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像我在前面说过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思想与作风，它无限深刻而同时又是无限浅显，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的去学习，我们是可以慢慢的学到一点的。

我深刻的感觉到，轻浮与急躁，也常是我们一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的一大弱点。因为“欲速则不达”，也已经成了历史上的一般规律。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这次报告中，又谆谆教导我们“戒躁”的必要。这在处理学习问题上是如此，在处理一切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复杂与麻烦的事情，不采取郑重的与谨慎的态度，是决然不会成功的。这不只是关联到个人工作的得失问题，而是关联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亡

党、亡国、亡头”的问题。我们只要马虎一点，成千成万人的血就会因为我们的马虎而白流的。所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也就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我们在这方面的模范，仍然是毛泽东同志。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历来采取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够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以他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加以发展。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问题的处理，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不为自己的与群众的一时的感情冲动所支配，他不受“激将法”的挑动，他不会“一触却跳”而丧失自己的理智，他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搜集材料，善于吸收各方面关于某一个问题的各种意见，而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他善于反复考虑一个问题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权衡其各个方面的轻重，并且善于等待其成熟后，然后加以处理，他不处理不成熟的问题。正因为他能如此郑重的与谨慎的处理每一个问题，所以他能比较正确的解决问题，所以他成功多而失败少。这次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的经过，就是他怎样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方法的范例。这是真正对人民负最后与最大责任的态度。

在整风运动中，我还深刻的体验到，浸透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的全部精神，就是他在这报告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向人民负最后与最大责任”的精神。我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必须首先把握他的这种精神，清洗一切教条主义与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残余，然后我才能使这种学习不是为了

夸耀于人,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我才能不重复过去教条主义的学习的错误,而真正能够把自己所学习的一切,奉献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又真正能够根据人民的利益,根据革命的实践,来考验自己的思想的正确与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过去,我们教条主义者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我们只想到为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服务,只想到强迫人民来适应于我们的教条和我们的感想,而不是相反。这完全是把事情颠倒过来了,那能不把事情弄糟?!

所以我在整风运动中常常想,加入了共产党这么久,对于“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还不是那末清楚的。我还值得把这个问题再三再四提到我自己的面前,来审查自己的一切言论与行动。惭愧得很,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试,我是常常不合格的。口头上,我们常常说,一切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实际上则并不如此。我们常常为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影响,而把工农兵大众,我们的母亲,忘记了。只要我们一忘记我们的母亲,我们就会犯错误,闹乱子。因为那时,我们的思想就被闭塞了,我们只有凭个人主观的思想与要求来办事;因为那时,我们考验我们思想与要求之正确与否的尺度就丧失了,我们就无法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了,我们就迷失了方向,我们只有乱干一气了。毛泽东同志曾经用最通俗的话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方

方法论，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指我们的一切思想与行动，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群众是我们的出发点，群众也是我们的归宿点。毛泽东同志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也就是指明这个道理。人民大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我们正像毛泽东说的，只是“人民的勤务员”！

所以，我想，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必须说，真正在我们头脑中建立起“群众观点”，还是我党当前的迫切任务。只要把这个“群众观点”真正建立起来，那末，我们的骄气就可消失了，轻浮与急躁的态度就可改正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就可没有了，一句话，我们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自然要让位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的本质就是脱离群众。

这方面的模范，也是毛泽东同志。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他的脑筋中找不出个人的私心私利。他把一切奉献给了人民！他所以能够那样谦虚，那样谨慎，因为他知道不如此，他就不能为人民很好的服务。为了人民，他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这是从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血肉中生长起来的稀有的与杰出的伟大的人格！在这样伟大的人格前面，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因为他是我们的，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他是我们的领袖！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我们应该怎样的需要向他努力学习

呀！

这就是我在整风运动中所得到的认识。我想，我以后必须以虚心的态度，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以达到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这点认识或许就是我在整风运动中的一点进步吧。然而我扪心自问，究竟我的认识对不对，实在不敢说。在这里，我只是想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一点的认识，至于对不对还要请同志们来批评与指示。而且我在以后实际行动中究竟能够做到多少，也还待以后事实的证明。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不过，无论如何，我必得继续努力求得更多一点的进步。我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党一定会继续帮助我，改造我，使我多多少少能够为党与人民多做一点工作。在任何工作岗位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党为人民服务以赎前罪于万一的决心，我仍然是有的。老实说，从我入党那一天起，我就有过这种比较抽象的与模糊的决心，否则我就不会入党。然而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品质没有根本改变，我走错了路，我辜负了党与人民。现在，回过头来，再来重新开步走，虽是已经很晚了，然而我想，也还来得及。而且除此以外，也无别的巧妙办法了。我姑且把自己过去的错误，当做一个经验来安慰自己与鞭策自己吧。当然，我仍然不能担保，因为我过去犯过了错误，因而以后我就能不犯错误。我只能担保，我以后必须力求少犯错误，如果又犯了，力求纠正的更快些。这自然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究竟能做到多少，仍然是疑问。然而我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之下，只要我诚心诚意的接受领导，做一

点局部工作,我的这个愿望或许是能够实现的!这也算是一点自信心吧!

我认为这三年来全党的整风运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的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一大发展。不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去战胜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不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把“五湖四海,九州万国”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用思想教育的火炉加以熔化,使他们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接受与实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报告中特别强调的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认为: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来教育全党同志,应该是党内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整风以前,我们党的宣传机关曾经没有能够领导干部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进行深刻的研究,没有在全党内广泛与深入的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这实是我党过去工作中的一大缺陷。在这方面,我自然也要负主要的责任。像我在前面所说的,三风不正,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态度,曾经妨碍了我去进行这一工作。我应该老实说,我在整风以前,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对于它的重要性的估计是很不足的。自整风之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开始为全党同志所研究与宣传了,但仍然不够。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去研究与宣传。为此,我想,我

们必须在全党内,建立这样一种观点,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是全党同志必须学习的课程。毛泽东同志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行动家,而且也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

我想,我们必须最后抛弃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以为中国不能产生马克思与列宁这类伟大人物与马克思主义这类伟大的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且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无产阶级已经得到胜利的这样革命的国际环境中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伟大中国,既然蕴藏着这样深刻的内外矛盾,而同时又有着这样短小精干的无产阶级与最广大的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结合着来解决这样的矛盾的巨大的革命力量,在这样肥沃的土地上散播的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经过三次革命的实践,而开出中国自己的光明灿烂的马克思主义的花朵——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生长起中国自己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那是丝毫也用不着奇怪的。而且应该说,这是必然的。二十五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给了我们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做了证明,使我们有完全的根据说: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策略。

我想,我们不应该否认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我们不但不以此为耻辱,而且以此为光荣。中国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自己的理论与策略,就是我们无产阶级

与全人类解放的旗帜，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掌握这个锐利的革命武器。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同志不但继承了，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中放进了特别的与新的东西。在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有过不少的贡献，列宁与斯大林则更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列宁尤其是斯大林，曾经对于中国大革命在理论指导上，有过很大的贡献。然而，中国的革命的指导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负完全的与最后的责任——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一经结合，产生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那完全是当然的，完全是应该的。我们只要略举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等等，我们就可了然，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怎样的充实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真理，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在全党同志头脑中建立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而就在全党同志前面，提出了必须学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

想的任务，因而在全党的宣传机关与全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前面，提出了研究与宣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的任务。

我想我们全党同志都高兴，我们党今天有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即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我想我们全党同志都高兴，我们党今天有了我们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实是我党二十五年来来的最大胜利。这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苦难的中华民族，在百年来长期的与流血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产生了一个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找到了一条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路线——毛泽东路线，实是中华民族的幸福与光荣！

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坚强有力，是由于它是已经经过了二十五年来三次革命的考验，经过了全党同志的考验与千千万万人民的考验的路线与思想。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为他们的领袖，并且深信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是完全正确的。人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历史的结论也是不会错的。

同志们！这次大会是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大会，也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大会，我们全党同志应该紧紧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以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中央的周围，在他的领导之下向着胜利进军！

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从梨园口到星星峡

——记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刘 琦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加上总部机关共21000余人,先后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于11月上旬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为便于统一领导,领导机关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军在甘肃境内河西走廊的进军途中,与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数倍于我之敌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浴血奋战,用无数英烈的鲜血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一页可歌可泣的悲壮史篇。

1937年2月倪家营子战斗以后,3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总指挥把我(当时我任总指挥部情报科长)叫到他的指挥部,问:

“有无祁连山地图?”

“有,是一个月前调查时绘制的草图。”

“拿来我看。”

我回去迅即将草图呈上,徐总指挥边看边问:

“有无祁连山向导?”

“有,是个少数民族,一个月以前物色的。”

“可靠不可靠?”

“以上宾待之，感情相处很好，并给了他一套少数民族服装，一支枪，一匹马。”

徐总指挥接着说：

“今晚行军集合时，你带向导到集合地点找我。”

当日未下达行军命令，从行进的方向，知道要进祁连山了。徐总指挥边走边问山里的情况。

入夜，红三十军历经血战保留下来的部队从梨园口进山，宿梨园堡。这是个不大的镇子，约有近百户人家，依山筑有围墙。部队立足未定，敌军即衔尾追来，包围了梨园堡。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突围再次被迫向深山转移。在行进的路上，曾传六、黄火青和我同行时，遇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他叫我们留下随三十军行动（当时总指挥部机关干部统统编入干部团）。不几日，传出消息说，中央同意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李先念为副书记。

部队沿祁连山脉西进的途中，敌情不明，路线不清楚，食粮发生极端困难。一天傍晚，李先念政委要曾传六（当时任西路军总部保卫局长）、黄火青（当时任西路军九军政治部主任）和我三人一起，先行一步，设法解决食粮、路线和向导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心中无底。历史上清朝的军队对这一带回族的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回汉两民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加之敌人对红军进行造谣诬蔑，使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皆闻讯逃避，给我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

我们三人行至一个山顶上，天将黎明时，议论奔向何方，一种意见主张待天亮后在山上观察，哪里有情况就奔

向哪里,另一种意见认为游牧民族熟悉当地情况,当发现他们时,我们下山,他们早已跑掉了。商定兵分两路,曾、黄二人在山上观察,由我带一名警卫员下山去闯。

我和警卫员拉马下山后,天已黎明,忽然发现路面上有模模糊糊的羊、马脚印和未干的羊粪蛋,判断畜群离此不远,随即沿着这些脚印痕迹摸索行进,猛然间,山口的山顶上有人向我们开枪,并大声高喊。我们驱马加鞭向山沟里急驶,果然有百十只羊和一些马在山沟的尽处,当一个牧民抱着一个幼儿正要跨马逃走,我们赶上去把他拉住,他拿利刀向我们刺来,我的警卫员上前把刀夺下,不得不将他捆绑起来。纵观四周,临近山顶上有数十人,如果这些人下来,我们只有两个人就不好对付了。我看守着人,令警卫员尽快把羊群往回路上赶,可是羊、马不听使唤,来回打转,我生气地说,你来看守人,我来赶羊。我赶也是赶不动,经过亲身经历,方知牵马赶羊并非易事。正在为难之际,忽然三十军的一个参谋(因他有点耳聋,大家都叫他聋子,名字忘记了)骑着一匹骡子顺路而来,不禁喜出望外,要他立刻回去报告,火速派部队来。就这样,食粮问题暂时解决了,也是出山前解决食粮困难的唯一一次。

这个牧民被带回来以后,不吃不喝,哭泣不止。因为语言不通,只得用手势等向他示意说,出于无奈,才把羊、马杀掉吃了,并当即取出金锭给他作赔偿,他坚不收受,看表情是对我们不信任。可是,当他观察到我们与原来的那个少数民族向导亲密无间时,态度稍有缓和,经过再做工作,主要是在生活交往中来感化他,他的疑虑解除了,

金锭也收下了，流露出一种信任和喜悦。待他情绪稳定后，我们便同他促膝而谈，用打手势，就地摆石子的方法，来确定地名、位置、地形、河流等，绘制成草图。他还答应作向导给我们带路。食粮，路线和向导这三项任务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了。先念同志等都非常高兴。

部队仍继续西行，在草图的前进路上有悬崖峭壁，车马难以通过。我向先念同志等提议：部队在原地露营，我和警卫员、向导连夜搜索前进，沿途设路标识别，如果有敌情或牺牲了，他人立刻回报；如果无法通过，立即回转；如果可以通过，就地等候。就这样，我们三人骑马先行，当到达有障碍地点时，虽然山势奇陡，但尚可通过，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就地休息等候，中午时分，部队到达了。

我们一直在高山气候中行进。征途中困难一个接一个，在迷失了方向之后，我们艰难地爬上一座山顶。山上，狂飚呼号，卵石滚飞，寒光照单衣，气短腹中饥，令人难以支撑；脚下，山岭像巨大的银蛇亘卧南北。原来，这就是地理上的分水岭，乃祁连山最高峰，海拔 5500 多米，依此来判断我们所在的位置，山外对面便是肃州（酒泉）。

部队西行到石包城以北一个地方时，来了一个自称是国民党某县党部书记长的人，持有一封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程世才、李先念等人的诱降信，并威胁说，如果不投降，则要如何如何。当我们询问安西城内情况时，该人说，刘呈德骑兵团已到达城内。我们半信半疑，仍继续向安西城行进。在到达城边时，城墙上枪声四起，敌军出动，把我军包围于城边的村庄里。这是出山以后与敌遭

遇的第一次战斗。看来，继续西进的道路已被封锁了。这时，李卓然同志找我谈，要设法找到一条西进的路。安西城西有一条疏勒河，河面不宽，但河底淤泥甚厚，人畜过河下陷，不能跋涉。我派出一个得力的侦察员，找来一个过去走私的人，他说，离此不远的河底铺有一条很窄的石子路，走私的人从这里偷偷涉水而过。当晚，我们在这条走私路边插上标记，部队撤出战斗，从这里过了河。

过河后，进入一个三角地带。因为这里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一些老财们因战乱携带家属和财物躲在这里避难，却万万没有料到红军要从这里过河。第三十军首长立即下令：不准没收和抢占这些人的财物，违者严惩，部队很快从这里直插安西至星星峡之间的红柳园子。

4月26日黄昏之前，我军尚有800余人到达红柳园子，与跟踪而至的敌人骑兵展开最后一次激战，大家分头突围，一些同志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军未予追击。事后到了新疆才了解到，甘肃的马家军曾同新疆的盛世才订有密约，以红柳园子为界，越界者必遭反击。因此，马家军深恐中伏击，未敢对我追击。

当时冲出包围圈，会合在公路边上的一些高级干部中，有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黄火青、苏井观、宋侃夫等及其随行人员和我，当大家一起商量今后的走向时，我建议向山里走，这样敌人要想捉我们就不那么容易，而如果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人骑兵一追，难免遇难。大家同意，决定由我带路再进山区。这里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一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大家衣服里长满了虱子，休息时便抽空捉害虫。戈壁滩上烈日当空，气候

极为干燥，又三天滴水未进，渴得嗓子象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难以下咽，既渴又饿。这是进戈壁滩前我没有料到的。回想当年过雪山草地时，没有干粮，还能以野草充饥，一时还不致饿死，现在几天滴水未入，相比之下，更难以忍受。就在这时，忽然看到远方有一片淡绿色的汪洋大海，大家高兴地奔去，走到跟前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又是一片汪洋，于是认为走错了方向，又往回奔，仍然是一场空。两次奔跑，大大消耗了体内的水分，疲惫已极。静下来一想，莫非就是“海市蜃楼”！在无可奈何时，一位同志的马不见了，他去找马，发现这匹马嗅到了水，于是马上回来告诉大家，立刻奔向这个有水的地方。这是一个方圆约十几平方米的积水潭，深处不足二米，水面上绿苔丛生，孑孓在水中游动。见到这救命的水，同志们的兴奋之状难以言表。大家喝足吃饱后，苏井观同志幽默地说，我这卫生部长也不讲卫生了。

大家边休息边商定：奔向星星峡。当时由于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不准备在新疆久留，仅准备做匆匆过客。为预防万一，便各自编造自己的身份，如医生、文书、马夫等。行进中隐约看到远处两山环抱，中间洞开，顾名思义，知道这里就是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忽然看见对面开来一辆大卡车，莫非是敌人搜索来捉我们？！先念政委命令：立刻卧倒，准备战斗。汽车上的人发现我们后，立即停止前进，并手摇红旗向我们示意。这下子把我们弄糊涂了，红旗是我们的红旗，难道是敌人施计谋来捉我们？！车上的人仍在原地摇动红旗。于是，先念向曾传六、黄火青和我说，你们三人前去探个明白，我们在这里准备战斗。接触

后,车上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副官,陈云同志已到星星峡,知道你们在山里,特地要我乘车来接你们。”为了弄清虚实,我们详细询问了陈云同志的年龄、说话的口音、身材等情况,以及已到达星星峡的同志们们的情况,经过对话和观察,方知确是自己的人。于是我们三人回身告诉其他同志说:“你们来吧,是自己的人,来接我们的。”大家乘坐这辆卡车到了星星峡。看到陈云同志时,每个人都不禁泪如雨下。陈云同志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党的财富,到后方好好休息,恢复身体。”次日,到达星星峡的400多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在一起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随后同乘汽车去迪化(今乌鲁木齐)。

从1937年3月12日进梨园口到4月30日抵星星峡,其间,整整49天。这是在人烟稀少、冷热无常、飞砂走石的高山和戈壁滩上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独身支撑的49天。也是诸位坚贞不拔、忠于革命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终于胜利地躲开敌人追击的49天。就此,写下了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李 锐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后,毛泽东将这件大事交给周恩来负责:一年抓几次。

回到北京,我忙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水利部原有一个工程局,于是同水电总局合成为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我也就到部里工作了(不久后被任命为副部长)。原水利部的大楼让给了总局。成立这个总局标志着原来两部之间水利同水电的矛盾,现在用同灶做饭这个办法解决了,可是在三峡建坝这样的问题上,仍难以同床同梦。

2月下旬接到通知,总理要亲自带队到三峡坝区考察,听取中外专家和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队伍是庞大的:有李富春、李先念,水电部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钱正英,科学院张劲夫,国家计委刘西尧,还有交通部、地质部的人,记得北京去的人还有胡耀邦。此外,长办的林一山、李镇南(总工程师)以及苏联专家们、四川阎红彦、湖北王任重等各部门有关工程师和专家很多,有好几十人。2月26日在武汉集合后,晚上,坐上一条新造的旅游客轮江峡号,向上游驶去。同我去的有总局两位水电老工程师:一位是陆钦侃,当时正派在长办工作,他曾在美国垦务局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规划;另一位是程学敏,是负责水电长远规划的,我去南宁开会时,带去的水电远景示意图就是

他赶制的。他们两位后来都是政协委员，一直参加三峡论证。

这批人大部分都没有去过三峡。在船上大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1956年2月，我曾陪苏联水电设计总院总工程师瓦西林可和水工设计院总工程师马洛歇夫去过三峡，他们是来检查长办苏联专家组的工作的。那次是同林一山和长办苏联专家及一批技术干部一起去的。沿岸重要地段和峡区的情况，尤其坝址等重大技术问题和流域规划问题，谈得很多，看得也比较细。两位专家回到北京后，还向周总理作过汇报。因此，2月28日，当船过荆江大堤和沙市时，周恩来等一行人都上岸去了，我没有去。听说周恩来还问到：怎么不见李锐？很可能以为我对荆江大堤不关心。沙市街道在堤下，长江悬在上面，高出堤外地面10多米，遇洪水时这一情景是很吓人的。当年水电总局的俄文翻译傅玉兰，写过一篇《随周总理踏勘长江三峡记》（刊《旅行家》1958年第5期）。她写到那天下雪，在离郝穴不远处，看了“安澜”铁牛和护堤工程。周总理特向尤林诺夫专家作了介绍。1780年修建的这种护岸导流丁坝，是中国古代水利专家智慧的见证。后来船过秭归时，曾暂停开会。周总理向苏联专家们说，这是中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离骚》等诗篇已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时任苏外交部副部长）译成俄文。到达南津关时，大家上岸游了三游洞。到美人沱和三斗坪坝区时，周恩来详细听取了地质人员的汇报，看了钻出的岩芯。水电总局专家组长尤林诺夫拍的一张照片——我站在总理身后一起凝视地质图，还有幸保存下来（这张照片曾随傅的文章刊出）。

这样一路下船勘查,上船开会,从2月27日起,3月6日到达重庆,一直由周恩来主持开会,他边听发言,边做记录,在重庆开总结会,由他作的总结。在船上一共7天,我同技术干部都住在“统舱”。因白天开会、谈话,又有争论,睡得很不好,那时刚过40岁,还能支持。我手头有一本长办1980年重印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会资料》第一辑——《历次会议文件选编》,该辑第一部分《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会议上发言汇编》(1958年3月15日编印),共辑有21篇发言。其中,第21篇是周恩来的总结发言,我的发言是第2篇。林一山和李镇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没有编印在内,所谓书面发言当是指《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当时已印发给大家。

这次周恩来率队勘查三峡,是三峡工程以如此规模进行的第一次论证,也是我最后一次在会议上参加此事的论证。记得大家的发言是比较畅所欲言的,作为历史资料,我愿意将之摘记下来。

最近,我在1959年第1期《七一》(湖北当年的理论月刊)上,找到林一山的发言,题为“三峡坝区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导问题”,内容完全是谈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区的比较选择。这个发言大概是他在船上先讲的,他当时极力推荐美人沱坝址。在具体分析两个坝区的各种复杂条件,包括地质、地形、施工布置、工程造价等利弊,加以比较之后,林一山说:“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外,在南津关建坝的造价,一般要比三斗坪增加15亿元”。面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突飞猛进的发展”,“机械地执行弄清南津关地质情况的任务,是否会迟误三峡的初步设计?”“目前的中心

任务是完成三峡的初步设计要点，而初步设计要点的中心问题又是坝区的选定。”因此，“中共长办委员会决定，三峡地质勘探中心应由南津关石灰岩地区转移到三斗坪火成岩地区。”发言还总结了三年来的经验：应纠正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论和片面观点，要克服思想方法的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还要预防今后可能发生的主观主义。

3月2日开会时，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首先发言。他着重谈了大坝的工程地质条件，可供坝址选择的河段共约45公里。上段25公里为花岗岩坝段，地质条件不复杂，从美人沱到三斗坪有5个可选坝址。此段江深枯水季节为18—60米。下段石碑到南津关，为石灰岩区，岩体被众多裂隙割切，也有很多断层，断层的破碎中有被方解石胶结的角砾岩，其坚实程度，对工程地质条件的评价没有直接影响，即无碍于建坝。但有一断层还未查明，这对南津关有严重影响。这个石灰岩坝段，遭受过非常强烈的喀斯特作用，因而形成的洼地、落水洞、溶洞，不论在地表或山体内部（钻孔揭露）都有。南津关口的三游洞，就是地表上很大的溶洞。因此，在基坑、导流隧洞和地下厂房开挖时，都难免发生各种困难，如岩体破碎、较大洞穴、乃至意外情况。目前做的地质工作还难将两个坝段作综合的优劣比较。从施工条件看，南津关靠近宜昌，北岸有20到30公里的施工场地；三斗坪距此有35公里。南津关大尺寸的导流隧洞，三斗坪围堰100公尺，这都是很大的水工建筑，很是复杂。混凝土工程量，大体估算，三斗坪为2700万立方米，南津关为2000万立方米。施工期估计10—12年。以混凝土工程量折算，三峡比当年最大的已建水电工

程,如美国的鲍尔德、大苦力,印度的巴克拉,苏联的古比雪夫、布拉兹克,要大4—9倍。工程造价估计80亿元。他着重说道:中国何时需要三峡的电力?以苏联的经验而言,全国发电量的年增长额,应大于这样巨型水电站电量的一倍左右。如年发电量为100亿度的古比雪夫水电站投入时,全国发电量的年增长额为175亿度。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发言最后指出:长江的重要支流,如岷江、嘉陵江、金沙江、乌江、洞庭湖水系的4条支流、汉江等,在规划要点阶段研究的不够。他指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应当将这些重要支流的规划方案,同三峡方案作一种比较。可是,林一山一直向他宣传,三峡方案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因此他不能不委婉地说了这么几句:“上面所讲的问题研究的不够,只是说明我的意思,不能说是我的建议;也就是说,有可能找到另外一些办法,既能解决防洪,又能满足发电灌溉等要求。”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发言之后,还有三位苏联专家发言,可是他们都对三峡有不同看法,不是促进派,因此,《发言汇编》中就没有编入。我幸存下来的旧档《工作笔记》1958年的一本中,记有他们讲的要点,都是针对《长江流域要点报告》只强调三峡而谈的。记得他们发言都在我发言之后。

电力专家组组长彼斯托夫斯基说:三峡工程技术上可能,期限由国家财力而定。输变电线路投资(如60万伏高压),可能接近三峡本身造价。此外,要同时解决用电户的布置及其投资,如果三峡本身投资是80亿,那么用户投资是500—600亿。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水电建设得少,

就是由于造价高,资金周转不过来。建这样巨型水电站,对缺少资金的国家不利,不如先建火电。有关三峡的工业布置,这只有国家计委才能胜任,长办不可能单独进行。在三峡建成之前,长江流域需要大量电力,从建水电来说,应当先由支流来解决,它们工期短还有防洪库容。因此应当研究整个流域规划,这是最为迫切的,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尤林诺夫曾担任过苏联电站部水电总局局长。他首先说,对长江各条支流和上游干流研究得不够。防洪措施是最重要的,但不能等待三峡。他认为三斗坪地质条件好;南津关则有其他优点,还不能放弃。像长江这样的大河流,大枢纽工程,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的安卡拉河、伏尔加河花了30年。有关的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楚,要深入研究,不要怕花时间,如5年,10年,建成三峡总是20年以后。因此,在修建三峡之前,需要开发支流;这样,逐渐减少宜昌以下洪水,并减轻长江中下游洪水压力,同时可解决支流本身的防洪问题。支流本身防洪,是三峡无能为力的。规划必需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他希望长江水利委员会尽快研究支流第一期工程的规划,同时仔细研究三峡规划设计。规划与具体设计有别,两者不要混淆。

水利专家组长戈尔涅夫说得更直截了当:从防洪观点看,可用支流水库代替三峡;三峡投资太大;也不能认为三峡能彻底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三峡建成后,都还需要堤防和分洪措施。他还强调,干流、支流所建枢纽工程,都不能解决排涝问题。对排涝最有效的是广大小型水利工

程,能就地拦蓄,可利用群众力量办。

3月3日继续开会。周恩来指定要我先讲。在这个会议上,可以说我是相当孤立的。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开始出现潮头;南宁会议有关三峡争论的情况,大家并不清楚,长办和水利部门的人都只知道,毛主席指定周总理抓三峡这件大事;“高峡出平湖”的词在继续鼓舞着人们。

我的发言按《汇编》全文抄录如下,以存其真:

“从综合效益来讲,三峡是非常理想的,也是很好的。在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应该说是可能的。经济指标特别是单位指标都是很好的。三峡可以解决(作者按:“解决”二字用的不当,从下文谈防洪即可证实。但原件如此,不宜作更改)长江洪水问题,以及开发长江的水力资源,这都是用不着怀疑的。过去有些问题,曾引起争论,这主要是三峡兴建的时间和坝的高程问题,过去长办曾强调三峡正常高水位235米,这次提出三峡正常高水位200米是比较现实的。过去长办对三峡电能、投资及其他经济方面的问题,研究的不够仔细,现在长办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研究的也比较好,因此这方面的争论也就不存在了。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从林主任的文字报告中看,对三峡谈的多,对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如何办谈的少。三峡虽好,但它的最大不好是时间长,需要15—20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决和满足国家建设的近期要求。国家的长远计划,一般需要解决15年以内的问题,今天要赶上英国,三峡是用不上的,现在应该结合三峡统筹安排15—20年以内的工程。

“在防洪方面,李镇南同志的分期提高长江防洪标准

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是对的。但在发电如何逐步满足用电的需要,体现以水电为主的方针?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方面,如何兴建灌溉枢纽,并充分考虑现在的群众性工程?在航运方面如何进行充分考虑?都谈的较少。

“林一山同志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原则是:1、以三峡为主体进行长江流域规划。2、正确掌握三峡与干支流开发的相互关系。3、远景规划与近期规划相结合。这三个原则,实际上就是一切围绕三峡,后两条都是从属的。我认为进行长江流域规划的原则应该是:1、综合利用。2、多快好省。3、远景规划与近期工程相结合。毛主席说:‘五年看三年,十年看五年。’因此现在的近期工程是关系到国家今后的发展,有必要与远景规划分清楚,在步骤与次序上要分明。当然,远景与近期是有联系的,一般考虑15年以内算近期工程,目前我们不能只搞远景不搞近期。重点与第一期工程,在黄河是一致的。但在长江是不一致的。三峡是重点,但它不能首先开工,因此它不可能是第一期工程。只谈重点不谈第一期工程,不能解决国家的现实问题。

“长江是一条大河,应先支流后干流。林虽然谈了支流,但太少,且过分地强调了三峡的作用,贬低了支流的作用,这是片面的。如林报告中第15页提到的沅水,事实上沅水对长江中游的洪水是有一定影响的。长办的苏联专家组长,在1955年初到北京时,曾强调长江支流的作用,特别是强调南岸的支流,即乌江,四水和赣江。乌江和沅水要比汉江水量多一倍。因此我认为长办对支流研究是不够的。现在我们的工作应先易后难,长江的枢纽工程

也应先小后大，从国家投资看也是如此。因为这样作，可以积累经验，以便今后进行三峡工程。这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谈一谈关于长江的防洪问题。长江的防洪问题，公认是首要的任务，但长江洪水灾害性质与黄河比是不同的。长江量大，而历时较长；黄河是洪量小，峰峻沙多，历时短而骤。长江洪水两千年间有记载发生大小洪水共 214 次。在明朝堵塞了荆江北岸的九穴十三口，加上人为的围垦，如从 1925 年至现在，洞庭湖缩小约 1000 平方公里。这样，在清朝以后，长江洪水才开始有愈益严重的趋势，这是人为的恶化。而黄河洪灾是一种随自然情况发展起来的。长江的最大、最小流量仅相差 25 倍，而黄河差 200 多倍。长江洪水经过洞庭湖容蓄后，汉口最大流量为 76100 秒立米，长江千年一遇最大流量为 96000 秒立米。假若在汉口通过 96000 秒立米，相应的洪水水位是 31.88 米，比 1954 年最高洪水水位 29.37 米高出 2 米。黄河陕县河床的安全泄洪量只有 8000 秒立米，而陕县可能流经洪水的最大流量为 20000 秒立米，两者相差悬殊很难解决。在长江增高 1 米的堤防，就能使汉口增加洪水宣泄能力 8000 秒立米，这相当三峡的有效库容 420 亿立米，由此可以说明长江堤防在防洪上的作用。故长江防洪最主要的措施是堤防。长江荆江大堤，是一个好堤，不是一个坏堤。林主任的报告中强调荆江大堤不决口是偶然的，我不同意。应提出确保荆江大堤。实际上荆江大堤是可以确保的。就是三峡做好以后，荆江大堤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汉口的堤防已加高至 30.73 米。如需解决 600—1000 亿

立米的防洪库容,先做支流,可以减轻三峡负担。若在 15 年内,水土保持做的好,洪水还会减少,三峡的防洪作用也就可以减轻了。长江 1954 年的溃灾淹没地区的 80%,三峡是不能解决的,这要靠支流。

“第四个问题是对今后研究长江的一些意见:

“第一、应加强支流的研究工作,如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洞庭湖的四水,汉江和赣江。在这 12 条支流上,假若在 15 年内,获得逐步的开发,就可以得到有效库容 1000 亿立方米,发电 1200 亿度,灌溉 4000 万亩,航运亦可改善,将来配合三峡运用则更好。三峡单位指标虽好,但支流投资可以分散,周转快,收效快。因此先作支流是合理的。支流的汉水丹江口,沅水五强溪,嘉陵江、岷江等应先开发,特别是宜昌以上支流,修了水库,对三峡施工也有好处。

“第二、不能把三峡概括一切,这里面具有一定的矛盾。在我的印象中,长办对丹江口研究程度没有三峡研究的这样深,而眼前是需要丹江口。远景研究过高。将来变化很多,就会使三峡研究成果等于学校毕业的论文设计。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林一山偏向于美人沱,如现在马上对美人沱进行初步设计,将来就有可能变成毕业设计。南津关的缺点我们知道是喀斯特问题,而美人沱进一步发现的缺点还不知道,说美人沱的导流施工容易,也是值得怀疑的。现在还没有根据说南津关不如美人沱,而林却强调美人沱好,工作再深入一些,可能就不一定了。现在对三峡兴建,不要强调过快,准备与设计工作,应拉长一个时间。经济方面问题不谈,单从技术准备看,1963 年能否开

工也是有问题的。若这样还会影响近期工程的进行。因为现在全国都很紧张,特别是地质问题困难,而事实上地质会越做越复杂。经济研究的组成,现在也是有问题的。如照李镇南同志说法,各个部门需要派强有力的骨干驻在武汉。国家计委研究我国 15 年以后的情况是比较少的,现在可否考虑与计委共同工作,或长办经济工作人员驻京工作。

“第三、长江流域规划范围问题。长江虽有超流域的意义,但应约束在一个范围以内。现在无所不包,几乎成为全国的经济规划,这种全面性是吃力不讨好的。各部门,各省市,能作的工作,长办不应代替,不能单纯以长江地理概念来划分。

“第四、关于力量问题,应统一考虑。长办队伍是最强大的,现在拥有技术人员 3000 人,工程师 400—500 人。过去日常工作交各省,目前长办主要在搞规划,但其中大部分搞三峡,这是值得讨论的。关于三峡与第一期工程的比重,各占多少,应有一定考虑。”

《发言汇编》上接着是钱正英发言。她说了 4 个问题。这 4 个问题也全文抄录如下:

“(1)三峡的地位:因三峡有特殊的地位和开发条件,三峡是流域规划中的关键问题。是规划中的中心枢纽,这应该首先肯定下来。假如长江不进行流域规划要点阶段的工作,那么现在的长江各个支流如何规划,如何对长江进行开发,这些问题都是很困难的,这样就会影响全国整个建设的布局。

“(2)干支流关系。长江流域的支流规划,想一下都在

今天拿出来那是很复杂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不相信,在汉口会做出太湖流域的规划。因为支流规划工作,多是依靠地方。现在的长江流域规划,就是要提出规划中的主体和各支流规划的工作方向,而这一问题,林一山同志已正确地提了出来。支流在下游控制,在防洪方面才能为干流服务,因此要求在支流的下游修建水库,这样淹没的地方会比三峡淹的更多,且与支流本身利益相矛盾。如支流灌溉,应在上游修建枢纽,这样效益大,但对长江的防洪效益小。因此,不首先肯定三峡,干支流的关系是很难正确肯定的。

“(3)对长江各个不同地区,结合长江干支流规划,拟定出各个地区的开发方向。

“(4)长江与其他流域的开发关系:虽然向华北引水是远景,但现在要进行论证是否可能?引水路线如何?这些都会具体地关系到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与开发,这些问题是应当在流域规划中进行的。”

实际上钱正英讲的头两个问题,完全是一回事,即三峡同各支流(还有上游干流)的关系。按理应当从河流综合利用原则,即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如何按时间先后,开发难易、技术条件,国家财力等等,做出综合比较,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确定第一期工程。但她就是一锤定音:三峡就是好,不容分辩,一切都应当围着三峡转。“不首先肯定三峡,干支流关系是很难正确肯定的。”这无以名之,只能叫强词夺理。所谓“支流的下游建水库”,就水电而言,乃无的放矢。因为河流到了下游就没有落差,只有上游和中游适当集中落差之处,才能修建水电站,这是常识

问题。钱是治淮出名的。当年淮河已修的上游各支流防洪水库，只控制淮河流域洪水百分之五，因此她认为应在靠近下游干流的临淮岗，修一个大水库来装洪水，可是要迁移一百多万人。她这种光凭主观愿望，不从实际出发的依靠水库防洪的指导思想，也支配了三峡这类大问题的处理，一定程度上，葛洲坝的出现也是这种脱离实际的思想产物，反而影响水电的多快发展。

我没有再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我心中有数，经过南宁会议，三峡大闹不起来。不过，其他人的发言，不少或间接或直接对钱正英的意见作了反驳，当然，也有附和的。

张劲夫讲的话很短：“对于三峡的兴建，赞成积极与慎重。三峡的兴建，希望多吸收些人讨论，经济技术方面，都可以提出问题。如经济方面规模与效用，应进一步研究；如三峡输电的投资不次于三峡工程的投资，这个问题应明确提出来，不应回避。三峡的用电户影响国家的工业布局，估计充分是有好处的。对这些问题应深入研究，这对今后三峡做结论有好处。技术问题，应从可能性中多找几个方案进行比较研究，假若事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收集很多有益的意见，这也是有好处的。”

刘西尧的发言更短，他说：“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我是同意的。”“关于大中小型结合问题，光是先小后大，先支流后干流，不见得妥当。但林一山同志的报告也有片面性。”

交通部办公室主任张文昂的发言，希望如林一山所说，三峡建成后，661公里航道改善，“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是一个‘地中海’”。但因为重庆以下还有35公里天然航

道,希望正常高水位为 210 米(林一山的报告已从过去的 235 米降到 200 米)。他最后说:“对三峡的争论是有好处的,在初期各有各的主张,正由于这样,才使人注意长江流域规划的各方面问题,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论证。今后还应当争论,争论还应受到欢迎和鼓励。”

陆钦侃的发言专谈防洪。他几十年一直参与三峡的规划论证,直到最近还向中央上书,说明三峡的防洪作用有限,现在不宜急于上马。下面是他的发言全文。是针对着林一山的方案谈的。

“长江流域规划,对防洪有片面的看法。如特别强调荆江大堤、汉江遥堤,但对其他地区如洞庭湖 860 万亩只能确保 200 万亩;对无为大堤 300 万亩和赣抚平原 120 万亩,则只提出问题,而无具体措施。1955 年做中游平原防排方案,亦未考虑下游。以前淮委考虑安徽多,其他省少;长江流域规划是否亦有类似情况,是否重湖北而忽视其他各省?如江苏省的洪灾一点也没有谈。

“对洪水来源考虑亦是片面。长江中游洪水来源有三,这就是长江干流、洞庭湖水系和汉江。虽然不能否认干流洪水大,占汉口的洪水 60—70%,但不能说其他 30—40%不应先解决。其中洞庭湖水量要占 20—30%,较汉江水量为多。长江洪水因雨量大,但由于气象上原因,各支流发生洪水时间错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洪水才发生遭遇,其中最主要的是洞庭湖水系,四口、四水同时流入洞庭湖最紧张。解决洞庭湖固应做三峡,但建成三峡,为时尚久,因而需要先做支流。在四水中,沅水最大,1931、1954 年都与长江干流洪水发生遭遇,1931 年沅水尾间受

灾 120 万亩,1954 年达 340 万亩。就是三峡做了,也不能解决中游各支流尾间受灾的问题。沅水五强溪除发电 120 亿度外,还有有效库容 220 亿立方米,相当于洞庭湖有效蓄量,可以减轻洞庭湖负担。林主任很早就提出研究沅水。苏联瓦西林柯等专家认为沅水防洪效益很大,可以初步解决长江洪水问题。五强溪比清江水库大得多,1935 年暴雨区在清江,但不等于每年皆如此;清江固可以做,但不及沅水防洪作用大。

“长江防洪迫切,不能等待三峡水库的兴建。长江每隔五六年发生一次洪水,在三峡未建成前,还可能出现三四次洪水。1954 年以后,长委会作中游防洪排渍方案片面,不考虑下游,且未与各有关省联系,后来行不通,不能实现。以后进行长江流域规划防排方案未继续研究,把重点摆在三峡,以致影响近期工程。

“荆江大堤我同意重要,堤质也不好,1954 年虽有 10 万人上堤防汛,但未予以足够重视。堤应进行改善,且较新建为廉,如堤基渗漏可通过灌浆处理。有人认为无法办。为什么修建三峡围堰防止渗漏,尚可进行灌浆处理,而荆江大堤为什么就不能? 解决荆江大堤的洪水威胁,不是没有办法的,如扩建二号北闸可以解决 100 年一遇的洪水;下荆江可用裁弯取直办法扩大泄量,控制四口亦很有利。所以支流水库可在三峡以前兴建,如丹江口、五强溪、亭子口等水库都可进行。三峡水库应长期地、不断地研究。但各支流水库防洪任务多少,并不取决于三峡的正常高水位和三峡的防洪库容。为了解决近期工作,应尽早确定第一批兴建的支流水库。

“三峡高程同意 200 米方案,过去长办强调三峡 235 米,林一山同志在《中国水利》发表的文章亦是如此。在 1965 年庐山开会讨论时,大多数亦是主张三峡高程 235 米,当时我主张低方案,认为三峡高程 200 米较好,林却说是电力部的意见。现三峡采用正常高水位 200 米是对的。

“长办对支流研究也不够,过去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才对支流指标好、淹没小的水库开始研究。三峡应当研究,但力量上应不影响近期工程的建设。”

张含英老前辈当时是水电部副部长,在国民党时代他就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他赞成三峡工程应当尽快积极进行。但他的发言强调:“重点工程不一定是第一期工程,这应因地制宜决定。三峡无疑是重点,但长江支流都非常大,如丹江口也是世界上的大工程,它已经肯定是第一期工程,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施工。三峡工程应详细研究,但在三峡未做以前,是不做其他工程,还是有些工程做?这个问题正是长江干支流的关系问题,这是长江流域规划中的重要问题。”

发言到此,干支流关系与开发先后,显然是大家比较注意的问题。李葆华发言不长,他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写出的流域规划要点报告,提出了长江的治理方案,选择枢纽,确定三峡的重要性;提出干支流的关系,虽不那样的明确,对支流强调不多,但对支流已引起了注意。”“关于三峡两年来有很大争论,争论的结果慢慢地都接近了,过去都有片面的看法,现在都日趋全面了。”他接着说:“三峡问题,我与澜波等同志交换意见,都愿意做促进派。

认为三峡要积极进行研究和准备,20年建成三峡是太长了,虽然可以提前防洪、发电,但应争取大家都看得见才好。”当时,“大跃进”已开始刮风,他的发言也免不了受到影响,反映在他的发言末尾,他这样提出希望:“即使三峡解决不了赶上英国的问题,将来也可用来赶上美国。”“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跃进中,经费困难不一定很大,近远都要抓,三峡不能看成是很长远的,而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办到的。”

刘澜波的发言很短,先表了个态:“今天我以原电力部及现在的水电部两重身分来说,都愿意做一个三峡促进派。”他同意苏联专家组长的估计,“可能是15—20年建成。从防洪方面说,越快越好,从发电说先行一步也好。时间决定于准备工作,及经济的需要与可能”。他说,“电力专家组长的意见,不能说是火电派,他的意见也是综合利用的。”他最后的几句话,似乎是以原电力部的身分为我说的:“过去是有争论的,最大争论还是时间问题,也包括防洪措施与看法等问题。动手应在大技术问题解决之后。我自己个人过去对长江没有研究,以往的争论,也没有人说是不要进行长江规划。”

地质部工程地质局负责人张更生,详细谈到三峡的工程地质条件和今后勘探工作的意见。他强调了工作中的困难在:“以往由于设计方面不按程序,要求过多过高过急,经常变动,造成返工浪费。如去年要地质队提交技术设计阶段的地质资料(各坝段的剖面图、基坑开挖量、基坑渗透量、边坡开挖量),当时不需要,也是一时作不到的工作。如要求作详细地质工作,又只有不准确的地形

图,作出地质图都变了位置,以后还得重测重作。”特别重要的是,他还就一些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强调:要“进行区域工程地质调查,对于解决水库内地质构造、浸没、渗漏、边坡塌岸、固体径流(即泥石流)来源,以及库区矿产等项较为重要。否则像官厅一样,由于缺乏水库地质调查工作,现在发生浸没和渗漏问题,再处理又花费不少力量去补救。”

程学敏的发言最短,他是针对《要点报告》要求三峡工程 1963 年开工说的,他说:“三峡在各方面差不多都集中了世界水平,也有很多方面超过了世界水平,尤其是施工导流困难仍多,应该正视困难,予以足够估计。在安排工作方面,三峡勘测设计应尽快,但依靠其解决问题,则不能不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考虑(三峡)要迟些,应先作(支流)其他工程。现在还不能肯定三峡于何时开工,可能要第三个五年计划而不一定在 1963 年。”

李善民当时是原电力部武汉水电设计院院长(此院后来搬到长沙,改“武汉”为“中南”),他是南下的老干部,由湖北襄樊地区专员转业的,能钻研业务,已相当内行。他首先谈到“三峡过去确有争论,这主要是:(1)在防洪上是一次解决,还是逐步提高?(2)在开发上先支流还是先干流?(3)在时间上三峡什么时间修完?对丹江口也有争论,即永久性电站或临时性电站?”(按当年长办的南水北调规划,是由三峡水库引水经丹江口水库再引水北去,90 万千瓦的电站带临时性。现在如果要实现这个规划,三峡水库引水到丹江口已不可能,丹江口本身必须将大坝加高 20 米,再移民几十万人。)他认为,“实际过程中,支流

是会走在前面的。如丹江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应开发。”他从电力需要出发，认为资水的柘溪、沅水的五强溪及四水其他支流，都应先于三峡开发；湖北的清江最好在1962年投入，因电力需要正急。

发言的最后一人是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他首先说：“三峡水库的兴建的确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难以想象的重大作用。过去是有争论。现在对要不要三峡的看法是一致了，目前大家都一致肯定了三峡水库。兴建三峡水库的准备工作，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了。目前即要进行设计工作，施工时间不是很遥远的，因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施工。过去争论是有好处的，今后在以三峡为主体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仍然会有争论。在争论中出新的问题，不搞清楚不要作结论。”在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时，他没有发言。这时，他接着说：“林一山同志，在工作上是负责的，提出问题是经过论证的，也是有根据的，不是瞎说的。”“有人认为长委会在湖北，因而光替湖北做工作。的确林一山同志对湖北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不是湖北的长委会，事实上湖北省委也未直接要林做什么，林也无片面只管湖北的观点。”关于林一山报告中少谈支流，王任重是这样为他解围的：“因为这次会议就是要谈三峡，其他方面谈多了，重点就不易突出，所以我与他商量，就是要写三峡。因而在报告中长江上中下游、干支流关系、中小型工程谈得很少。”王最后谈到，“确保荆江大堤、汉江遥堤，决不是要保护堤后面的耕地，事实上在1954年，这些地区已是都淹了，问题是在于威胁300万人的生命死亡问题。过去长办曾根据资料进行计算，荆江大

堤万一溃口,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亦要淹死 10 万人,其他不可想象的后果和事例更多。汉水的遥堤亦是如此。”

王任重《随同周总理考察三峡记》前言中说:假如不是因为‘大跃进’以及其他因素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当时的设想,可能早已在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开始发电,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长江中下游几千万人民也不必再为洪水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了。”

所谓“有了三峡水库,就可以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这一直是几十年来的浮夸之词,也是积极催促三峡工程尽快上马的人的主要依据。其实,三峡水库对武汉防洪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主要在能减轻对荆江大堤的威胁。长江北岸古有云梦泽,同洞庭湖一样,是极其有效的长江分洪区域,今天的局面是以后形成的。这个情况,林一山曾说得很清楚:“荆江两岸在历史上是著名的云梦泽和八百里洞庭,是长江洪水的泛滥区。随着泥沙的逐年淤积和围垦利用,现已成为湖北、湖南两省的重要商品粮基地。明代张居正^①为抵抗洪水,舍南救北,修建了荆江大堤,堵死九穴十三口(洪水再不向北岸分了)。此后,南岸受分洪溃口影响,地面逐年淤高,形成南高北低,荆北洪水威胁加重的局面。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荆江大堤加高加固后,这种局面就更加日趋严重了。目前南岸地面已高出北岸 7 至 10 米,荆江大堤一旦溃决,洪水似猛兽吞噬江汉平原,损失将极为惨重。”

^① 湖北人,明代有名的宰相。

1952年修荆江分洪区时，我还在湖南，当时对这个方案湖南是有意见的。因为蓄洪之后，等于在“头上顶了一盆水”，对湖南形成一种威胁；后来照顾大局，同意修建。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向荆江北岸分洪呢？难道我们也是张居正吗？请看中国科学院专家李驾三的回忆：

“1952年，水利部苏联专家组长布可夫在审查荆江南岸分洪方案（即现在的分洪区）时，发现荆江两岸地形南高北低，不理解为什么当时要在南岸不在北岸分洪。这样组织上就派我协助他研究荆北分洪问题。在查阅文献资料时，我发现解放前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早已有此设想。他在1936年《对于治理扬子江之意见》一文中，这样写道：‘扬子江北岸自江口而下，自宋、明以来筑堤封固，唯恐不严。江水大涨危迫之际，则舍南救北，北岸固免一时之害，然今日视之，南岸之地多半淤高而变为肥沃之田，北岸则仍守其卑下地，永为脊土。将来南岸诸湖泽以次淤平，则北岸势不能免为江水之壑。故一为江洪多一调节计，二为淤肥江北之地计，三为免将来必不可幸免之大患计，此时即宜着眼于是，使江水得于调节控制之下，流入北岸诸湖，而并为之筹谋排水之路，是在今日科学发展时代，必可使之有利而无弊。此言一发，必遭鄂人之激烈反对，为余固本余研究之得以立论，世人骂所不恤也。’”于是，李驾三“就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并提出《荆北分洪方案》，代表布科夫向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认为，这个方案实施后，“在提高荆江段防洪能力方面，基本上与三峡水库相同，而且运用起来更为灵活，同样的蓄洪容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可以通过分洪及经济性的放淤，

淤肥淤高北岸低洼湿地,并可引水淤高荆江大堤的堤背低地,逐步缩小荆江大堤的堤背高差,从根本上改变长江中游南高北低的防洪被动局面,逐步缓解荆江大堤的险情。这是三峡工程无法比拟的。”“工程在起防洪作用的同时,还可结合地方生产,为改造低产田,发展灌溉,防止内涝,发展水产和渔业,沟通航运等等,创造条件,从而做到除害与兴利相结合。”

这个《荆北分洪》方案当年就被搁下了,而且几十年来从不提及,这当然是由于“鄂人之激烈反对”,以及钱正英和长办等钟情于三峡的人,志不在此,否则,“为解决长江防洪,必须修建三峡”的旗子就打不下去了。李驾三于1992年3月的建议书(《“荆北分洪”是解决长江中游防洪问题的比较理想的方案》)中,除上述理由外,还谈到最后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本方案原来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实施起来可能阻力不致太大。因为本方案分洪区下部洪湖以下部分,实际上就是长办在1980年提出的《洪湖分洪区方案》。因此只要在该方案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的基础上适当加以调整,并增建分洪区的上部,即长湖至白露湖部分,重点是两个大闸和围堤。”可是,就是长办自己安排的这个1980年长江中游防洪方案,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也没有完成,关键还是志不在此也。

在船上开会的发言中,只有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主任蒋光耀涉及到这个问题,他反对荆北分洪,他是这样说的:“荆江专署不同意人民大垸挖开及上车弯扒口分洪。”湖北省水利厅厅长陶述曾,是老一代的水利专家,他强调:“单从堤防加高解决洪水,有困难。湖北省的堤表面看

来还好,但基础不好,堤的溃口不在堤身,而多因基础下有粉砂层造成管涌下塌。目前改善也很困难,如何改善亦尚无结论。”

从以上发言看出,关系到三峡工程和水库的要害问题,如泥沙淤积,对重庆安全和四川防洪的影响,投资的估算,包括船闸等技术可能性,艰巨的移民问题,尤其是整个生态环境影响,等等,当年都没有涉及。这次查勘和会议的意义,正如周恩来在重庆作总结时开头的一句话:“这次是开的促进会,以后还要常开。”

当时的形势是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1956年反冒进,“大跃进”的浪潮开始涌起。周恩来是被批评的当事人,已经作过检讨。他虽然不能不当三峡的促进派,但他对这样一项世界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还是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方针。他的总结发言基本内容,都充分表现在随后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的有关三峡的决议中,该决议也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在重庆的总结发言中,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如何积极准备呢?他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召开的。在南宁会议上曾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就是要听听苏联专家和各部门兴建三峡的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涉及全江,要谈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必须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兼顾,以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布置,和电力网的建设等。”他认为“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

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特别提醒:“三峡综合利用,不能孤立地谈,要与干支流,上中下游结合,要分担任务配合进行。”“三峡枢纽是问题的主体,但是我们不能集中一点,不及其他,三峡是重点而不是一切,应有主有从,这样才能全面论证问题。”讲话中具体谈到:“坝高 200 米,是否可以肯定下来”,“在不太长时间,15—20 年内完成三峡的兴建”。最后他以十六个大字,来勉励与会同志,这就是“鼓起干劲,相互促进,乘风破浪,力争上游!”

我的旧诗词集《龙胆紫集》中,有一首写 50 年代从事水电工作的长诗《六铺炕吟》,谈及这次查勘三峡船上开会之事,有以下 10 句:

奈何三峡余波尚未绝,独我坚持长远说。
当年大跃进潮头,诸公袞袞峡中游;
美人沱觉花岗好,南津关为乳洞愁;
评头品足观坝址,阔论高谈坐舸楼;
话不投机惊满座,区区总算逆潮流。

在船上有人谈到旧中国没有什么水电事业时,周恩来即说,长寿的龙溪河上不是有个下清渊洞水电站吗?有人插嘴:那很小。他不以为然地说:小也是电站呵。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水电处,在贵州、四川等地建了一些小水电站,其中下清渊洞是最大的,后扩建成 3000 千瓦。于是,在到达重庆之前,由于我的动员,3 月 4 日晚,船在长寿县停泊。第二天,大家参观狮子滩水电站。我与

总理同坐一车,沿途介绍了龙溪河开发的历史。狮子滩是1956年建成的当时四川最大的水电站,装机4.8万千瓦,为龙溪河这条长江的小支流梯级开发的龙头,有多年调节水库。周总理一行的突然到来,电厂的工作人员说不出的快慰,大家结队欢迎。重庆市的下放干部等在礼堂门口,总理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还和大家一起照了相。然后,从狮子滩下行,沿途看了上清渊洞、回龙寨和下清渊洞三座水电站。这条小支流的水力资源已全部开发,四个梯级共装机10.45万千瓦。周恩来在狮子滩参观时,仔细看了厂房、机组、大坝和溢洪道,还进入了大坝腹部的廊道,廊道中非常干燥,说明这座滩石坝的设计和施工质量很好,他不断称赞。在纪念册上,题词道:“龙溪河的开发,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开辟了道路。”李富春和李先念联名题词:“为长江综合开发,开辟了道路;为四川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我当时很感安慰,这反映河流综合利用思想已深入人心。1952年我调到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工作时,河流综合利用思想在有关部门(主要是水利部)和高层领导中,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关于三峡和长江流域规划问题,3月间开的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一个决定。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决定的起草。记得第四项防洪措施中最后一句话:“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是我加的。还记得决定第五项中谈到的七种关系,“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二种关系是毛主席加的。可惜的是几十年来,因志在三峡,有关主管部门并未认真按照这个决定的各项规定,尤其第四项规定,全力去办。现将

这个决定全文附后：

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 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成都会议大组会议在1958年3月23日讨论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并且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二)为了便于今后有关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二百公尺(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公尺和195公尺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三)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时期，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的继续勘测和研究，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取展开争论、全面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必须作试验研究。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要害报告应当于1958年第二季度交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1962年交出。

(四)长江较大洪水一般五年可能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

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五)长江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六)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 1959 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洞庭湖水系的规划问题和两湖间的防洪问题,应当于最近期间由王任重同志负责召集有关省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商议,定出方案。四川和贵州水系的规划,鄱阳湖水系的规划,以及安徽和江苏有关长江的防洪、灌溉等问题,都应当分别由地方负责同志召集各有关方面开会研究,定出方案。

(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长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周恩来同志提出,报告中央通过。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中的设计文件,均应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审查,报告中央批准。

随后,由中国科学院、水电部、一机部和长办联合有关部委和地方科研部门共 300 多技术干部参加的三峡第一次科学技术研究会,于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武汉举行。我当时已无暇顾及此事,只听到参加这个会议的一机部电机方面负责人周建南同我谈起,王任重在会上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十几个文件和决定,都是促进的,只有三峡这个文件是促退的。后来 8 月间,在北戴河那样“大跃进”的会议上,讨论三峡问题时,周恩来也只说过,三峡最

快可在 1962 年开工。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几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35 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所有这些决定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唯独关于三峡这个决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自然同周恩来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也同南宁会议之后,关于三峡问题的要害所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了解分不开。以后,直到周恩来毛泽东去世之前,不论有关方面怎样催促三峡上马,他们再没有就三峡何时开工有过首肯之辞。至于长江规划委员会,则始终没有成立。

在庐山会议上

万 毅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时，开始我没有参加。我留在北京，在国防科委处理日常工作。当时我的职务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7月中旬的一天，宋任穷同志到国防科委来找我。当时他是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他告诉我，苏联以与美、英等国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为由，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从而打乱了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同志很着急。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建议他直接去庐山，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首长汇报。因为国防科委还有日常战备值班等许多事要做，我不想去庐山，但宋任穷同志执意要我一同去，我只好与他同乘一架飞机飞抵九江，然后换乘汽车上了庐山。我们到庐山的那天是7月15日，我们先向聂帅作了汇报，聂帅又和我们一起到了彭总那里。因为7月14日，彭总刚刚给毛主席写过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我们谈完工作以后，他很自然地说起给主席写信的事，讲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听了后，认为彭总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并且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就因为这件事使我后来被迫在庐山会议上作了检讨，检讨文字

还被印进会议文件里了。

7月16日,毛主席在彭总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林彪、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也都被召到了庐山上,宋任穷同志和我也被留下来参加会议。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组,组长没有变动,组员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宋任穷同志分在第一组,担任副组长;我分在第六组,组长是欧阳钦同志,副组长是江渭清和张国华同志。

庐山会议的前一段,就是我们没有参加的7月上半月的会议,各小组集中讨论学习、形势、任务等十几个问题,听说气氛比较轻松,被人们称为“神仙会”。毛主席批示后,小组重新划分,参加会议的人员也增加了,预示着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参加小组讨论的第一天(7月17日上午),毛主席的批示和彭总的信正好发下来要大家讨论。当时多数同志还不理解毛主席要大家讨论的用意,更没有想到这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17日至22日的6天讨论中,大多数人赞同彭总的一些看法,许多人还说了不少相似的事例。在我们第六组中,张国华同志讲了他爱人回江西探亲时,看到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同志讲了手工业中的一些问题。董必武和聂荣臻同志在第六组参加讨论,对彭总的信也没有提出批评。我记得,只有一位青海省委书记,不同意彭总的观点,说他们那里的小麦亩产7000多斤。

7月22日上午,小组讨论已进入第六天,我在小组会

上作了第一次发言。我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我认为这“是搞精神第一性”。我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与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我还讲到：“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今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

这些话都整理到会议简报中了。在我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我的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

当时，我还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我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表态惹了大祸。不过，我的发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和我的看法相似，只是没有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在其他小组，讨论的情况和我们第六组差不多。不少同志都讲了一些与彭总的观点相同的看法。但是在我发言后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早晨，我们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当大家来

到小礼堂时，气氛还和往常一样。但是毛主席只讲了几句，就使人感到气氛变了。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他虽然讲到“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但是，很快便把话锋转向另一种倾向。他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对于“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毛主席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全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毛主席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彭总的信。因为彭总信中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越说越严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他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里，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两年前（1957年）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感到十分震惊。散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很清楚。而林彪这时恰好站在我身旁，他手里拉着一棵小树的树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7月23日的讲话，完全改变了会议的内容和气氛，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总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总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我因为表示过同意彭总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23日以后，以批彭为主要内容的小组讨论又持续了一周。

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8月2日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列席人员，人数几乎相当于前一个会议的两倍。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明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二是路线问题。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他说：上庐山后，有一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什么事，前半个月是‘神仙会’，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所以觉得没有自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求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

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五七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嘛?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内分裂;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毛主席讲的这些话,把彭总的问题上升到分裂党的路线斗争高度。按照这个调子,各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了严厉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任意引发延伸开去。一方面是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另一方面是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和对那些在前段会议期间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进行揭发、批判。我就是被批判对象中的一个。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我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我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说:“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在他家吃过一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机,我向他要,他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主动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我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想解释一下我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我刚一开口,那天主持会议的某西南大区领导就打断我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我只好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同志,可能觉得该领导的话过于生硬,便说:“万毅同志,

回去到军委会上讲吧！”

当时，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迹象已十分明显。8月16日，八中全会闭幕的那天，当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会场上气氛异常紧张，真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毛主席念完决议后，问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人讲话，也没有让大家举手，就宣布决议通过了。

八届八中全会8月16日在庐山结束，我与彭总乘一架飞机离开庐山，先在济南停了一下，19日回到北京时，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已在前一天开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000余人，规模是空前的。各大军区的全部领导（只留一人值班），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军政主官都来了；全军师以上单位也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会议用10天时间，传达学习庐山会议文件以后，把原来的15个小组编成两个规模很大的综合小组。第一综合小组，有170多人（还不包括一些列席人员），光组长、副组长就有十几位，负责揭发批判彭德怀。第二综合小组负责揭发批判黄克诚。在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北京还召开了揭发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湖南省委则开会批判周小舟。

军委扩大会议由接替彭总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批判，从庐山会议一直延伸到炮击金门、高饶事件、抗美援朝、保卫延安、百团大战、长征途中……按照8月11日毛主席在八中全会讲话中定的调子，彭总被批成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改变，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投机革命的。而且还耸人听闻、无中生有地给彭总扣上

“里通外国”的罪名。

军委扩大会开到 9 月 5 日，又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对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四人进行揭发批判。邓华曾接替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有人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从而成了被批判对象。洪学智是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因为他与彭、黄关系密切，对彭、黄的揭发又很少，也成了批判对象。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则被扣上包庇黄克诚的罪名。

对我的揭发批判，也向纵深发展了。最可笑的是，有人揭发我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 120 师师长赵毅。西安事变时我还没有入党，怎么会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赵毅还活着，也完全可以证明此事。

9 月 11 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在会上宣布了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后，又召开了有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和总参、总后等有关单位代表共 220 人参加的批判斗争万毅的大会，持续了 25 天。最后给我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严重的教条主义者”。

1960 年 4 月 13 日，我被迫离开部队，到陕西省担任省建委副主任，半年后又改任林业厅副厅长。一去 8 年。

邓华，洪学智和钟伟同志也都被撤了职。邓华被贬到四川省任副省长；洪学智被贬到吉林省任机械工业局局长。我因彭、黄而受株连，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的一些同志又因我而受株连，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迫转业。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我再次遭到迫害。从1967年11月被监护，我在1959年患上的青光眼，在被监禁的头四年，一直不给任何治疗，因而迅速恶化，1969年左眼失去视力，1973年被放出时，右眼的视力也只剩下0.08。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我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看到我的信后，写了：“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的指示。从此，我才得到适当安置，同年10月，我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顾问。但是我的冤案直到1979年10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1959年那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左”的错误继续蔓延，并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极其严重的后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如果我们切实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断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建设。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日益兴旺发达。

（李维民整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由来及发展

杨 亲 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作为自己应实现的历史任务之一。40余年来，其针对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相应政策措施，鲜明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和理性的政策思想，这是促进海峡两岸局势变化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

一、“武力解放台湾”方针的提出

“武力解放台湾”方针一开始是作为全国解放战争后期作战任务提出来的，这一方针的执行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整个战场形势已经起了根本上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后，已开始大举反攻。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在这个战略口号中，已经孕育了日后提出的“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正如周恩来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其中包括解放台湾在内。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1948年，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会议提出用五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

说：“我们的口号是民主的统一，所谓统一，就是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国家就是那五百个旅，打掉五百个旅，就可能统一。”毛泽东还说：“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处在危局中的蒋介石开始更多的考虑在全国失败后的退路。当时蒋曾有过多种打算。其一、让国民党军队残余退守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在大陆上继续与人民政权顽抗到底；其二、将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海南岛，以此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依托，作为国民党最后坚守的阵地；其三、将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国民党的存身之地，进而建设所谓“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特别是后来战局发展的影响，使蒋介石在定海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上，最后确定了第三个方案——决定把国民党的落脚点放在台湾。

蒋介石为了确保台湾“反共基地”的稳固，开始了对台湾的苦心经营。首先他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与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以至反攻大陆的基地。为此，他任命陈诚、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命令其国民党嫡系部队将原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所剩余之黄金、银元、外币共约五亿美元全部劫夺到台湾。在军事上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构建起以台湾为中心，以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为重点的军事防御体系。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余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州、广州和重庆的绥署主任。他在福州视察时特别强调：“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由此可见，国民党已将自己的统治重心移向台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有必要把台湾作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独问题来考虑，并需专门制定关于对台方针和政策。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

湾》时评中已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意图：“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也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一篇关于“武力解放台湾”方针的文献。其后，《人民日报》也于同年9月4日发表了《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

渡江战役胜利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实施“武力解放台湾”方针。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为首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7月刘少奇访苏，在同斯大林商谈建立新中国问题时，刘少奇首次披露了解放台湾的时间表，他说：“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以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待明年解放。”1949年6月，中央军委电告三野总部研究解放台湾的作战问题。当时三野部署是准备先肃清福建境内大陆上的敌人，再攻占沿海岛屿，建立进攻台湾的基地，最后以两个兵团、八个军的兵力，并争取台湾国民党军队一部，里应外合，以较少的代价在较短的时间里武力解放台湾。

为执行上述计划，三野十兵团于1949年7月奉命进军福建，8月17日解放福州。9月19日，发起漳（州）厦（门）金（门）战役，当晚攻占漳州，月底肃清福建境内大陆上的敌人，10月17日又克厦门，打开了进军台湾的门户。随后，三野十兵团和七兵团，分别于10月25日和11月3日发起金门战役和登步岛战役，均遭失利。这两次战役失利，暴露了人民解放军由于缺乏必要的渡海工具和海上作战经验，还不具备立即进行远距离大规模渡海作战的能力。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放慢攻打台湾的步子。但是争取在1950年内实现解放台湾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

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

中再次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〇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当时解放台湾的设想是分二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积极组织海南岛战役的同时，还确定了先打舟山群岛，后攻金门岛的作战方针。5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和闽南的东山岛等沿海岛屿，准备再次进攻金门岛，建立进攻台湾的基地，然后在伞兵的配合下，由三野九兵团担任主攻台湾的任务。种种迹象表明，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已指日可待。

然而，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27日，杜鲁门发表声称“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命令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公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形势突变，迫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战略重点由我国的东南转向东北，抗美援朝的作战任务取了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第9兵团攻台任务解除，原定1950年解放台湾的计划终止。

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海峡反呈紧张局势，在美国政府“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的纵容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庇护下，蒋介石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复辟目标。其时，国民党每年用于军事费用的开支，占其财政支出比例高达80—90%，台湾方面对大陆的军事骚扰有增无减。这一切只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继续坚持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并在1954年至1955年初掀起新的高潮。

1954年夏，中共中央分析当时局势，认为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朱德、周恩来发表讲话，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都以解放台湾为主题，坚定地表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和“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态度。为了打击美蒋勾结的嚣张气焰，人民解放军于同年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并于1955年1至2月间，成

功地进行了渡海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当时，由于美国武力侵占我国的台湾，积极推行反华反共政策，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其在大陆的失败，积极策划“军事反攻”，幻想“雪耻复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基于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原则，除了继续坚持“武力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外，很难有其他选择。其间，台湾当局虽曾作过试探性和谈步骤，如蒋经国于1950年6月初派出秘密使者李次白回大陆，这也只是在台湾当局感到走投无路时，才想到打出的一张牌，而一旦认为可以应付局势时，就很快关上和谈大门，决不愿意多谈国共合作。

二、“和平解放”方针的形成

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呈现出如下新的情况：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1956年前后，党和政府一度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国际形势也有了较大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1954年初，召开柏林会议，同年7月越南停战协议在日内瓦签订。1955年4月，亚非会议召开，国际对话势头增长。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表明国际紧张局势已开始趋于缓和。中国政府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世界和平及各国友好相处的诚意，以便打开外交局面，进一步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尚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那么一个国家内部社会制度不同的地区，由于具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等，更可以消除隔阂，摒弃前嫌，实行和平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海峡局势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55年前后，国民党在台湾完成了“党政”、“土改”运动，岛内政治趋于稳定，

台湾民众也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并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美蒋之间也有矛盾，同时蒋介石在当时也抱有“一个中国”的立场。蒋介石丢掉大陈、一江山岛后，收缩了战线，强化了对金马及台澎地区的防御，人民解放军欲渡过 150 公里的台湾海峡，强攻有美蒋坚固设防的台澎地区，时机尚不成熟。若仅求攻下金马二岛，则无助于大局，又中了美国的圈套，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最后联系，使台湾孤悬海外，便于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此外，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就双方侨民问题开始会谈，都表示出进一步接触的愿望。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增长。正如周恩来指出：“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有利的。”基于这种认识，采用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合乎逻辑的选择。

中国政府首先在外交上调整对美政策，提出同美国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局势的建议。1955 年 4 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当年 7 月，美国政府作出反应，同意自 8 月 1 日始中美两国进行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终于走出最初的一步。

其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关于国共举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倡议。1955 年 5 月，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 15 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和平解放”的对台方针，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开始转变。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中国政府方面对和平解决我国台湾问题的具体方针政

策。这些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

1、“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为了缓和海峡两岸紧张对峙局面，为和平统一创造良好的气氛，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表示、理解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早日实现同家人团聚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大陆上的亲友通讯，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政府方面将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

2、“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为了推动台湾当局早日走上和平统一道路，进一步打消国民党军政人员对统一后政治和生活安排上的顾虑，1956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论先后，不论任何人，也不论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位置。同年12月，周恩来还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统一问题上进行合作，他便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留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如担任公职，这个职位将要高于部长级。

3、“国共合作”、“爱国一家”。为了协调好祖国统一后中国国民党的出路和地位，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同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7月，周恩来在会见访问北京的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首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分别取得了北伐和抗战的胜利，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为什么不可以实行第三次合作呢？1957年4月，毛泽东在宴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时，再次重申：“我们还要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4、国共“对等商谈”、台湾“高度自治”。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翌年6月，他重申这一主张，并

表示：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1957年初，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受蒋介石委派，秘密前来大陆，试探虚实，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中共中央通过统战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中共方面表示：由国共两党通过对等商谈，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当然，作为主权统一的标志，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到了1956年9月，“和平解放台湾”，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宣布：“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为了表明诚意，缓和两岸紧张气氛，争取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首先在提法上降低敌意。如果将1954年8月由19个团体联署的《解放台湾联合宣言》与中国领导人在1956年以后发表的谈话相比，在提法上已有显著变化，诸如前者称国民党方面为“蒋介石卖国集团”，后者称为“台湾当局”；前者要“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后者则愿与之“协商”和“谈判”；前者把宽大范围限定在“除蒋贼一人外”，后者则宣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其次，举行规模空前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宏文，盛赞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这一纪念活动，既是对中山先生的告慰，更是对台湾人民的亲切呼唤和情感辐射。

再次，主动沟通两岸关系。1956年9月1日，中国第16届奥运会代表团筹委会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参加选拔赛，宣布来去自由，提供协助与帮助。同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通过与国共两

党均有良好关系的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将实行国共和谈的建议传递给国民党上层人士。

三、“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

1957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这预示着美国准备进一步在台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对中国的和平将形成很大威胁。因此,毛泽东一直寻找机会使台湾问题引起国内外关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作出炮打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打金门,并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极重要的策略思想。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金门,炮击共持续43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第二次台海危机”。金门炮响,不仅加深了美国与其盟国的矛盾,也激化了蒋介石集团与美国的矛盾。9月30日,杜勒斯公开逼蒋从金门、马祖撤军。10月1日,蒋介石则明确表示没有接受杜勒斯谈话的“义务”。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重性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及时调整对金、马的方针,提出了“联蒋反美”的策略。毛泽东后来在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毛泽东的意见在党内取得共识。10月初,经中共中央讨论后,这个方针确定下来,调整后的方针的好处是:第一,保护了蒋介石的民族性,使台湾不落到美国人手里。如果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澎金马分开,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第二,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保留了一个大陆同台湾对活的渠道,否则双方将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第三,台湾归还祖国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竞争。

大陆和台湾要求保持“一个中国”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是在

对美态度上找到了某种共同点。于是，毛泽东决定暂时停止炮击，开展政治攻势。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中提出几点重要思想：第一、“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这一条指出了统一是大陆和台湾的根本方向；第二、台湾问题要由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这一条严格划清了台湾问题的性质。第三、“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10月13日，毛泽东又下令再停炮击两周，并称：“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以上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当时是有意识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以作为联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防止“两个中国”的产生。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之间的“默契配合”，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也为未来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次台海危机后，毛泽东又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出许多重要原则：

1、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

2、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

3、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

究并确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总的来讲，中共中央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总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中国领导人的这些思想，后来由周恩来进一步归纳，概括发展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从“和平解放”到“一纲四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有了重大发展。这幅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统一大业绘制的蓝图虽未实现，但是，这个“一纲四目”显然同 30 年后的“一国两制”是相通的。

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和发展

自 70 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共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民众、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首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郑重宣布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的对台方针的提出。《告台湾同胞书》表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还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等若干建议。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的字样，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和平统一”的精神。因此，这篇文献从形式到内容都表明中共对台政策有了重大变化。

同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率团应邀访美。访美期间，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他明确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他还指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局拥有它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所谓保留就是它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行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不变……这个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邓小平的讲话，第一次比较明晰地勾画出中国党和政府设想的祖国统一后台湾社会如何走向的大体轮廓，初步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九条对台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新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方针阐述上，它用“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提法代替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突出了新的对台政策方针的和平性质。第二、在实现统一方式上，它把《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台湾当局之间商谈调整为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前者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谈判，后者则是两党对等谈判，这

种提法不仅从情感上更能为国民党当局所接受,而且也符合台湾实际,因为国民党是台湾的执政党,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有能力也有条件发挥作用。当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所以谈话中又表示:“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第三、首次明确统一后的台湾“特别行政区”地位,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四、把尊重台湾的现状和现行制度,具体概括为“三个不变”、“六个不受侵犯”。即:“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里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科学概念。1984年10月,邓小平更进一步把这一科学概念概括为“一国两制”。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特别增加一项新条款(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从法律条文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新认识,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施新的对台方针政策提供了国家根本大法上的法律保障。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并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问题,详细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①。这个谈话将九条所提出的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增加了允许台湾实行不同的司法制度的新内容。同月,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也指出:“祖国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0、31页。

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持”。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明确确立了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海峡两岸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原则。此后,随着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①,实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初获成果。1985年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按照这一基本国策中国政府又在1988年1月与葡萄牙政府实现了澳门问题的合理解决。

1989年6月,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年9月30日,江泽民在国庆讲话中再次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及在京台胞、台属代表欢庆乙亥年春节的茶话会上,根据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并针对现阶段发展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又发表重要讲话就台湾问题的合理解决提出了八项看法和主张。

即: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绝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行和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主张,都应坚决反对。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但是,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谈判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

^① 即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9月18日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的历史事件。

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五、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我们赞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促进两岸事务性商谈。六、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七、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们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分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八项看法和主张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总结了几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正式谈判的具体步骤和构想。同时,就两岸“三通”与经济合作、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两岸高层接触互访及台湾同胞关心的若干其他问题,江总书记也代表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与建议。这些看法和主张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以及愿为实现国家统一求同存异的真诚态

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方针。

纵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这一过程迄今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到“一纲四目”,再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四个发展阶段。从以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一国一制”,到以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实现“一国两制”,这是在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政策方针上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每一发展阶段上的对台政策都是对前一阶段对台政策的部分质的超越,这一超越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不断变化着海峡两岸形势的认识和把握。然而,也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发展全过程始终贯彻着一条一脉相承的主线,这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实现民族统一的立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演变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矢志不渝殚精竭虑而不断追求和奋斗的历史。

改革开放在浦东

吴祥华 徐建刚

90年代第一春的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向全世界宣布: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要加快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从此,浦东成为举世瞩目的希望热土,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开发区,成为中国90年代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四年多来,浦东开发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中共十四大提出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目标为方向,抓住机遇,开发建设日新月异,对内对外开放迅速扩大,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树立了上海城市发展新的里程碑。

历史性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果断领导创办了深圳、珠海等5个经济特区和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迈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首先在珠江三角洲、闽南以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丰硕成果,率先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为90年代对外开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方位推进,摸索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80年代,上海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继建立了以出口加工工业为特色的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对外经济贸易中心为特色的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被外商誉为中国硅谷的漕河泾高科

技开发区,这三个开发区作为浦东开发的前奏和预演,发展迅速,很快形成一定规模,并取得一定效益,同时也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但三个开发区总面积只有8平方公里,被纷纷涌进的外商所开办的三资企业所布满,很快接近饱和。

8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些成就,却也处在“内外夹击”之中:与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差距正在拉大,迅速崛起的兄弟省市与自己的差距正在缩小。80年代上海工业增长速度为全国平均值的1/2,国民生产总值“第一”已归江苏,外贸出口冠军让位广东。曾使上海足以自豪的全国“十个第一”,只留下财政上交第一仍未易位。上海经济发展遇到城市改革的严重羁绊。特别是从1988年开始,经济效益连年滑坡,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上海要振兴,经济要崛起。围绕上海如何走向世界,人们把眼光瞄准了浦东。上海提出了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

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上报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正式提出了开发浦东的方针。1985年2月和1986年10月,国务院对两个主要报告正式作出批复。并在对第一个报告的批复中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对第二个报告的批复则进一步指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革浦东地区”,“使浦东成为现代化的新区”。国务院两次批示,给浦东开发带来希望和信心。1987年7月,上海成立了以倪天增副市长为组长的开发浦东咨询小组。1988年5月,召开了“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市政府顾问汪道涵等领导人与国内外140多位专家学者共商开发浦东大计。江泽民在会上提出:“结合老市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的方针。”此后,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各项工作。同时,市政府抓紧规划方案的酝酿,立即着手浦东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筹措资金,解决越江交通问题,日夜兼程建设煤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开发浦东的基本条件逐步趋于成熟。

进入 9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展开。上海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目光坚定地移向长江流域地区的“龙头”,中国金融、贸易、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特大型城市——上海。从 1988 年起,小平同志连续 7 年到上海过春节,视察工作。1990 年 3 月 3 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①邓小平对浦东开发表示了极大的关怀。他指出,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股无穷的力量。“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②邓小平要求政治局领导、国务院李鹏同志关心浦东开发这件事。从 1989 年到 1990 年初,江泽民、杨尚昆、乔石、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临上海视察,关心浦东开发,这进一步加快了开发浦东的决策进程。1990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开发浦东的报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李鹏总理当即指示,由邹家华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研究。1990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8 日,姚依林副总理受中央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负责同志来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论证。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专门汇报了上海的情况和开发浦东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下来调研的同志向党中央、国务院送呈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批准。

同年 4 月 18 日,李鹏总理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 5 周年庆典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放浦东、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他指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这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354 至 355 页。

^② 同上,第 376 页。

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情。我希望上海的同志们把开发浦东的事情办好,使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此,浦东成了世界舆论和海内外投资开发的热点。历史发展选择了上海,上海赢得了发展机遇。1993年1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参加了揭牌仪式,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致词,浦东开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跨世纪的宏大工程

上海浦东的开发,是一项寄托了中国几代人希望和梦想的跨越新世纪的宏大工程。浦东新区位于上海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的一块三角形地区。面积约522平方公里。它濒临东海,背依长江,紧靠上海市区,处在被称为中国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交汇处。被人们称为“未开垦的最后一块黄金宝地”。如何开发这块宝地,“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①。邓小平提出浦东开发可以借鉴广东深圳的经验,把浦东搞得好一点,起点高一点,现代化一点,要后来居上。浦东开发按照“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面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思想,建设总目标是:把浦东建成有合理的发展布局结构,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的市政公用设施,便捷的通讯系统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新区。浦东开发采取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协调发展;引进起点高和产业结构合理的项目,重点发展深度加工工业和高技术产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国外资金,新区开发和老区改造有机结合,将浦东开发作为整个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采取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6页。

设立保税区、开发区、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等分层开放方法，在总体上提高上海的开放度。浦东开发分三步进行，“八五”期间打基础，“九五”期间展开大规模建设，2000年后一二十年基本建成。

1. 开发高起点，实施新战略。

浦东开发不是 80 年代经济特区的翻牌模式，它将有新的突破。浦东开发高起点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金融、高科技产业“三个先行”的开发开放新战略，以此推动资金融通、城市交通、高新技术的超前发展，使浦东开发一下子站到现代化经济规律运作的新起点上。

开发浦东，首要的任务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海曾享有“东方巴黎”盛誉。由于历史原因，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停滞、老化状态中，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环境污染，阻碍了上海的发展。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这么大，黄浦江上不搞几座大桥不行。他强调加快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要求：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上海贯彻小平讲话精神，对浦东、浦西作出一流规划，突出重点，构筑了城市设施骨架，通过改革，多方筹资，组织专家反复论证，科学决策，形成了“八五”期间浦东开发十大基础工程，即：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杨高路拓宽改建工程、外高桥港区、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通讯工程、外高桥电厂、内环线浦东段、合流污水工程浦东段、凌桥水厂。总投资达 140 亿元人民币。十大工程，除了外高桥电厂一期工程处于最后冲刺阶段外，其它项目均按照“五年任务、三年完成”的要求，都已提前竣工。

浦东发展受到黄浦江的影响。80 年代初，上海着手研究架桥，从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到黄菊，历任市长倾注了心血。1988 年 12 月 15 日，南浦大桥打下了第一根钢管桩，1991 年 11 月 19 日，李鹏总理亲临上海为大桥建成剪彩，整个大桥仅用了不到 3 年时间。李鹏高度赞扬了上海水平、上海风格、上海效益和上海精神，并要求发扬这种精神把浦东开发开放工作做得更好。南浦大桥是浦

东开发的象征,她改善了浦东开发的形象,吸引了外商到浦东投资,不再认为中国开发浦东是打“政治牌”。继南浦大桥之后,1993年10月,又建成了雄冠世界的杨浦斜拉索大桥。与此同时,又拓宽改建了南北主干道杨高路,连接了各个开发小区。全长24.5公里、宽50米的干道仅用10个月就全线贯通,实现了当年动迁、开工、通车、绿化的目标,创造了我国公路建设的奇迹。上海人民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原定五年时间完成的十大基础工程之后,1993年又抓紧进行了新的十大基础设施设施建设:浦东国际机场、外环线浦东段、电厂二期、深水港工程、浦东地铁、延安路隧道复线、东海油气输送管道等。这些项目的逐步开工,为把浦东建成现代化多功能城区打下基础。浦东开发实施基础设施先行的战略,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也为今后进一步开发积蓄了后劲。

开发浦东,要实现上海“三个中心”的地位,三个中心中,金融为首。1991年2月邓小平同志莅临上海考察,当他听到朱镕基市长在汇报中提到浦东开发要“金融方针先行”时,当即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①邓小平希望上海按照国际惯例,尽快办成金融中心。四年多来,已有28家新的外资金融企业,在上海成立。浦东新区银行存款金融、贷款余额不断上升;证券交易网络不断扩大,交易金额大幅度增长;各类保险承保额已达1200多亿元。以金融贸易产业功能为导向的陆家嘴地区,将成为21世纪新上海中心商务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务的发展,推进了浦东新区各行各业的发展,新增工贸企业3万余家,出现了万商云集的趋势。

浦东开发保持高技术产业先行的态势。4年多来,浦东新区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6—367页。

重提高投资项目技术含量。一批著名跨国公司已将先进技术移植到浦东新区,有的甚至超过了本国的先进技术。如美国杜邦公司的精细化工、罗斯蒙特的自动化仪表、比利时贝尔公司的程控交换机、日本的 JVC 电子产品等。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引进的 200 个项目中,高科技项目占 2/3。张江高科技园区“东上海科技城”项目启动兴建后,目前已有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等 13 个项目进区。此外,国内 300 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组成科技集团也陆续进驻浦东。

四年多来,浦东开发“三个先行”的战略措施,通过“东西联动”的效应,对振兴上海、服务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2. 强化功能,综合开发。

跨世纪的工程,需要分阶段实施。随着浦东开发的深入,提出了浦东开发不单纯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而是全社会的综合开发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浦东开发四年多来,一直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外向型经济功能初步实现,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上海全市平均水平。1993 年全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16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0.2%,高于全市 15 个百分点。共中第三产业增加值 47.43 亿元,增长 46.6%。全年工业总产值 57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7%;工业销售产值 572.07 亿元,增长 30.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1.92 亿元,增长 4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65 亿元,增长 1.2 倍。

浦东开发实行“统一规划、重点突破、滚动开发”的战略,在规划先行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先行启动的四个开发小区的功能开发和形象建设。

陆家咀金融贸易区与浦西外滩隔江相望,以金融、贸易、商业、房地产、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为主,为新上海中央商务区组成部分,区内开工兴建了 54 幢大厦,最高的有 88 层,其中众城大厦、裕安大厦等 5 幢大楼已结构封顶,14 幢大楼进入上部结构施工,31 幢大楼正进入基础施工。已开工的大楼占陆家咀开发公司批租土

地项目总数的44%。亚洲第一高度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座落在浦东新外滩,1994年国庆45周年之际已正式启用大放异彩;文登路商业街初具规模,基本建成,浦东滨江工程第一期已全面竣工;张杨路购物中心和竹园贸易中心正在建设,将于1995年底基本完成。

金桥出口加工区位于浦东中部,其特点是经济效益好、产品档次高、出口比重大,且每年以平均2平方公里的速度开发建设,目前已完成6平方公里土地的“七通一平”,引进项目200多个,60%是高新技术项目,平均每个项目投资规模达到1350万美元,居全国各开发区之首,其中100个项目已开工,30个项目建成投产,率先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外高桥保税区为全国最大的、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开发步子是“一点两面、三年成片”,首期开发,以0.23平方公里的贸易管理中心区外高桥大厦为“基点”,往北开发0.45平方公里仓储区,往南开发2.19平方公里出口加工区。如今这一目标已提前实现。区内中外企业已达900家,其中外资企业占70%,外商直接投资达23亿美元,有近200家中外企业在区内开业。上海保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也已建成开业。

张江高科技园区以各种类型的高科技产业为主,集教育、科研、生产、开发、销售、博览为一体,成为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高科技技术开发区。目前已有十多个高科技项目签约。总之,一个以金融、贸易、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浦东新区的雏形已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经过4年多的开发,浦东新区已逐步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不仅在基础设施、新城市中心区、现代出口加工区、繁荣的自由贸易区等四个方面,而且在环境生态与文化发展方面,以及浦东新区政府为群众办实事等方面,也为人们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浦东新区不但具备资金集散、国际国内贸易、现代产业等物质方面的功能,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

3. 城乡一体,共同繁荣。

“城乡一体,共同繁荣”是浦东开发长期有效的指导方针。上海

市委副书记、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指出：“要从浦东开发的全局和对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高度来认识加强新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要大力推进浦东新区内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和繁荣”。这意味着浦东开发开放在包括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财政税收政策，乡镇管理，行政和组织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方面都要与城乡一体化原则相配套、相适应。

浦东开发，农村地域占整个新区面积的80%以上，农业人口占近1/3。要大面积地使农村地区城市化，这是浦东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涉及到十几万农民在较短时间内由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必须主动地帮助农民完成这一过程的转换，以适应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妥善地安置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参与浦东开发，农民即是开发的主力军、创业者，又是开发利益的获得者，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精神。目前，在陆家咀、金桥等区建立的与农民联合开发的公司，已初步创造了城乡一体、共同开发的经验。

浦东开发面临的现状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开放竞争日趋激烈，农业面临着农田被征，劳力减少、投入降低的多重压力。现代农业是资金、技术、知识集约的产业。新区农业确定的发展方向是：旅游观光农业、宾馆农业、绿化生态农业、创汇农业。近期内以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区域布局、调整经营模式为要点。1993年大力推广了种植D8506、寒优湘晴等优质米品种，劣质、低抗的基本淘汰；无花果、猕猴桃等特色瓜果开始占据新区农村“花名册”，1993年种植面积达4000亩，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贸易、工业、农业一体化，无花果被龙头产业集团公司加工成诱人口味的蜜饯；不淘洗优质米由产加(工)销一体化基地六团乡产出；风味独特的6000羽绿头野鸭由浦东珍禽市场提供上市。

浦东开发，城置于乡中，乡辅以城围，城带动着乡，乡推进着城，进而城乡齐飞，城乡莫辨，共同繁荣。

开创性的伟大事业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邓小平告诫上海，浦东开发只能进，不能退。针对上海的实际他还强调：“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①浦东开发要大胆闯一闯，要走出一条新路来。

开发浦东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成绩，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情况下起步的。但是，也面临着国际、国内不利的因素，特别是上海老市区集中过多，财政负担过重，工业比重过大，制约新区发展。为了支持浦东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浦东开发十项优惠政策；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外商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等十个基本法规，又公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地投资浦东新区的三个暂行办法》等三个法规；为加快浦东开发，国务院又给予浦东新区扩大五类项目审批权限，从五个方面扩大浦东资金筹措渠道。

这些具有权威性、综合性、可操作性和开放性极强的政策法规，形成了浦东开发的特色所在：允许外国企业在浦东开发百货商店、超级商场等第三产业，这是一项突破性很大的新政策，即给外资商业企业零售权、百货品进口权、收购出口权、外汇调剂权以及部分进口日用品内销酌情减征关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等。允许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为浦东开发自行审批发行人民币股票和B种股票。在浦东外高桥设立中国开放度最大的保税区，区内实行免关税，免许可证，允许设立内资、外资国际贸易机构，企业外汇全额留成，各国货币自由流通等特别优惠的政策。允许外资在整个上海范围内开办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所有这些构成了浦东新区在开发、开放上，比其它特区有所突破、有所完善、有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开拓之新意所在,这些并为浦东开放、开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充分的活力。

浦东开发坚持打好“世界牌”、“中华牌”,以新的气势,扩大开放的新力度,把吸引外资、内资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百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到上海投资。至1994年2月底,浦东新区三资企业已有1831家,总投资70.8亿美元,协议吸收外资35.6亿美元,是浦东开发前的40倍左右。浦东三资企业的数量和金额已占到上海全市的1/4。已有39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7个西方工业强国,以及澳大利亚、以色列等中等强国,甚至玻利维亚、西萨摩亚等小国企业也投资浦东,浦东全方位向全世界开放。外商投资的蜂涌而入带来了浦东新区经济大幅度增长。1993年浦东出口交货值达到10亿美元,其中增长的一半以上是外资企业实现的。这些企业促使了上海产业整体水平获得跳跃性提高。与此同时,国内各省市、中央和部委来浦东投资的内资企业也大幅度增长,1993年底达到3137家,投资累计金额达222.5亿元。上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世人瞩目的投资热点。

浦东开发,需要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实施优惠的政策,但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政策的威力在于招商,体制的威力在于搞活,浦东开发在于重塑上海城市功能,把上海建设成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三方面功能的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流域的共同繁荣,为探索中国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路作出新贡献。为此浦东应力争成为全国最大的改革试验区。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浦东在开发、开放中明显加大了市场、企业、政府三位一体改革的力度。主要表现是:加快市场体系的建立、培育和发展,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共荣的方针,适应和完善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关系,提高长江流域经济的整体效益,为兄弟省区开辟与国际市场连接的窗口;加快企业改革,搞活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建立统一、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机构,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

则,做到新区新事新办。浦东新区管委会是目前中国特区管理机构中最小的一个。浦东新区经济运行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定将促使上海经济的振兴和腾飞。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发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是党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的新的目标和要求。到本世纪末,浦东要基本形成新上海的轮廓,新区城市化面积达到 100 平方公里,陆家咀地区初步建成一个新外滩;浦东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 800 亿元,实现 10 年翻三番的目标,浦东新区整个经济实力占整个上海经济的比重将从 1990 年的 1/13 跃升为 1/4;加紧建设综合性大学、高等院校、技术学校和基础教育相配套的教育体系,建立一批高档次的医疗、文化设施,从而把浦东新区建成具有一流的市政基础设施、一流的商务活动中心、一流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区、一流的出口加工基地、一流的城郊农业和一流的高质量生活区的开放、开发示范区。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党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支持下,上海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完成开发浦东的千秋大业,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浦东新区将以 21 世纪国际大都市的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改革开放在珠海

陈锐明 刘利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我国开始踏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而设立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我国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创举。

一、珠海经济特区的初创

珠海经济特区的诞生经历了一段孕育过程。早在197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在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归来,向省委汇报时提出建议,希望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能先行一步,选择一个地方试点。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会上听取了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汇报,肯定了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及我国的重要侨乡之一的汕头兴办特区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后报告中央审定。受中央委托分管此事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于5月份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10多位负责同志前往广东调查。6月,中共广东省委在上呈中央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7月15日,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指出:“广东、福建

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关于出口特区，可能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80年3月下旬，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对中央指示贯彻的情况，进一步研究特区建设问题。会议指出，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保障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并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名称改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要求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建设。提出“根据目前两省的财力、物力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5次会议，对建立经济特区问题进行审议，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标志中国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正式诞生，从此拉开了我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

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既无固定模式可循，也无现成经验可学，只能在实践中探索。把特区办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其产业重点是什么？这是建设特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对此，特区创办初期，人们曾有过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珠海农渔业人口较多，基础较好，出口鲜活产品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主张以发展农渔业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珠海毗邻港澳，是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宾进入国门的第一站，且珠海依山傍海，风光绮丽，气候宜人，发展旅游条件优越，主张以发展旅游为主；第三种观点认为，珠海是国内通往港澳和国际的重要口岸，主张以发展商业贸易为主；第四种观点认为，珠海特区享有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优惠，应以发展工业为主。上述不同意见的争论，加深了我们对各业在珠海经济特区建设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的理解。但从当时领导的精力和资金的投放重点看，实际上是侧重于发展旅游业。

然而三年过去了,特区的发展却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值。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再次提出重新认识珠海经济特区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84年视察了深圳、珠海等地,明确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①邓小平对特区功能和作用作出的形象而深刻的科学概括,为特区建设指明了方向。珠海市委立即组织广大干部学习邓小平指示和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一系列文件,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并请专家学者论证,最后形成共识:珠海应“走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道路。大家认为:第一,中央试办经济特区,不仅是为了多建一个繁荣的边境城市,更主要的是要发挥“窗口”、“基地”和“试验场”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道路。从珠海的实际出发,旅游起步,发展商贸,有利于积累资金、方便客商实地考察和洽谈生意,对特区发展起着积极作用,但要发挥“窗口”和“辐射”作用,有效地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那就非以工业为主不可。第二,由于珠海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不可能各业齐头并进,必须分清主次,明确重点,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起关键作用的工业上,才能促进各业发展。第三,只有以工业为主,兼营各业,才能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群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既体会了邓小平同志创办经济特区的意图,又符合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从1984年开始,珠海经济特区建设,经过重新审定总体规划,确定阶段发展目标,终于进入全面开发的阶段。1984年一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3亿元,占全市完成基建投资的7成多,相当于试办经济特区4年来基建投资总和的2.7倍;基建竣工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几年的总和。经济特区可开发的10多平方公里范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1、52页。

围内,已经全面开展了以“七通一平”(电、电讯、供水、排污、排洪、预留煤气管道、通路、平整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基础工程建设,新建公路7条。同时完成了在道路两侧埋设自来水、排污、排洪、电缆、通讯线路等设施,珠海至香港的货运及到澳门的客运业已正式通航,综合性深水港口也已开始作施工准备,中型国际机场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11万伏变电站和与之配套的5个变电站,有的已竣工,有的加紧施工;火力发电厂已投入使用,程控电话有2000门已投入使用,另有2000门即将投入使用,并开通了与香港、澳门等地的直拨电话。

珠海市委领导总结试办特区的经验,确定了珠海经济特区必须“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各业”,建设一个以工业为重点的综合性经济特区的发展方针后,珠海经济特区开始走上了以工业为重点的综合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1984年全市引进外资600多个项目中,属工业项目的有528项,占87.4%。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显著增大,从1983年的65.4%上升到1984年82%,财政总收入14804.8万元,比1983年增长135.32%,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1984年全民职工人均收入1817元,比1983年增长32.1%,农渔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753元和1217元,分别增加154元和409元,增长幅度为25.7%和50%;城镇职工住宅竣工面积17万平方米。由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但外逃港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1984年还有120名过去外逃到港澳的人员回归定居。

二、特区经济全面发展

珠海特区改革开放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时期,即1980年至1985年,这期间主要是探索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以工业为主,农渔牧、商业、外贸、旅游、房地产各业综合发

展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针,兴建基础设施,搞好投资环境,并广泛的对外接触和引进,为大规模经济开发打基础,为特区的腾飞培养人才,积累资金和经验。第二阶段是1986年至1990年,为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中央关于特区要从初级阶段的“打基础、铺摊子”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的指示,广泛开展外引内联,正确引导资金投向,使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日趋合理。在项目审批上实行“三个优先审批”(出口创汇的内联企业和三资企业,优先审批;生产原材料的基础工业,优先审批;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项目,优先审批),并及时作出以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核心的“五个转变”的决策(从以依赖国家优惠政策为主转向主要靠自己力量为主;从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转向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和基础性工业为主;从以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向着重依靠企业内部挖潜、革新、改造,提高经济效益为主;从以国内市场为主逐步转向以国际市场为主;从以利用国内资金为主转向以利用外资为主)。同时,还作出并实施了以特区为中心,带动珠海东西两翼的发展,加强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建设的战略决策,推动特区的发展迈上新台阶。

进入90年代,珠海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目标是用15年的时间,把珠海建设成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文明富裕的国际化现代化城市。把引进外资的重点,转移到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项目上,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幅员1200平方公里的珠海西部地区,致力于开发大港口,带动大工业,发展大经济,实现大繁荣。特别是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办经济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同志,再次亲临珠海视察,并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谈话,进一步为特区的改革开放挑灯引路,乘此东风珠海再次掀起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高潮。

珠海辉煌的15年,是不断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大胆实践,走出一条新路的艰难攀登。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在创办特区之初所指示的:建设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特区要大胆地

闯,大胆地试,不敢闯,不敢冒,就走不出一条新路来。15 年来的发展就是实践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这正是珠海特区之所以能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在实践这一伟大理论的过程中,珠海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和努力。

始终致力于投资环境的改善,从建设大经济区域的战略高度出发,超前进行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珠海从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交通、通讯、能源都极端缺乏。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特别是发展到 80 年代末期,投资环境虽有了不少改善,但仍缺乏适应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港口、铁路、机场和电信设施,供水、供电也存在困难。市委、市政府认为,要使珠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不仅要搞“七通一平”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经济发展上必须着眼于全国,放在与世界经济衔接的高起点上,超前进行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建设位于西区,决定珠海前途的重点工程项目,尤其是建设能与世界各国交往和合作的大港口。1992 年,珠海西部地区被列为省 90 年代的开发重点后,市委市政府按高标准、高效率的要求,决定加快基础建设的步伐。其后,仅一年多的时间,跨海 3 公里长八车道宽的珠海大桥竣工。目前,从市区到珠海港的 50 公里快速干道已全线通车,从两万吨泊位到 20 万吨泊位的多功能性,年吞吐货运量一亿吨以上的码头,正在紧锣密鼓地兴建,两个两万吨级泊位的码头已建成。按国际标准修建扩建的珠海机场即将通航。广珠高速公路、广珠准高速铁路,372 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日供水量 160 立方米的供水厂,也已兴建或奠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加紧进行,不仅改善了投资环境,使珠海过去十多年中成为投资的热点,而且将使珠海今后的经济发展具备强大的后劲,对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地区乃至我国华南、西南的大片地区的发展产生重大积极作用,对世界也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和影响。

外引内联,是珠海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从创办特区开始,珠海就把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作为主要任务,

并坚持外引内联相结合,努力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特区成立以来,利用外资势头强劲,问鼎珠海的有实力公司越来越多。如日本松下、美国远东科东、泰国惠保、香港和记黄埔、长江实业、金山电脑等公司都在珠海有大规模的投资。到1993年底止,珠海批准利用外资合同、协议共5817项,合同、协议投资总额91.5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额64.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2亿美元。投资客商已从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拓宽至欧美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投产开业的三资企业1408家,其中,全市投资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187项,有的项目投资额超亿美元。1993年全市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99.28亿元人民币,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7%。出口6.65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63%。横向经济联合也有声有色,15年来珠海已与中央各部门的30多个单位和50多个市、县建立横向经济联合,到1993年底止,全市共计拥有内联企业3104家,其中内地独资企业2177家,办事处668家,内联企业协议投资总额达85亿元,其中内地投资62亿元。内联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近年来,珠海又把联合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与国内的大专院校、科研部门和国家各部、委、总公司及其他大型公司合办高新技术或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项目,以及大型基础产业项目上。这对提高珠海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总体水平,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合理配置,促进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衔接,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外引内联经济举足轻重,已成为珠海经济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全市经济的主导,尽心尽力把珠海建成高新科技产业的基地。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小平同志要我们重视发展高新科技,这不仅是特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也是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因此市委市政府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走科技兴市、科技兴特区之路。从1990年起,就逐步把劳动密集型的项目,转到农村去,转到内地去,逐步将全市经济的重点转移到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和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上来。并制定了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从1992年开始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实行重奖的政策,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吸引了国内外大批科技人员来珠海转化科技成果、兴办企业。据统计,重奖至今,与人才同时进入珠海的项目有300多个以及8亿多资金,珠海特区经济中的高科技含量已由1991年的8%提高到1993年的13.6%。国家级、省级星火、火炬计划项目及专利项目在珠海实施的数量大增,全市1993年高科技项目产值已达21亿,技术出口460万美元,是重奖前的几倍。全市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也已达40多家,产品60多种。1994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考察珠海时对科技重奖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你们有一套吸引科技人才的办法,对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实行重奖,这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你们很有胆识。”高新技术含量高的企业,现已逐渐成为珠海经济发展的支柱和龙头。

按照中央创办特区的要求,充分发挥珠海改革开放“排头兵”和“试验区”的作用,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珠海率先大胆地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采取积极措施培育资金市场,多渠道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了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先后设立了外商投资服务管理中心、内联投资服务管理中心、科技协作服务管理中心、基建项目审批服务管理中心等机构,实行“一条龙服务”。在企业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试验,逐步转换机制,增强企业的活力。与此同时,在市场建设、住房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成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胆尝试。

珠海特区还重点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改革。珠海总结出城市建设“八个统一”,土地管理“五个统一”,环境保护“八个不准”的规范化管理经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土地预征、统征,严格控制用地,并着力搞好基础设施和社会设

施的配套及环境保护工作,使土地形成有价值的宝贵财富。再通过回收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和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使土地开发、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投入逐步有所回收,从而呈现“投入——回收——再投入”的良性循环的态势。城市建设则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进行,至1993年底新建城区50平方公里,城镇化水平也由建市初期的17.7%发展到1993年的50.63%。1988年珠海被评为广东省唯一的市级环境保护先进单位;1992年被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园林城市”,并获得“国家卫生城市”荣誉称号;1993年又被建设部评为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地级市。珠海在城市规划、建设、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改革及成就,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李瑞环同志说:“珠海的城市规划是中国一流水平”。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珠海时也称赞珠海某些方面已经可以和西方先进城市媲美。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考察珠海对珠海重视城市建设中科学的总体规划也感受颇深,他称赞“珠海有一个科学的总体规划,本身就是财富,总体规划制定好了,就可以迅速转化为新的财富”的观点好,有战略头脑,也合乎辩证思想。并对土地管理权限高度集中,由政府管着,市长一支笔的审批办法表示支持。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毫不动摇地使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硬起来,这是特区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特区成立十多年来,珠海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摆到重要位置上来。早在特区建立之初,市领导成员就一方面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改革开放意识;另一方面,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因经济活动的特殊性而忽视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一战略任务。按照这一方针,珠海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教育。注重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在阵地建设、双拥共建、企业文化活动、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特别最近几年，市政府相继拨出巨款，绿化全市，美化街区，净化市区，建设景山公园、海滨公园、新华书店等。1992年又决定拨出10亿元建设国内水平一流的体育中心、科技中心、广播电视中心、医疗康复中心、珠海大学等硬件设施。珠海还先后被国家、省有关单位授予“双拥共建模范城”、“双拥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十佳城市”、“十三年征兵工作全优城市”、“计划生育先进城市”等光荣称号。

珠海党组织的建设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建市时的1979年全市有党员16862名，到1991年党员人数达到31277名，新增党员大部分是在珠海市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培养和发展的。现在各行政单位、各企业单位的重要岗位，绝大多数由党员负责。

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央和省各部门以及全国人民大力支持和帮助的结果。这些成就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创建经济特区的思想和决策是正确的。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带动了内地的繁荣，也使我国整个对外开放的工作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三、邓小平同志肯定珠海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1992年是珠海特区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这年1月23日至29日邓小平同志在广东省和珠海市的主要领导同志陪同下，以88岁的高龄再次视察了珠海。

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汇报改革开放和试办特区政策给广东和珠海带来的可喜变化后，谈起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和经济特区的创办，再次强调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提醒大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

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他还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同志发表上述谈话时思维十分敏捷、思路非常清晰。

邓小平在珠海短短的七天里，先后视察参观了珠海生化制药厂、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内联企业江海电子公司等。当他亲眼看到珠海的创业者按照他设计的蓝图把珠海经济特区办得充满生机和活力时，内心充满喜悦，深有感慨地说，珠海发展真快，变化真大，很了不起。并称赞：“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他还在几个场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

邓小平同志在珠海期间，曾先后三次驱车专门考察珠海特区的城市建设，观看了拱北、吉大、香洲及唐家一带的市容。在参观过程中，梁广大汇报了珠海市按“八个统一”的严格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做法。邓小平赞同珠海市政府为保护依山傍海的自然风光，严格限制建筑物高度，认为“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

梁广大还汇报说，珠海的投资环境已吸引了很多外商前来投资，仅1991年就签订了500多宗合同。听到这儿，小平同志风趣地说：“要是我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当梁广大汇报到1991年珠海市工业总产值已突破百亿元大关时，小平同志又满意地评价：“你们这个发展速度很快了。”梁广大说，我们是按照您指引的改革开放道路走过来的。我们一定坚决

把您的决策贯彻到底。对此，小平同志笑着说：“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当小平同志在考察途中看到一幢幢漂亮的农、渔民住宅时，不禁问道：“广东的农民收入多少？”谢非书记回答说：“去年全省人均收入 1100 多元。”小平同志说，我看不止这个数，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洋房，买不起这么好、这么多的家当，这个算法不准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

当小平同志看到珠海工业区到处是崭新的工厂和正在施工的工厂时高兴地说，现在总的基础不同了，我们十年前哪有这么多工厂。几个工厂都是中等的水平。现在大中型厂子里头的设备多好呀，过去我们搞“两弹”必需的设备 and 这些比，差得远呢，简单得很哪，不一样啦！

由此，小平同志再次谈到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他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八四年到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他接着说道 1989 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

进。

邓小平同志视察珠海的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珠海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使广大干部群众对许多年来感到困惑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珠海市委及时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视察珠海的重要谈话,振奋精神,决心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把珠海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从1980年创办经济特区至今,珠海已经走过了15年的光辉历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创造了自己的辉煌。

珠海建市前,经济主要以农、渔业为主,生产方式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属广东省经济落后地区之一。建市前的1978年珠海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6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总产值1.23亿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7.3%;地方财政收入3013.3万元,出口创汇604.5万美元。经过15年的艰苦创业,开拓努力,珠海经济特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珠海人民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珠海历史的新篇章。昔日那个贫穷落后、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兴城市已经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南海之滨。

1993年珠海国内生产总值122.8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建市时的1979年增长25.8倍;工农业总产值201.48亿元(1990年不变价),增长48倍。其中工业总产值193.3亿元,增长108倍,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上升到95.9%;工业产品出口占工业总产值的50.3%;外贸出口总值106亿美元,增长112倍;财政收入14.78亿元,增长62倍,人均国民收入已过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9.2亿元,增长217倍;实际利用外资5.63亿美元,增长133倍;城乡居民存款余额67.41亿元,增长222倍。1992年,中国城市评价中心运用最新流行数据,对全国18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

城市的综合实力进行了全面评估,评选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珠海荣列金榜;评价中心同时对城市的投资硬环境进行评估,选出“投资硬环境四十优城市”,珠海名列第七;1993年,在全国24座基本实现“小康”的城市中,珠海综合指标名列第四,在城市建设、城市化水平、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方面,珠海均列第二。

珠海特区的国民经济十多年来一直保持全面、持续、高速地增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其经济发展速度是珠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七年中,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递增60%的速度发展。在建立经济特区的15年中创造了国民经济平均增长40%的高发展速度。珠海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等在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中均居前列。

珠海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产销两旺。1993年工业产值比1979年增长48倍,并初步形成有十大工业部门、30多个行业,门类较为齐全,结构较为合理的工业体系。工业企业已由1979年的278家发展到1993年的4000多家,其中培植出大型企业集团13家。1993年全市实现产值62亿元,有工业产值超亿元企业27家,利税超千万元的企业10家,出口创汇超千万美元的企业20多家。

“特区农业为城市服务,为出口服务”是珠海发展农业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珠海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产值稳定增长。1993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8.18亿元,农村社会总产值69亿元,比1992年增长50.8%。其中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产值增长95.7%,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相应提高到81.7%。全市乡镇企业达7700家,乡镇企业总收入58.8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58.27亿元,其中乡镇工业产值50.93亿元,出口达15.01亿元,全市有7个村跨进了亿元村行列。

对外贸易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珠海外贸出口由1979年的628万元增长到1993年的10.6亿美元,年均增长44.2%,累

计出口创汇 44.06 亿美元。积极拓展远洋市场的结果是外贸出口范围覆盖五大洲的 60 个国家和地区。特区在国外创办的企业也已达 12 家,投资总额 2451.23 万美元。

1993 年,珠海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 1979 年的 1.3 亿元增加了 38.7 倍,达到 51.7 亿元,共建商业网点 2000 多个。全市共改造和新建集市贸易市场 54 个,建筑面积达 15.5 万平方米,1993 年全市集市贸易成交总额达 16.5 亿元。每年平均递增 30% 以上。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初步形成了“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

珠海环境优美,风光如画,毗邻港澳,又是“百岛之市”,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1993 年,经珠海口岸入境人数达 2296 万人,旅游外汇收入 8.46 亿外汇人民币。从 1979 年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石景山旅游服务中心”算起,15 年来,全市已建 24 家涉外宾馆,其中 19 家为星级宾馆,占全市旅游涉外宾馆总数的 79.2%。旅游设施累计投资 31.4 亿元。1991 年中国旅游名胜四十佳评选,珠海荣获“珠海旅游城”称号,全国以整座城市当选的独此一家。

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珠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地提高。1979 年,全市职工人均收入 612 元,农民人均收入 311 元。到 1993 年,职工年均工资 7393 元,农民人均收入 1710 元,渔民人均纯收入 3570 元。全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 6875 元,连续第五年超过国家统计局提出的 2380 元的小康量化标准。银行年末存款余额为 143.7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8%。其中,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 67.4 亿元,增长 50%。人均储蓄存款达 1.18 万元。人均居住面积 16.5 平方米,已是小康水平 8—10 平方米上限指标的 1.65 倍,达到了国际通用的舒适的标准。录像机、高级音响、空调机和住宅电话,到 1992 年,每百户拥有量也已分别达到 58 台、42 台、84 台和 94 部。

与此同时,珠海特区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不仅发挥了改革开放“窗口”和“试验区”的作用,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还同国家和内地提供了 20 多亿元的税利和其他收入。珠海地方财政也由改革开放前靠上级财政补贴,一举改变为自给有余,同时上交国家和省的收入也逐年增加,由 1980 年的 1630 万元,增加到 1993 年的 2.27 亿元,除了海关代征税和金融保险税外,珠海地方财政 1980 年至 1993 年累计上交中央和省财政 8.03 亿元。

珠海特区创造的成就不但值得珠海人民引以自豪,更向世人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试办经济特区的伟大成就。它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领导的特区事业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特区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体现。

改革开放在厦门

黄 顺 通

厦门位于东经 118°04'04", 北纬 24°26'46", 由厦门岛、鼓浪屿及内陆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分和同安县组成, 总面积 1516 平方公里, 人口 117 万。传说在遥远的古代常有成群的白鹭栖息在厦门岛上, 因此厦门素称“鹭岛”。厦门风光秀丽, 气候宜人, 海港优越, 历史上曾是华侨出入的门户和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口岸。1949 年 10 月 17 日, 五星红旗插上厦门岛, 人民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1958 年“万炮轰金门”及炮火中产生的“英雄小八路”群体又一度使厦门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但是, 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对峙, 厦门作为距台湾最近的大陆海防重镇, 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 厦门才真正焕发了青春, 由一个半封闭的海岛小城发展成为具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万商云集的海港风景城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基地”, 厦门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

(一)

1979 年 7 月, 党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 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崭新试验。厦门市委审时度势, 决定以打开厦门港口的对外交通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1980 年元旦, 大型客轮“鼓浪屿”号从厦门港驶过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担、二担岛屿附近的

海面，直航香港，台湾海峡上空硝烟开始消散，厦门迈上了对外开放的新征程。

1980年4月，厦门市委、市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呈交《关于厦门经济特区的报告》。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厦门西北部的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设立经济特区。经过一年筹划，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破土动工。

特区建设的起步是艰难的。厦门长期作为海防前哨，城市建设发展缓慢，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远不能适应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的需要。因此，特区建设的任务既艰巨又繁重。厦门经济特区的初创阶段，中共厦门市委把改善投资环境，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当务之急，制定并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方针，按照立足实际，量力而行的原则“筑巢引凤”，并适当举借外债，快步建设基础设施，为吸引外资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又采取了“以地养城”的策略，通过实行土地批租，引进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能源、交通、通讯等方面的顺利进展。在建设中注重投资效益和协调发展，做到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收效一片。十年间，全市直接用于基础设施的全民基建投资达15.17亿元。与1980年相比，城市面积扩大了2.2倍，自来水供水能力增长2倍，用电总量增长3.8倍，邮电业务总量增长19.1倍。厦门现已成为全国十大航空港之一，客货运量跃居全国第五位。在改善投资硬环境的同时，市委还对改善投资的软环境给予极大的重视，制定了“以智取胜”的方针，即根据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利用厦门原有教育基础较好的优势，在不断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同时，调整教育结构，采取联合办学、社会办学、委托代培等形式，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形成以全日制教育为骨干、职业化教育为重点，高、中、初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相结合的特区教育体系。十年间，全市教育经费年均递增20%，职工参加培训率年平均占30%以上，各类学校为特区输送了20余万名适用人才，特区范围内现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占人口的9.6%，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此外，市委、市府还大力加

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倡导“开明、守信、竞争、开拓、奉献”的特区精神,制定涉外法规条例,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等中央领导,以及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万里、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先后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对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作了重要指示。在厦门特区建设的关键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于1984年2月7日视察了厦门。在此之前,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和珠海。

2月8日这天,小平同志、王震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军区领导陪同下,乘坐“鹭江”号游艇一边游览厦门鹭江两岸的风光(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的海面称为鹭江),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王震同志特意安排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坐在小平同志身旁。项南同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小平同志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然后说:“我看可以。”在场的省市领导都不由地露出会心的微笑。项南同志又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当局控制的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王震同志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想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接着他又询问关于自由港的政策包括哪些,在场的省市领导议了一下,由项南同志归纳起来作了回答。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小平同志静静地抽着烟,望着海面陷入了沉思,他要仔细地、深入地思虑一下这个问题。

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荫路上,小平同志问项南,厦门机

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小平同志对项南的考虑极表赞成，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他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大家摄影留念。

2月9日一大早，小平同志又来到了厦门大学，在视察校园并和学校各部门负责人、著名教授合影留念后，便匆匆驱车驶往湖里工业区。当时的湖里工业区，也就是初期的厦门经济特区，还是一个大工地。虽说到1983年底已经基本完成了“四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举目望去，除了特区管委会办公所在的综合楼外，工业区内成形的建筑物，只有一座印华地砖厂的厂房和两座通用厂房，特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印华地砖厂尚未投入生产。刚从深圳过来的小平同志明显地看到了厦门与深圳的距离。他来到特区管委会二楼的接待室，听取湖里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接待室里有一座厦门经济特区远景规划模型，小平同志站在模型旁，一边听汇报，一边思考问题。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在对台关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深圳毗邻香港，吸引了不少港资，厦门的开发也必然会吸引台资，更重要的是会缓和海峡两岸关系。实际上，尽管当时台湾上层人士态度僵硬，但一些民间有识之士已经悄然来到厦门寻找机遇。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小平同志题词留念时，小平同志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相比较，这句话多了一些鼓励，多了一些鞭策，多了一份期待。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感觉到了这句话的内涵。那就是厦门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厦门一定要上，一定要快上。题词在报纸上公布后，特区的建设者们也都感觉到了这句话的份量，人们心中激发起一种追赶和超越深圳的强烈信念。小平同志这次来厦门视察时虽已80高龄，行程却仍然安

排得非常紧张，他每天上午都外出视察，没有外出的时候，就在下榻的厦门宾馆五号楼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代表、台湾同胞代表、华侨和港澳人士等。2月10日上午，在接见了最后一批客人之后，他冒着霏霏细雨来到万石植物园，种下了一株香樟树苗，而后便同随行人员一起登上旅行车赶往火车站，乘火车踏上归程。

2月24日，小平同志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够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本着这一指示的精神，厦门市委、市政府及时制定了扩大特区范围的实施方案，1985年6月29日，国务院在《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中，正式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包括鼓浪屿），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指出“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的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做出的重要部署。”

按照小平同志构思的蓝图，1988年4月23日，国务院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使厦门拥有更多的改革自主权，为特区尽快建立起与外向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提供了重要条件。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厦门特区出现了以台商为主的投资热。到1989年春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00多个，其中台资项目占1/3。面对台资大量涌入的情况，市委、市政府积极向中央申请在岛外开辟台商投资区。1989年5月20日和1992年12月，国务院先后批准将厦门市辖约120平方公里的杏林、海沧地区和计划面积78平方公里的集美地区为台商投资区，享受经济特区现行的政策待遇。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发挥厦门在

人文、地理方面的优势,加强对台工作,把台资作为引进的重点,实行“以港引台、以侨引台、以台引台”的方针,使厦门逐步成为台商来大陆投资贸易、旅游探亲、寻根谒祖的热点,从而很快使厦门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获得突破,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

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视察南方,其重要谈话中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的讲话精神传达后,更给厦门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市委、市政府因势利导,作出了围绕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设立象屿保税区,建立特区管理线,加大改革份量,扩大对外开放,力争用20年左右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把厦门建成“社会主义香港”的决策。这一决策为厦门经济特区提出了更为宏伟的发展目标,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

改革和开放是特区发展的两个轮子。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厦门充分发挥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确定特区的改革以增强企业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以构造符合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为发展目标。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后的十年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是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建立与特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大力兴办外资企业,允许私营、个体企业存在和发展,逐步形成全民、集体、内联、“三资”、私营和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是改革企业经营机制,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大胆借鉴和引进“三资”企业的管理办法,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实行多种形式的工

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改革企业劳动人事制度,实行用工合同制和干部聘任制。同时进行相应的税收改革,1988年率先把66家市属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统一所得税率,取消调节税,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税后利润承包上缴。这项改革获得了很大成功,现在已在全国普遍推广。

三是改革对外经贸体制。按照政企分开、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原则进行外贸体制改革,逐步形成由国家专业公司、地方外贸公司和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工业企业组成的既分工又协作、有联合又有竞争的特区外贸体系。改革外汇分配制度,确定政府不承担企业之间用汇调节,政府用汇大家出的原则,实行企业创汇5:95分成的办法,把外汇大头留给企业运筹,并按企业的实际情况,划定上缴利润的留成比例,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汇积极性的经营效益。

四是改革宏观调整体制,培育市场体系。在抓住时机进行物价、住房制度改革的同时,积极建立和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使特区的生产资料供求从特区建立初期的计划分配为主转向以市场调剂为主。1993年厦门的生产资料总供求的97%已由国内外两个市场自行调节,生活资料则已全部放开。在金融市场方面,成立融资公司,设立外汇调剂市场,兴办外资银行,初步形成短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 and 外汇调剂市场三位一体格局。此外,先后建立了市县(区)劳务公司、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所等常年性服务机构,全面开展劳务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指导 and 职业介绍工作,基本上满足了特区各类劳动力的需要。

企业改革的同时,政策职能逐步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从分钱、分物、分指标为主转向指导、咨询、服务,为厦门经济的发展制定规划和政策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厦门从改革入手,积极探索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第一家地方性航空公司,最先提出建设中国的保税区。在这些政策举措下,生产资料保税市场和12家保税工厂、38家保税仓库,两家出

口监管仓库以及高崎联检大楼相继在厦门建成,逐步实现了货物进出口自由,也吸引了国内外金融家纷纷而来,现在厦门除了中央银行、5家专业银行和一家地方银行外,还拥有15家外(合)资银行,以及20多家信托投资、保险公司、城市及农村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平均不到4000人就有一家金融机构,其密度在全国名列前茅。

十年来,厦门经济特区坚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实行“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台港侨外都欢迎”的方针,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拓展外商投资领域,加速国内国际市场接轨,从而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步伐。十年来全市累计签批直接利用外资项目2268项,利用外资合同外资金额66.9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4.42亿美元。全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已占全市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1.2%,工业产品出口交货产值已占工业销售产值的31.9%,并在境外创办了2000多家企业和代表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同时,加强了横向经济合作,全国各地先后来厦兴办了内联企业2086家,利用内地资金23.3亿元。依托闽南、闽西、赣南、湘南等经济腹地,厦门建立了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科研机构和企业集团,形成了依托内地,联结中央各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经济协作网络。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特区的过程中,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特区十年来,厦门人民锐意进取,开拓前进,厦门经历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十年。1993年,全市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08.04亿元,比1983年增长5.64倍,年递增20.85%;工业总值完成178.97亿元,增长10.81倍,年递增28%;农业总值完成12.5亿元,增长75.9%,年递增5.81%;国有单位固定资产资金37.87亿元,增长14.42倍,年递增31.47%;港口货物和吞吐量920.61万吨,增长2.49倍,年递增13.33%;社会零售总额54.56

亿元,增长 9.07 倍,年递增 25.98%,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40.95 亿美元,增长 28.28 倍,年递增 41.17%;签批直接利用外资合同 655 项,增长 28.77 倍,年递增 40.40%;协议利用外资 24.04 亿美元,增长 27.48 倍,年递增 39.79%;实际利用外资 10.37 亿美元,增长 129.65 倍,年递增 62.78%,外商投资项目履约率、到资率均居全国首位;预算内财政收入达 19.36 亿元,增长 7.35 倍,年递增 23.64%。1992 年厦门市名列全国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第十强,进入全国投资环境四十优城市的行列。

科教文卫旅游等事业与经济同步发展,城乡人民收入增加,1993 年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达 4033.94 元,农民纯收入人均 1690 元。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9.56 平方米。电话普及率 27.92%,居全国第二位。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群众性的精神文明活动更加活跃,军民共建不断谱写着新的篇章,市容市貌和社会公德也有了很大改观。鉴此,厦门被命名全国“双拥模范城”,并被评为全国“卫生城市”。

(四)

十多年来,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和条件,厦门在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突出。

自 1987 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以来截止至 1993 年,前来厦门的台胞人数已近 60 万人次,约占同期来大陆台胞总数的 1/5 强,厦门已成为两岸人员交往最活跃的地区。来厦台胞不但人数多,而且交往的层次高、范围广。从 1989 年到 1991 年,来厦台胞中的“上层人士”达 500 多人,其中有“立委”、“国大代表”、“省(市)议员”、退休“将军”、国民党“中委”、全台性社团负责人,以及台湾地区前五百家大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来厦台胞包括党、政、军、民各界和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有的还是台湾当局的现职公务人员。

从1984年第一家台资企业进入厦门以来,截至1992年厦门的台资企业项目已逾500项,资金达11亿美元,分别占大陆引进台资项目总数的1/8和资金总数的1/3,厦门已成为祖国大陆台资最集中的地方。在厦台资项目还具有生产性项目比例高(占90%以上)、产品出口比例高(占80%以上)、长期性投资项目比例高(自建和购买厂房的项目占50%以上)、技术水平高等特点。台资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比较好。

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厦门成为大陆各地与台湾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一方面,台胞利用厦门作为他们与大陆各省、市、自治区联系交往的场所和进入大陆的门户,另一方面,大陆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单位也利用厦门作为他们对台交往的窗口和桥梁。到1991年上半年,国家各部委直属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在厦门设立的以做对台生意和吸收台资为主要目的的办事处和公司即达1300多家。从1988年3月厦门正式举办第一届“两岸文化研讨会”起,至1991年,在厦门举行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共60多场次,出席台胞近2000人次,交流内容涉及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新闻、体育、卫生、宗教、建筑、环保等领域。厦门已成为海峡两岸科技文化交流的幅射点。随着两岸各项交往的日益频繁,涉及两岸的重大事务也不断增多。近二三年来,许多涉台重大事务从双方接触、商谈、签订协议,到具体实施操作,往往都选择在厦门进行并在厦门完成的。如今,弥漫在海峡两岸的炮火硝烟早已消散。近几年来,每逢春节、中秋等佳节夜晚,厦门、金门两地均同时燃起五彩缤纷的焰火,两岸同胞化干戈为玉帛,欢乐祥和,共庆佳节。

回顾厦门的发展变化,我们对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题词倍感亲切。我们坚信,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厦门将不断再创辉煌。

遵义会议

佟 静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广大军民虽经英勇奋战,仍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初期,又遭受了重大损失。12月初,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部署重兵在红军左侧后跟追,而红军经过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战斗力大为减弱,如仍按原计划北出湘西,势必同五六倍于我的敌军作战,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此严峻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与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军,争取主动。

12月14日,中央红军攻克了黔东重镇黎平。18日,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迫于形势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不得不同意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派至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仍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则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到会的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

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①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可能被消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19日,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西进,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地区。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占贵州北部遵义城,把敌人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地区。

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胜利地粉碎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而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惨重的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和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和危害,不少人在“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迫切要求改换领导,改变路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和毛泽东耐心说服下,逐步改变了态度。王稼祥最早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②张闻天也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③,支持王稼祥要毛泽东出来领导的意见。王稼祥还利用各种机会,找到其他一些负责人交换意见,并取得这些人的支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召开一次事关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重要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441—442页。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241—242页。

③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197页。

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开始，首先由党中央书记博古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也说到一些主观指挥上的错误，但过分强调了客观困难。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 50 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而苏区物质条件不好；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等等。实质上是用客观原因掩盖主观领导的错误所产生的恶果。

博古报告完毕，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着重就军事问题作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周恩来的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①

接着，张闻天根据会前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议定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发言提纲，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

^① 《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283页。

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报告结束后，毛泽东首先站出来，针对当时党内主要负责人博古不接受批评、推卸责任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就长征以来发生的各种争论，以及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表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敌强我弱，而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这条路线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指出其错误归纳起来表现为：先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然后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还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①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也为会议决议定下了基调。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肃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接着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发言追究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还明确表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根据陈云 1935 年二、三月间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

^① 《遵义会议文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16 页。

提纲》手稿所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①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遵义会议记录。因此，陈云的手稿和当事人的回忆就成为珍贵的文献和重要的依据。

会上，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的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都以亲身经历严厉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只有林彪（一军团团长）例外，会议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是林彪热心鼓吹的，行动上他更是积极执行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主张，所以他基本上是一言不发。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定》（即遵义会议决议，据考证，这个决议是从2月5日至9日在扎西镇由张闻天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②。

决议明确地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其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第五次“围剿”中，敌人采用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③。“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② 《张闻天传》，第207页。

③ 《遵义会议文献》，第5—6页。

使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①《决定》指出，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二，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违反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在战术上是速决的这一基本原则，企图集中红军猛力一击，“进行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②，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战略速决战，是错误的。《决定》指出，“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③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决不是要求战役战斗上也要实行持久战。相反，只有通过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三，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拒绝实行统一战线，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决议》指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扩大敌人的裂痕，便于我军转入反攻和进攻，是我们粉碎围攻的重要战略之一。“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博古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我们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从而失去了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第四，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决议》指出，“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5—6页。

② 《遵义会议文献》，第13、14页。

③ 《遵义会议文献》，第13、14页。

转入反攻，粉碎‘围剿’。”^①但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人在打破“围剿”已不可能的情况下，继续与敌人拼消耗，忽视保持有生力量，错过了战略转移的时机，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使红军继续遭受重大损失。

《决议》在批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通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和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成功经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积极防御和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打无把握之敌，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等一系列军事战略原则。

最后，决议对博古、李德（即华夫）等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丝毫没有自我批评等领导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明确了责任：“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②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③在作战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责任。”^④《决议》指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还就中央红军行动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刘伯承、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⑤会议同意刘、聂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 17 页。

② 指博古。

③ 指李德。

④ 《遵义会议文献》第 22、100 页。

⑤ 《遵义会议文献》第 22、100 页。

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决议》根据当时全国形势，提出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决议》指出，要完成这些任务，红军必须灵活地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休整扩大，严肃纪律，密切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

会议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1、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3、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于2月5日，红军中央纵队到达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西面的高坎、花房子等地宿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初，中央纵队第二次进入遵义城。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副主席王稼祥签发命令，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史称新的“三人团”^①。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虽然没有在组织上确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但他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担负的实际职务。毛泽东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实际上已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遵义会议之后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组织机构调整。这样，中共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

^① 《张闻天传》，第206—219页。

机构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得以贯彻实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也从此开始形成。

在进行组织调整的同时，新的中央对积极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一时缺乏认识的同志，如秦邦宪、凯丰等，也为他们创造进一步思考和认识错误的机会和余地，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这次会议只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而将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留待以后从容地讨论，并且在形式上还肯定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①。在组织上，只变动了秦邦宪（博古）的领导职务，原先的领导层基本保留。这是在战争环境、无根据地、流动作战的特定条件下稳定军心和队伍，共同战胜敌人的需要，同时也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实行弄清是非，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还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作为伟大历史转折点的深远意义。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4页。

②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发展大事记(之三)

编写组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基本形成体系

(1987.10—1992.10)

概 述

这一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和基本形成的重要阶段。说其走向成熟,首先是因为这一理论经受了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巨大的国内风波闯过关来,能够面对复杂的国际变局处变不惊,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一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说其走向成熟,还因为在这一阶段中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发表的南方谈话,把这一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南方谈话总结了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一系列高屋建瓴的理论观点,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关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新概括,关于台阶式发展战略的新概括,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等等。这些

观点都是基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所作出的理论上的新的回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内容，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

这一阶段，在总体上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概括有三次。一次是1990年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从“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的角度，讲了十二条。第二次是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讲话中，分别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次是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使全党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从而全面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十四大报告并首次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提出了用这一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十四大报告还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历次论述的精神，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阶段，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不断发展，成果迭出。我们完成了经济战线的治理整顿任务，形成了沿边、沿海、沿江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案和措施。

政 治

1987年

11月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并批准了于同日分别召开的中顾委、中纪委会议所选出的两委领导人选。十三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郑重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11月12至24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同意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国务院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领导国务院的工作。会议还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对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法律进行清理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决定。

12月9至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党风建设座谈会，就当时党风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指出，党风和改革开放是有关系的，改革为我们党的肌体注入了新活力，归根到底能增强对腐蚀的抵抗能力。同时，在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调节机制不完善，机会不够均等，这是不正之风滋生的重要原因。在党风建设上，我们要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我们整个党和国家要走上按制度办事的轨道。会议认为，加强党风建设，一要加快和深化改革开放，逐步减少产生

不正之风的土壤；二是从严治党。会议提出，改革开放中的党风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1988年

1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在北京互换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自即日起生效。中国将在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2月2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个别条款的建议，建议的内容是：1. 在宪法第十一条文后增加一款：“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 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并将上述建议提交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3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公告》说，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的日益增多，这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三通”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月25日至4月13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198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8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会议讨论修改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两个法律（两法随即于4月16日公布实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4月10日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拟撤销部、委12个；新组建的部、委9个；保留的部、委、行、署32个；转为事业单位的1个；改革后的国务院组成部委41个。这次机构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减少政府机构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职能、初步改变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

5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建省刚满1个月的海南省，目前率先推出第一项重大改革，“小政府、大社会”的全新经济、政治体制已开始实施，成为我国第一个进行省一级机构全面改革的试点。

6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通知说，中央认为必须把保持廉洁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党和国家机关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面前。现在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若干重大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党和国家机关能否保持廉洁，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改革的成败。否则，即使问题出在少数人身上，也会玷污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败坏改革的声誉，引起群众的不满，人为地增加改革的难度。党和国家机关保持廉洁的基本要求是，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为人民办事，切实做到：严守法纪，不贪赃枉法；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艰苦奋斗，不奢侈浪费。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要在这方面起表率作用。《通知》强调，必须依法惩处索贿、受贿、贪污、弄权渎职、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持刹住受礼送礼、大吃大喝等不良风气，使党和国家机关成为廉洁、高效、遵纪守法的机关。

6月22日 邓小平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海尔·马利西姆时指出，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第三世界国家

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不要丧失这个机会。他还说,10年来,中国建设的速度是不慢的。但中国仍然需要过几个关,最大的关是要综合治理以及改革价格和工资制度。我们有信心闯过这一关,为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

7月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电李登辉,对其在国民党十三大上当选国民党主席表示祝贺。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国民党十三大的社论《摒弃歧见,增进共识》。

7月26日至8月2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届十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原则通过《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会议强调,要把工会改革放到我国改革的全局中去不断探索。工会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 理顺工会的外部关系,主要是理顺工会和党的关系,理顺工会和政府与行政方面的关系,使工会依法自主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2. 以密切工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为关键,深入进行工会自身改革,明确工会的社会职能和工作方针,改革组织制度与活动方式,克服“官办”气息和行政化倾向,实现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

8月21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自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批准中央直属机构改革方案以后,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并认真组织了实施。经过改革后的中央直属工作机构和事业单位有: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顾问委员会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党校、人民日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这次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的主要做法是:撤销与国务院职能部门重叠的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合并业务相近的事业单位,明确直属工作机构的职能,精简内部人员,形成精干、高效的工作体系。

8月31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共青团体制

改革的基本设想》。《设想》把共青团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把共青团建设成为社会职能和法律地位明确，民主生活健全，基层充满活力，能够代表青年利益，真正赢得青年信任的充满活力的群众组织，使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带领青年为发展生产力艰苦创业，在实践中培养一代“四有”新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9月26日至30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还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12月18日至22日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理论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会议指出，我们党的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的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它标志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有了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内容。但我们的理论研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还很不适应，落后于实践的要求。我们国家的改革，必须有理论上的强有力指导和支持。会议希望理论工作者拿出真知灼见、有科学价值地成果，给奋进中的人民以强大的理论力量。

12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践证明，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应继续贯彻执行。我们要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会议

要求外事部门的同志把我国对外工作做得更加活泼、灵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争取更大的成绩。

1989年

1月23至27日 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国家重大决策在作出之前,一般要通过政协进行政治协商。政治协商可以根据党政领导机关的倡议进行,也可由政协主席会议建议党政领导机关把问题提交政协政治协商。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在政协的会议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28日,中共中央表示赞同全国政协的暂行规定,认为这个规定符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有利于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印发这个规定,并参照执行。

2月15日 《李先念文选》在全国发行。文选编入了李先念从1935年至1988年期间的重要著作94篇。

2月25至27日 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邓小平于26日会见并宴请了布什。在谈话时邓小平指出,中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就难以取得成绩,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去,希望外国朋友理解这一点。邓小平还表示希望在布什任期内,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布什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在美国,对发展美中关系的支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大。

4月15至24日 在胡耀邦逝世后的悼念活动中,北京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潮,并逐步波及到其它一些主要城市。党和政府对广大青年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学潮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的煽动和策划下,学潮日益明显发展成为政治动乱。

6月3日 根据由国务院总理李鹏5月20日签署的国务院

命令到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奉戒严指挥部的命令自本日凌晨开始,陆续进驻包括天安门广场在内的各个执勤位置。一个多月来北京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在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暴乱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通过电台、电视台反复播出紧急通告,要求市民提高警惕,坚守岗位,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晚10时左右,各路戒严部队先后开进市区。4日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清场,5时半完成清场任务。其后,戒严部队陆续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它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翌年1月10日对北京的戒严解除。

6月9日 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这次事件爆发出来,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长处发扬得更好。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不能因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错了。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他还强调,改革开放没有错,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6月23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撤销了赵紫阳所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随之还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总书记江泽民和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6同志组成。全会并强调,要继续坚持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持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7月27日至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近期要做的七件事是:1. 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2. 坚决制止高于子女经商。3. 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4. 严格按照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执行政府间已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和国家批准的技术贸易合同除外)。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5. 严格禁止请客送礼。6. 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7. 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会议还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作了讨论。这一《通知》要求:要宣传四中全会重大组织决定的意义,继续做好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稳定局势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建设、改革和廉政的宣传;坚决妥善地整顿宣传舆论文化阵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充实政工干部队伍;做好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工作;严格宣传纪律,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对外宣传,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尊严。

8月20日 《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在全国开始发行。文选收入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28年中的重要文章、讲话共39篇。

9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权建立之前的犯

罪行为的公告》。

9月29日 首都各界群众1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杨尚昆主持大会，江泽民在长篇重要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和国40年建设与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江泽民在讲话中总结40年历史经验，着重提出了四条基本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是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途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独立和发展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江泽民还就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统一认识的若干重要问题做了阐述。这些问题是：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的问题，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治理整顿问题，关于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各种经济成分的问题，关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防止和纠正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关于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关于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和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问题，关于加强党的建设问题。

11月6至9日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此前，中央政治局曾于10月30日至11月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这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暂时的困难，是完全有条件加以克服的。并提出，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争取用3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并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会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这样，经过四中全会，以五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代是自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充分证明。

11月13日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1989年度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你们这个团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退就是真退，在百分之百地退下来，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

12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指出，各级党委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高度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党组织要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实行统一领导，并支持其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支持其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发挥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增强其组织活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12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意见》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基

本方针,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加紧选拔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并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意见》并强调,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0年

2月13至17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体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评选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草案)。

2月19日 江泽民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大陆访问团。他在会见时指出,祖国统一对大陆、台湾都有好处。

3月4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继续向雷锋同志学习。江泽民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杨尚昆的题词是:“全国人民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李鹏的题词是:“在新形势下把雷锋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活雷锋在中国涌现。”

3月9至12日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会认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全会指出,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是这些年来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对此,全党同志必须高度警觉,并坚持不懈地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尽一切努力恢复和发

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组织广大党员用整风精神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的决定。当前特别要注意切实解决群众最为关心而又有条件解决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密切党群关系。

3月20日至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3个附件和区旗、区徽图案；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关于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并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任命刘华清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免去洪学智的国家中央军委委员职务。

6月11至15日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开幕会上作了题为《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他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必须有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指出，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在我们党的事业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江泽民还就解决台湾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商谈祖国统一，而不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并希望台湾当局、国民党领导人，从现实出发，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顺应民意，担当起历史的责任，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作出贡献。6月14日，江泽民又和与会代表进行座谈，进一步阐述了中央对广大留学人员和海外知识分子的政策。肯定他们是爱国的，对祖国有深厚感情的，希望他们为祖国的建设和进步继续作出贡献。

8月5至10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在山东联合召开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在会上指出:现阶段的农民问题和农村工作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团结和组织农民,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12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并要求各地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9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通知》。《通知》对新形势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干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了分析,指出了党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强调努力办好党校是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战略性措施。《通知》还要求各级党校要努力办成轮训和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成为干部增加党性锻炼的熔炉。

12月6至12日 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国共两党应尽早接触谈判,并可吸收两岸其它政党、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谈判可以在高层进行,也可以先从较低层次开始。对于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言论,以及缓和两岸关系、放宽双方交往的措施,应予热诚欢迎;对于台湾当局推行“一国两府”、“弹性外交”、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姑息“台独”活动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会议强调,对于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要进行广泛的接触沟通,以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建立共识。会议期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12月25至30日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初步地作了概括,提出了十二条主要原

则。其主要内容为：1. 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2. 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3. 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它领域的管理体制；4. 采取多种形式、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5. 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6.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7. 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8.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 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0. 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1.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2. 坚持党的领导。这十二条原则，有些是我们几十年来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充实了新的内容；有些则是十多年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总结。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凝结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十二条原则的提出，标志着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为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建议》还提出了以下几条基本指导方针：1.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2. 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3.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4. 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5. 必须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6. 必须处理好治理整顿与经济的关系。全会并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全会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

1991年

1月15至21日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乔石向会议作了题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政法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报告。《报告》强调,要长期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法战线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次会议总结了10年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并提出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

2月2至6日 全国统战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丁关根在会上就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做了报告。他指出,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一大特色,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是关系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四化建设,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大事。他还强调,在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负有重任,大有作为。爱国统一战线要以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总目标,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会议期间,江泽民和乔石同会议代表举行了座谈。江泽民说,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十分明确,当前的关键是要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多做实事。

2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展两岸交往,推进和平统一》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1990年是海峡两岸关系气氛日趋祥和的一年,海峡两岸封闭隔绝40多年的局面已被打破,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赴大陆探亲、旅游、考察、经商的台湾同胞已近百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已从1979年的8000万美元增至40多亿美元;文化、学术、体育、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扩大,这些变化无疑有助于向着国家统一的目标迈进。

3月13日 李鹏在同出席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的部分代表

座谈时指出,政府机构改革从经济管理方面来说,方向是适应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实行政企职能分开,机构要精简,人员要减少,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3月23日至4月4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审议政协七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政协提案委员会关于七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选举决定一些重要人选问题。

3月25日至4月9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提出了今后十年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主要指标是: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发展教育,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营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等。为了加强国务院的工作,这次会议还任命邹家华和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并通过了《民事诉讼法》等法案,随即由杨尚昆主席于4月9日签署主席令公布施行。

4月23日至28日 首次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党的十三届四中全公以来党建理论研究的成果,探讨如何加强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进一步推动党建理论研究和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会议期间,江泽民、乔石、宋平、李瑞环等与会议代表进行了座谈。江泽民在座谈时指出,国内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光荣而艰巨;一方面,我们面临大量开创性的、前人没有提出或没有涉足过的课题,面临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每天都在创造新事物、新经验,这就特别要求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

理论的探索、概括和新的创造。

5月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几条规定。规定分两部分：一是保密制度。二是严肃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对查处利用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案件，也作了原则规定。自1988年深圳市检察院成立第一个举报中心以来，自上述规定发布前夕，全国已有3168个举报中心。

5月29日 《彭真文选》(1941—1990)出版发行，文选收入彭真同志的文章、电报、讲话等文献90篇。

6月7日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就海峡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三条建议：1. 海峡两岸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或人士，尽快商谈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的问题。2. 国共两党派代表进行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3. 中共中央欢迎国民党中央负责人以及国民党中央授权的人士访问大陆。如国民党邀请中共代表，我们愿意应邀前往台湾，共商国事。

6月10日 为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出版，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该书主要对1949至1956年间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回忆与研究。

7月1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70年的奋斗历程，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指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在讲话中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

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他还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以加强和改善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同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 70 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和重新校订的《毛泽东选集(1—4 卷)》第 2 版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相继出版发行。

7 月 21 日 大陆 18 位渔民在台湾海峡与台湾渔船发生渔事纠纷后被押往台湾扣留。8 月 12 日,大陆两名记者为采访此事赴台,这是 42 年来大陆记者首次赴台采访。8 月 20 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曲折、庄仲希抵台看望了 18 位大陆渔民。21 日,曲折、庄仲希与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就大陆渔民返回一事达成协议。

10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国民族工作成就举世瞩目》的报道,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发展加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全国已建立159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4个自治县(旗),55个少数民族中已有45个民族实行了区域自治,依法自主地管理本自治区域和本民族内部的事务,还建立了1500多个民族乡。

11月25至2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全面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向全会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四大于1992年第四季度在北京举行。

12月16日 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当选为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任协会名誉会长。

1992年

1月14至18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会见了与会代表。江泽民作了《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的重要讲话。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密切联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共同奋斗。李鹏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提出:

从今年开始,要适当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改革开放的分量。全国是这样,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这样。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广大干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1月18日至2月21日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巡视考察。南巡途中,他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 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 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4. 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尔后再继续前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 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

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20年。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6. 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7. 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8. 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谈话从多方面再次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1月29日 江泽民在《瞭望》周刊发表《新春贺词》对新的一年进行了展望。他指出,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快改革的步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同时,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多方位的对外开放,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3月2至6日 全国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兆国在工作报告中对过去一年两岸关系的发展情况作了总结。会议认为,过去一年的两岸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仍然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并取得一些突破。1991年,来大陆探亲、旅游、经商的台湾同胞近1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总额近58亿美元,台商来大陆投资不断增加,民间的文化、学术、科技、体育等领域的交流进一步扩大,两岸间事务性接触商谈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整个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全国各对台工作部门,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扎扎实实地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3月9日 在北京召开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提出,我国推行公务员制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将加快步伐进行这一工作。1992年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试点,积极做好向全国推行的准备工作;从1993年开始,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以及计划单列市、大城市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争取到1995年基本建成中央和省一级的国家公务员体制;在此基础上,再在地、县、乡逐步建立公务员制度。

3月9至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集中讨论和研究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认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会议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3月12日 江泽民在北京会见了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

华社香港分社聘任的 44 位香港事务顾问(全系香港各界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士)。江泽民在会见时指出,“一国两制”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是一项长期的坚定不移的国策。他强调,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陆将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的香港将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的一座重要的桥梁。因此,大陆离不开香港,香港离不开大陆,谁也离不开谁。他还说,只有长期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才能保证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繁荣和稳定,才能保证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

3月1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卡里莫夫,江总书记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的改革,他说,我们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计划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市场。我们的思想突破了旧的束缚之后,经济改革就迈出了新的步伐。他还对客人说,任何一个国家要把经济搞上去,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对这一点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3月14日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了3月9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并请到会的党外人士就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与会的党外人士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策,并就如何进一步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们表示:作为参政党,在经济建设和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一定竭尽全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江泽民总书记则在介绍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后强调说,不断巩固、发展、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一项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

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发展共产党与非中共人士的合作共事,促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

3月18日至28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发扬民主,增强团结,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为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搞好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建设事业而共同努力。

3月20日至4月3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将会议开成一个民主、求实、团结、鼓劲的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对提请大会审议的各个报告和法律草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讨论。会议批准了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案。大会并采用按表决器方式,通过了《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决议》、《关于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4月6日至11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应日本政府邀请访问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重点是转换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同时将配套地推进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我们在继续办好深

圳等经济特区的同时,重点要搞好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他还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我们将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我们将通过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等措施,增强党政机关和领导班子的活力;通过精简机构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决策办事效率;通过实行政企职能分开、权力下放等措施,充分调动各行各业和基层群众的积极性。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取得和保持一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5月11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经过40余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努力,我国民族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包括各项调整国家民族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社会主义民族法规体系已初步形成。到目前为止,全国159个民族自治地方中,已有25个自治州、85个自治县经过法定程序批准,颁布实施了自治条例。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关于选举、财产继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婚姻、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单行条例已达70多个,地方性民族法规已达数百件。

5月14日 中国自即日起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这是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级会议一致作出的决议。

5月20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中南海与首都应届高校毕业生代表举行座谈。在座谈中他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始终是与祖国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不愧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脊梁。

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新鲜血液——大学毕业生十分信任，一直寄予厚望。他向同学们提出三条要求：一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与工农群众结合，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前途与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二是要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三是要在工作中加强学习，自觉克服弱点和缺点，使自己更快地成熟起来。他勉励同学们充分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从而更加自觉地加倍学习，加倍工作，加倍建功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青春才华。在谈到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大胆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习利用西方国家一切好东西这一问题时，江总书记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地建设起来，并最终建设成功。他还指出，立足我们的实际把国外的这些有用的好的东西认真学过来，用来改进、提高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东西，这样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本事就会大起来，就可以加快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一切好东西，一方面又要坚持抵制腐朽的东西。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他并希望同学们，在向外国学习和借鉴的问题上，一定要准备两手，坚持“两点论”，学会掌握实际生活中的唯物辩证法。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

5月21至24日 国家体改委在江苏常熟市召开全国县级综合改革经验交流会。会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加快县级综合改革的步伐，在有条件的县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县级综合改革是80年代初开始的。截至会议召开时，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确定了290多个县(市)开展县级综合改革试点。正在江苏考察的李鹏总理出席了23日的会议，并讲话指出：县级机构要转变职能，强化服务，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重点抓好规划、监督、

服务和信息工作。

5月22日 邓小平视察位于首都西郊,在改革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冶金系统先进企业——首都钢铁公司。当首钢领导向小平同志汇报首钢1992年要达到600万吨钢的产量指标,并说首钢是用“二手设备”起家时,邓小平对此予以肯定说:这是一条捷径。在谈到首钢改革以来取得的成就时,邓小平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了脑筋就行,脑筋不换,怎么推也推不动。同样在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可干出事来慢慢腾腾,看不到新气象。脑筋一活了,想得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也就更好了。走得快,走得慢;走得好,走得坏,就看你走的路子对不对,第一是方向对不对?第二还要看你走得好不好?你们两条都走对了。小平同志在谈到他的南巡之行时说:我在南方跑了跑,讲了一些放炮的话,我听到的呼声是放不开手脚怎么跑路。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首钢、宝钢、鞍钢是不够的,要全面动起来。邓小平还就深化改革问题指出:上层建筑这个机制结构的改革问题,就是真正的给企业权力。在谈到经济发展速度时,邓小平强调:没有压力是不行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始终面临一个后退问题。我们的水准是在低的水准上,我们的速度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速度不能是同一看法,我们不是在一个水准上。当首钢同志汇报到首钢为“美钢联”转炉进行计算机控制改造,在美国引起轰动时,小平同志高兴地说:这就证明我们能在国际市场上站得住。在谈到首钢靠承包增强了活力,增加了留利等问题时,小平同志对此也表示肯定,说:只能走这条路。并同意把这一改革形象地称为是“放水养鱼”。他还针对经济和发展问题强调,一个人政治上再强,不懂经济是不行的。……冒风险也要冒一冒,没有什么大风险,看不对头,你就收嘛!并提出钢要有年产1.1亿吨到1.2亿吨的奋斗目标。小平同志的这些精辟论述和指示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这一美好追求,所苦心孤诣作出的精心安排、远大设想,以及他对使之及时实现所抱有的殷殷期望。

6月9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他说,小平同志重要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对于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在认识上和工作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他还就如何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小平同志重要谈话阐述了九个问题,即:1. 关于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2. 关于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3. 关于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4. 关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5.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6. 关于坚持“两手抓”的方针;7.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8.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9. 关于贯彻落实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要求。江泽民强调,邓小平同志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他为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建立的新的历史功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原因。完全可以这样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及其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的飞跃。

6月20日 中共中央就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问题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通报会由江泽民主持。他

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扼要通报了6月9日他在中央党校讲话的精神。在讲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时,他说,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等重要论断,完全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是完全正确的。这些重要论断的提出,对于我们的思想认识来说是一大解放,而且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强调,我们要进一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 and 力量,更好地集中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上来。他还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希望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继续发扬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进一步解放思想,献计献策,为更快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新的贡献。李鹏总理在会上通报了当前改革开放的进展情况和经济形势。他指出,我们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制定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核心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经济更快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战略任务。

6月22日 从在北京闭幕的全国部分城市公安局长座谈会上传出消息,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以“该放宽的放宽是服务,该管严的管严也是服务”为指导思想,我国公安工作改革的若干措施将陆续出台。主要的有以大中城市、铁路公路沿线为重点,深入开展打击犯罪,扫除丑恶现象的斗争,进一步落实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硬”的谈话精神,力争全国城市治安状况迅速明显改观,进而带动全国,确保社会稳定,以及加强和改善公安管理,为改革开放提供各项高质量的服务等。

7月10日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王仕元在北京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1992年上半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新进展。他说,邓小平今

年年初视察南方时一系列重要谈话,澄清了人们对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模糊认识,打破了思想中的一些禁区。例如,姓“资”和“社”的问题,警惕右主要防止“左”的问题,特别是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计划和市场关系,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7月21日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台湾当局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近年来,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不断发展,这是人心所向潮流所趋。台湾当局在这个《条例》中采取了一些放宽两岸交往交流限制的措施,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条例》依然坚持“三不”政策,阻挠直接“三通”。《条例》的许多规定,不仅远远落后于两岸交往现实,而且用立法形式限制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完全违反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我们是反对的。谈话重申:我们一贯主张,根据两岸人民的意愿,早日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扩大交往,密切联系,增进共识,繁荣民族经济,造福两岸人民,本着“一国两制”的原则,谁也不吃掉谁,双方共同努力,通过谈判逐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希望台湾当局顺乎民意,拆除人为障碍,为发展两岸关系、人民交往、经济合作多做实事。

8月15至20日 全国反盗窃斗争座谈会在大连举行。会议指出,深入开展反盗窃斗争是贯彻邓小平同志“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思想的重要措施,是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搞好社会综合治理,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创造条件的一项重要工作,它既能保护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大连视察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并讲话指出:深入开展反盗窃斗争,是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创造条件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他强调,要以邓小平

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为思想武器,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基本点出发,围绕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政法工作中贯彻改革的精神,为经济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会议要求各地加强反盗窃斗争和综合治理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大力发动群众加强防范工作为开展反盗窃斗争的核心,逐步推广现代化技术防范手段,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种犯罪活动。

8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作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实行的乡镇干部聘用制的工作收到良好效果。我国农村目前有5.5万个乡镇,乡镇党政群机关干部有128万人。据对28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些机关中现有乡镇聘用干部约28.5万人。其中,担任乡镇党政领导职务的有4.1万人。由于聘用制具有能进能出、能干能民的机制,历年来因工作平庸,不能履行合同以及其它原因,已有2万余人解聘、辞聘或终止合同。

8月29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全国反贪污贿赂斗争又取得新进展。1992年1至7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4.8万多件,立案侦查万元以上大案7600多件,受案数与去年同期持平,万元以上大案比例比去年同期增加13.3%。

9月12日 在北京召开的《舆论监督与改革开放》研讨会提出: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研讨会的与会者认为:监督机制的健全,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舆论监督的正常发挥,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当前“左”的思想是开展舆论监督的主要障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呼声、要求、意见、建议及时反映出来,才能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造成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与会同志还强调,舆论监督还应和法纪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9月23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就台湾当局公布的“两岸直航的问题与展望说明书”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在各方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正视两岸直航问题，不得不表示“两岸应在适当时机开放直接通航”。这与过去相比是个进步。他还指出，实现直接三通是两岸人民的迫切愿望，对于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扩大两岸经济合作和交往交流，将起到重要作用，两岸直接三通已势在必行，不可阻挡。希望台湾当局顺应民意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真正为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着想，取消人为障碍，为两岸早日直航多做实事。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已出版发行邓小平著作1.0115亿册，基本适应了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满足了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学习和研究的需要。

同日 新华社报道，1992年又有3位非中共人士被举荐担任高级行政领导职务。他们是：王文元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鞠庆麒出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系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于生龙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系农工民主党河北省常委。

10月5日至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10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一致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四大所作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10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就重大问题与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进行协商已形成制度。为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作用，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每当有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文件出台，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领导人选变更，中共中央总要事先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有重大情况及时向他们通报。据统计，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召开与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无党派代表人士的谈心会、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共51次；其中，由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出面主持的就有10次。

10月12日至18日 肩负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总结重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4 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二、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三、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四、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报告中江泽民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党思想，他还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朝着宏伟的目标奋勇前进。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还正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一国两制”的中国统一构想等方面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从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还首次明确地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科学社

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创举,是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深化,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伟大创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必将带来我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还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鲜明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书写在党的旗帜上,并要求全党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且毫不动摇的长期坚持下去。这样,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更全面、更系统、更严密、理论性更强的新的科学概括,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目标模式,以及明确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等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至此基本形成、初步完备,进而进入一个继续深化发展的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随之进入一个更为鼓舞人心的崭新阶段。

经 济

1987年

10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10亿人穿衣问题基本解决。1987年全国纺织工业总产值预计突破1200亿元,比1978年增长1.55倍,纺织品出口额预计达到80亿美元,比1978年翻了两番。纱、棉布、蚕丝、丝绸、苎麻布的产量都占世界首位,化纤产量占世界第四位。1986年,中国人均纤维分得量为4.5公斤、棉布为15.54米,分别比1978年的2.73公斤和11.51米增长64.8%和35%,衣着类消费零售额从1978年的178.5亿元增加到1986年的773亿元,增长了1.8倍。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润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关于土地制度,我国将采取两条政策:1. 准备征用土地使用费,以防过多占用耕地。2. 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准搞土地私有化。

11月11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为:我国目前不含港澳台地区人口为10.72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11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大丰县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生态规划县。要求以生态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发展为保障,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

12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开展颁发土地证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在上海市、山东省青州市、广东省花县进行。这次开展土地登记试点,颁发土地证书的对象是:《国有土地使用证》发给依法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集体土地使用证》发给依法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集体土地所有证》发给依法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单位。

1988年

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和当前的经济工作。会议要求,1988年的经济工作,要根据十三大确定的加快和深化改革的要求,认真总结和运用去年的好经验,全面理解和正确掌握进一步稳定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以改革总揽全局,认真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使整个国民经济继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2月25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从1988年起,用三五年时间,把住房体制改革在全国城镇分批推开。今后三五年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公房租金,按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投资利息、房产税等5项因素的成本租金计租,抑制不合理的住房要求,促进职工个人买

房,并从政策、立法、社会舆论等方面采取措施,引导和调节居民消费,使消费结构趋向合理,为实现住房商品化奠定基础。国务院在印发这一方案的同时通知指出,住房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2月27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关于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方案中提出,1988年经济工作总的方针是: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从这一全局出发,立足于解决当前经济行动中亟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把经济体制改革同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有重点、有步骤地深入进行。主要任务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目标,以落实和完善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重点;同时,改革计划、投资、物资、外贸、金融、财税体制和住房制度,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基金和物价的管理,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3月4至8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对外开放9年来,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即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格局,为沿海地区转向外向型经济,参加国际大循环,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会议提出,贯彻落实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设想,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要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促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会议并建议国务院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这个范围大体相当于过去9年开放范围的总和。3月18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这次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共140个市、县,其中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这就使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构成的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地带范围大大扩大,市、县增加到288个,面积增加到约32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6亿左右。

3月13日 国务院就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作出了

新的部署：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主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向国家承包上缴国家外汇的任务和经济效益指标。

4月16日 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正式颁布。它总结了我国近40年工业企业管理的系统经验，体现了中共十三大的精神，既肯定了10年改革的成果，又为今后改革开拓了前进道路。实行企业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原则，是《企业法》的核心。

同日 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公布施行。

4月20日 国务院物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发出《关于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方案》。方案提出，物资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在加强重要物资宏观平衡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积极促进短线物资的生产，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物资供求关系，依托大城市，逐步建立起有领导有组织的生产资料市场，保证国家重点需要，增强企业活力，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当前改革的重点：一是逐步取消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物资的职能，将物资供应、销售机构并入物资部；二是在减少指令性计划的同时，全面推广石家庄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三是在一些城市由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情况，组织物资体制改革的试点。这一方案由国务院于5月15日批准下发。

4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通知。中共中央的通知说，《企业法》的制定，结束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律地位不明确的情况，确立了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在贯彻《企业法》的过程中，要切实转变企业党组织的职能。必须明确，企业不是政权组织，企业中党组织要以主要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企业法》体现了现阶段党对企业改革的意志和主张，当前，企业党组织要把保证监

督《企业法》的贯彻执行,作为自己的重要政治责任。

5月19日 邓小平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说,多年来,物价问题是国家的沉重负担。旧的价格制度不符合价值规律,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加了很大的包袱。要轻装前进,物价问题非解决不可。

5月21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发出《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引入竞争机制,改革人事制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从组织上保证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推动各种形式经营责任制的落实,对改革企业人事制度提出如下意见:1. 必须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人事制度。2. 通过公开招标选聘企业经营者。3. 改善对企业经营者和各级管理人员的管理工作。

6月23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宣布:以企业资产归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为标准,我国现有私营企业22.5万户,雇工360万人。他们的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

8月15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今后5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

8月31日 国务院召开第二十次常务会议,认真讨论和分析了当前的市场和物价形势,并一致通过了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不少城市一度出现物价上涨、市民大量提取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1. 1988年作为实现5年改革方案的第1年,

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幅度明显低于今年。2.各地区各部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价格措施的决定。3.为了稳定市场、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4.为继续贯彻执行“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各地区、各部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建缓建一批楼堂馆所,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抓紧清理整顿公司、清理整顿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要把今年的信贷和货币发行控制在国家要求的数额之内。5.必须切实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确保合同订购任务的完成。6.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组织好市场供应,严格市场管理。其后,国务院派出10个检查组赴各地配合地方政府落实稳定市场做好物价工作的有关措施。截止11月底,各地确定停缓建各类建设项目逾万个,压缩投资规模334亿元,全国清理固定资产工作初见成效,为稳定市场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9年

1月3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宣告建成。葛洲坝20层楼高的2号船闸是世界同类船闸中最大的。葛洲坝水力发电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是我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电厂边建设边发电,累计7年已发电近600亿度,产值30多亿元,收益相当于整个葛洲坝工程投资的一半。

6月30日 全国各类公司的自查和重点抽查工作基本结束,抽查面约占全国总数294946户的47%,清理整顿公司取得初步成效。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已撤销、合并6481个,与党政机关财物脱钩10386户,移交有关部门1063户,三项合计17930户,占党政机关办公司总户数的90.5%。此外,全国各类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经商开办的4104户公司,已撤并或脱钩3044户,占这

类公司的 74.2%。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已有 42952 名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干部辞去公司或机关职务,占兼职任职干部总数 47956 名的 89.6%。全国政企不分的公司已解决 4884 户,占这类公司的 45.9%。其中,撤销或停办的 1255 户,收回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 2730 户,不再从事经营的 899 户。中央国家机关一些直属公司政企不分的问题,通过各部门机构改革方案的落实,正在解决。全国共查出各类公司违纪违法案件 25884 件,涉及 25404 户公司,已立案查处 12750 件,结案 10303 件,占立案数的 80.8%。在查处中,有 9534 户公司受到经济处罚,收缴罚没款 2.6 亿余元,还有 2871 户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因贪污、受贿、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有 476 人,受到刑事处罚的干部有 301 人。对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所属 100 户全国性公司进行重点检查的结果是,共查出各种违纪违法金额 11.3 亿余元,其中,应查没的违纪金额 7.3 亿余元,已补交 4.5 亿余元。此外,全国还有约占公司总数 12.5% 的 22810 户不具备条件的公司被撤销。

9月5日 全国从即日起提高铁路、水路和民航的客运票价。调整客运票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扭转当前铁路、水运和民航客运票价长期偏低,经营亏损的局面。增加交通运输能力,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方便群众旅行,缓解买票难坐车难的矛盾。

12月29日 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秦皇岛港煤码头三期工程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它的建成投产使秦皇岛港成为世界能源输出第一大港。

1990年

1月4至8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深入学习贯彻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围绕治理整顿,继续深化改革。会议提出以下七条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1. 完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2. 继续实行和完善厂长负责制;3. 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大中型企业的

骨干作用；4. 进一步发展企业集团；5. 采取措施推进企业兼并；6. 强化企业管理，向经营管理要效益；7. 有计划地推进各项改革试点工作。李鹏总理在会议结束时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搞得更好。

1月17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理查德·厄伯及出席国际中央银行研讨会的来自美国、墨西哥、比利时等国的银行家。江泽民说，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经历表明，中国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中国今后发展经济要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很好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还必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2月5日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原油管道，也是中国第一条高原输油大动脉——青海省花土沟至格尔木输油管道工程建成通油。

2月5日至8日 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李鹏总理在会上指出，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区也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大一些，方式再灵活一些；特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特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据这次会议提供的材料，中国的五个经济特区在过去一年的治理整顿中经济实力的增长位居全国前列。截止1989年底，已批准外商投资项目5700多个，协议外资金额94亿美元，实际利用41亿多美元，占全国的1/4。外贸出口已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过去一直困扰特区发展的外汇紧缺，也因近几年全国出口创汇的增加而转为整体上外汇收支的平衡。

3月17日 中国第一座海洋石油深水钻采平台基础工程——惠州21-1导管架在深圳赤湾港举行竣工典礼。该导管架高125米，总重5491吨，为中美合作建造的高难度海上大型钢结构

工程。

4月8日 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重点建设工作会议提供的材料,中国重点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国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先后建成举世闻名的“三北”防护林一期工程、几十个商品粮基地和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建成了葛洲坝水电站、平朔露天煤矿等 153 个重点大中型能源项目;建成上海宝钢,大庆、齐鲁、扬子三大乙烯工程,冀东水泥厂等 88 个重点大中型原材料项目;建成了大秦电气化铁路一期工程、北京——武汉——广州中同轴电缆载波工程等 125 个重点大中型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项目;建成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尖端科研设施,还建成了江苏仪征化纤厂、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中央彩电中心、北京图书馆等一批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大中型项目。

4月18日 李鹏总理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是中央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作出的又一个重大部署。同年9月10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又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9项具体政策规定。浦东的开放、开发随即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5月4日 中国引进技术自己制造的首台单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 60 万千瓦发电机组——淮南平圩电厂一期工程一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标志着中国机电设备制造水平和电力工业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5月7日 林业部长高德占宣布,继“三北”防护林体系后又一宏伟的生态建设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已开始全面展开建设。为改变长江中上游地区森林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面积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国家计划用 30 到 40 年时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增加森林面积 2000 万公顷。整个工程分两期完成,第一期工程计划到 2000 年完成,这项工程包括长江中上游的江

西、湖北、湖南、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9 个省,145 个县的广大地区。

5 月 1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发布实施。

6 月 16 至 22 日 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指出:11 亿人民吃饭是个头等大事。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深化农村改革要继续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谓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落实好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

6 月 20 日 国产运 12 型飞机取得英国民航总局(CAA)颁发的型号合格证,这是中国民用飞机第一次取得国际型号合格证。

7 月 1 至 10 日 自 7 月 1 日北京时间零时(北京夏令时 7 月 1 日 1 时)起,到 7 月 10 日北京时间 24 时(北京夏令时 7 月 11 日 1 时)止,在中国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0 日,国家统计局陆续发表公报,公布了这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截止 1990 年 7 月 1 日,中国大陆总人口 113368 万人(男性 58495 万人,女性 54873 万人,男女之比为 106.6:100)。台湾省和福建省金门、马祖地区人口 20204880 人(1990 年 3 月数据);香港、澳门地区中国同胞人口为 613 万人(1989 年底数据)。三项相加全国总人口为 1160017381 人。大陆地区每 10 万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有 1422 人,但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仍达 1.8 亿人。

9 月 1 日 举世瞩目的欧亚第二大陆桥的组成部分之一,全长 460 公里的中国兰新铁路乌鲁木齐至中苏边境阿拉山口段建成通车。

9 月 27 日 中国独立设计制造的第一艘 4.4 万吨出口成品

油轮“路安号”在大连造船厂下水,它标志着中国造船工业已迈上独立设计建造当代国际水平船舶的新台阶。

10月5日 国务院已批复1989年至2000年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12年内中国森林覆盖率将由现在的12.98%提高到17.1%。

11月10至15日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决定自今年秋粮收购起,将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交售国家定购粮作为农民应尽义务,必须保证完成。

11月26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开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1年

1月18至23日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加以完善。

1月23日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新方案出台。其主要内容为: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基础上,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机制,使外贸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轨道。为此,将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外汇留成从按地区实行不同比例留成改为按商品大类实行统一比例留成;自1991年起取消国家对外贸易企业的亏损补贴,搞活外汇调剂等等。

2月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紧紧抓住提高效益这个中心,迅速扭转企业利润下降的局面;搞好生产、经营、科研单位的配合协调工作;计划、财税、金融、物资、商贸、物价等部门积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月初 国务院就调整粮食购销政策发出通知指出。自1991起,近两年将主要通过稳购、压销、调价、包干、缩小国家粮食收支缺口,逐步解决粮食购销价格倒挂,使粮食流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

道。1991至1992年度,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包干指标,按1990年度计划略加调整,继续执行两年。国家粮食定购继续实行奖售平价化肥、柴油和发放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在有条件的地区,对城镇居民口粮定量标准和工种粮,可借鉴一些地区的改革经验进行适当调整。自1991年开始,平价食油销售只保城镇居民定量人口食油和军用供油,其他用油改为议价供应或市场调节。

2月25日至3月1日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以及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重点围绕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研究深化改革的有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3月 继1988年北京市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批之后,国务院3月份又选定、批准和认定一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们分布在上海、武汉、南京、沈阳、大连、天津、西安、成都、威海、中山、长春、哈尔滨、长沙、福州、厦门、广州、深圳、海南、合肥、重庆、杭州、桂林、郑州、石家庄、兰州、济南等地。至此,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达27个。

5月29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并为此提出了11项政策措施。通知强调,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和骨干力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6月1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5月12日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并正式公布。《决定》的主要内容是:1.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人口计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党政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总负责。2. 坚决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依法管理计划生育。3. 抓重点,扎实稳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4. 齐抓共管,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

7月中旬 自中旬起,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投入资金,

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企业发展的“三角债”问题。7月19日，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强调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入手，解开“三角债”的债务链。8月31日至9月4日又召开了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9月20日，40个省、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共注入资金170亿元到5000多个有拖欠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上，这是对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连环清理的第一天，它表明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全面开始。

8月4日 全国重点建设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进建设项目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国内合资建设的项目要实行公有制的股份制，要设立董事会或管委会，对建设项目从前期工作开始，直到投产后的经营和投资回收进行全面负责、管理。

9月23至27日 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会议指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是：在坚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坚持贯彻《企业法》、健全内部领导体制、推动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投身国内外市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快技术进步、坚持从严治厂和加快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等8个方面下苦功夫，花大力气，特别是要做好经营机制的转换工作。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李鹏总理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了题为《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的讲话。这次会议还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即：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在巩固治理整顿成果和继续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争取在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益方面，取得比较明显的进展。

10月7日 第二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指出，明年起实行新房先卖后租，新房新租，有偿租房的改革。会议在总结了1988年1月全国第一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分阶段房改的“八五”目标，10年目标和远期目标。

12月3日至9日 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鹏总理在会上讲话提出了1992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即:继续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在巩固治理整顿的成果和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把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他还就1992年的计划工作强调说,要按照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总的原则,不断充实内容,加以具体化。计划主要是搞好宏观调控、总量的平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大的重复建设。

12月15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自1979年至1991年8月,中国已使用外商投资213亿美元,开业企业已有1.7万余家。

同日 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30万千瓦、位于浙江海盐县的秦山核电站正式发电并入华东电网(正式商业发电为1994年4月),中国大陆至此结束了“有核无能”的历史。

1992年

1月6日至10日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落实199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继续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为重点,讨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重要问题,部署1992年的各项改革工作。

2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体改委负责人就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回答了记者的询问。他指出: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贯彻落实《企业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以此为中心,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加大流通体制改革的力度;综合配套运用经济杠杆,强化间接调控;住房、社会保险和医疗制度改革要迈出较大步伐;搞好重大改革试点,为新体制和新机制的建立进行积极大胆的

探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2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作为中国国门第一站的海、陆、空一类口岸，全国已有154个对外开放，比1978年增加两倍。这些口岸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91年全国口岸完成外贸进出口运量2.34亿吨，为年计划的122%。比上年增长16.7%，检查出入境人员705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到1992年4月下旬我国又在中蒙、中越、中俄边界新开放一批口岸，使对外开放口岸总数达到162个，其中水运口岸89个，空运口岸31个，铁路口岸12个，公路口岸30个。

3月10日 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作出部署。新的核算体系是围绕国务院日前提出的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考核日常经济运行的代表性指标这一中心而建立的。新体系将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工具。这一体系将分两步实施建立，第一步，1992年先初步建立起新核算体系的基本框架，并相应改进经济评价考核指标，实现向新体系的初步过渡。第二步，力争到1995年编制出新体系的全部表式和帐户体系，实现向新体系的全面过渡。

3月18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决定自1992年4月1日起，适当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同价。在提高粮食统销价格的同时，国务院决定，按照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负担的原则，给城镇居民以适当补偿。

4月16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经过10余年的酝酿、探索和试点，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终于开始全面启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房改充满热情和企盼；各地政府积极制订方案，付诸实践。房改的大气候已在全国形成，1992年内各省将全面推行房改。

4月21日 李鹏总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出席经济

机制转换国际研讨会的代表。他在会见时谈话指出,转换经济机制,就是改革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并说,总的趋势是市场调节的比重将越来越大,直接的计划将越来越少;当然,政府要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他强调,检验改革的成败,要看实践的结果,要看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还强调,机制转换、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经验、乃至亚洲经济发展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

4月22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我国计划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以经济的自然联系和资源、区位优势互补为纽带的区域经济规划工作开始起步。据正在南宁考察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介绍,在90年代我国的长江沿岸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东北地区等七大区域带将构筑起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大框架。

4月25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年会在北京闭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在闭幕会上发言指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砸“三铁”(指铁工资、铁交椅、铁饭碗),一定要与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地进行改革,才能有效地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他还说,在其它方面机制的改革中,首先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积极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减少行政干预,给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还要加快各种市场的培育,以使企业转换机制后有市场可寻。并指出,要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还必须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4月30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到2月底,全国进行劳动人事、工资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企业已达43万户、职工1767万人。目前,大部分省市已把三项制度改革摆到重要位置,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

同日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目前我国社会劳动者人数

已达 5.8 亿,1991 年共创造社会财富 4 万多亿元。在社会劳动者中,城镇职工有 1.45 亿人,从事第三产业的有 1.1 亿人,乡镇企业人数超过 9600 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为 760 万人,上述四部分在社会劳动者中所占比重仍呈继续增加的趋向。

5 月 3 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与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立 40 周年庆祝活动的 360 多位海外经贸界人士会见时说,邓小平同志不久前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心思想是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江泽民还说,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把与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大大地推向前进。

5 月 6 日 江泽民总书记会见出席提高国营工业企业效益国际会议的中外代表时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进中国经济登上新台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他还指出,我们要努力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5 月 8 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国克里斯通能源公司在北京签订了南海万安北—21 合同区石油勘探合同,这是中国首次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石油勘探合同。

5 月 13 日 《人民日报》报道,自 1984 年江苏省首次出现工农业总产值超亿元的 6 个乡镇以来,到现在全国已出现 2093 个亿元乡镇,江苏省的亿元乡也已达 550 个。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亿元乡镇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提供的资料,亿元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3.77%,人口总数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的 6.5%,社会总产值占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26.8%,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28.86%。

同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旨在解决贫困县群众吃饭问题的“温

饱工程”在全国 15 个省份的 453 个贫困县实施以来,累计增产玉米 50 多亿公斤,使 1500 余万农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

6 月 1 日 《中央在京党政机关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正式执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目前起步阶段,以提高房租为主,同时有条件地向个人出售公有住房。合理调整公房租金包括 4 个方面的内容:1. 新房新租。2. 现住房分步提租,到 1994 年 1 月 1 日提高到成本价格 0.55 元 lm^2 。3. 收取租赁保证金。4. 超标加租。该方案的显著特点是属地化原则,房改办法和具体步骤都与北京市方案基本相同。房改起步阶段开始后,下一步将侧重于解决建立住房公积金和住房基金的问题。《方案》执行后,中央在京党政机关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都参加房改。这一方案的出台,将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进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深圳市首次从销售、纳税、盈利、进出口额等方面,推出工业、贸易、旅游等七大类 330 家企业的排序。这是国内第一个按照国际惯例对企业进行评价排序的城市,这既向世界展示了特区企业形象,也客观反映出该市产业结构的变动现状和发展趋势,评价出企业生产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可分析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效应,为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依据。

同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又一重大步骤的外汇期货交易,今天在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试行成功,当天成交 620 万美元。

6 月 3 日 国内最大的股份企业,拥有 8 亿元总股本的上海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行,随后又于 7 月 4 日正式揭牌开业。在此前后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首批 3.2 亿余元股票,其中 A 种股票 8000 多万元,B 种股票 2.4 亿余元。

6 月 6 日 《人民日报》报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计划和市场结合的运行机制逐步发展。近年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已达 5700 亿元,其中由国家计划直接安排的部分只占 1/5 左

右；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已缩小到 16%；国家定价的比重也不足 1/3。因此，计划工作在继续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制定贯彻产业政策等的同时，要更好地坚持宏观调控、微观放开，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6月7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房地产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正迅速崛起。目前，全国已有房地产开发公司 3700 家，经营公司 4700 家，房地产交易所 1500 家，职工 300 万人，固定资产达 90 亿元，年产值近千亿元。建设部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1981 年至 1990 年的十年间，全国城镇住房投资达 2600 亿元，是前 31 年总量的 4.6 倍；已建成投入使用的住房面积有 13 亿平方米，是前 31 年总量的 1.8 倍；建成 5 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 2500 多个，改造危旧房 1.2 亿平方米。据初步估算，全国城镇房地产投资达到 6000 亿元以上，开发的国有土地面积达 2.5 万平方公里，房屋总量有 66 亿平方米，已形成的房地产总值 38200 亿元，与 10 年前相比增加了近两倍。据统计，1990 年国家通过征收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契税、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向个人出售商品房和公房以及出让土地使用权等，国家总计获得直接收入 130 多亿元。专家认为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越来越显露出重要作用。预料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与此同时，一个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买卖、租赁、房地产抵押贷款、信托、拍卖等各种经济活动在内的房地产市场体系正在我国形成。

6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最近决定，在北京、沈阳、武汉、重庆、中山五个开发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以率先探索和实施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目前，各试点开发区正在优化内部机制，完善外部环境，把改革方案推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南京、成都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综合改革方案，也已经两委原则同意并备案。

6月11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为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

设的新形势,加强宏观调控和协调日常经济工作,国务院最近决定,撤销生产办公室,在该室基础上设立经济贸易办公室,由朱镕基副总理兼任经贸办主任。

6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将投入78亿元,从1992年开始在25个省、市、自治区逐步展开实施一项宏伟的生态经济建设计划——全国十年综合治理开发沙漠工程。这是我国继五大防护林生态建设工程之后,又一个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完成的环境治理和开发工程。

6月15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凭祥市、东兴镇和云南省的昆明市、畹町市、瑞丽县、河口县。南宁和昆明将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中部六省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研讨会”提出,由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组成中部六省,将按照“沿江沿河开发,双向开拓市场”的发展战略,走出一条内陆省份全方位开放,高起点发展的道路,把六省建成一个熔东西部特色为一炉、支撑和推动全国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综合经济区。

同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据国家体改委有关人士介绍,中国关于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一整套政策、法规已基本形成,全套政策法规由15个文件,分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是由5个部门联合签署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规定了股份制企业试点的目的、原则、要求、确立了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指导思想;第二层次是国家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它们是我国首次颁布的关于股份公司的法规性文件。第三层次是关于股份制企业的12个《暂行规定》,即关于宏观管理、会计制度、劳动工资管理、税收问题、审计、财务管理、物资供销、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登记、统计、股票发行与交易、新建项目股份制企业试点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始于80年代初期的中国

股份制企业,到1992年初已发展到3220家,特别是1992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更呈迅猛发展的势头,而上述股份制企业有关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就标志着中国股份制企业开始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6月17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一个具体体现的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该公司由国内现有11个录像机整机生产厂自愿认股,公司在分配上实行“四分法”,即产值、利润、税收、产品均按股份分成,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它的组建是国务院决定选择录像机这一“热点”产品,作为投资体制改革和电子工业结构调整突破口这一决策的具体实施。

6月18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我国最近又批准了长江沿岸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等5个内陆城市对外开放。至此,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

6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加快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决定从1992年起,在浙江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津市以及武汉、青岛、大连、沈阳、重庆等计划单列市,共9个省、区、市率先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具体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分工和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将各种收入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各部门不得干涉有关地方财政的收支事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财政部同意,不准擅自开减收增支的口子。收支基数确定后,除国务院有特殊规定者外,一律不作调整,地方财政多收可以多支出,少收则少支出。

6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随着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以依法实施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为交易方式的我国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近5年来,全国已有偿出让使用权的国有土地4.5万亩,地产收入超过31亿元人民币。

6月24至27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

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了会议，并就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及中共中央关于“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的决策发表了重要谈话。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地区，东起上海，西至重庆，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8 个省市，土地面积约 33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3.4%；人口约 1.6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4.7%。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 3436 亿元，占全国的 19.4%。加快这一地区的开发开放，对于推动整个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加快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建立，胜利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听取了会议代表就如何规划好沿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整体优势和总体优势提出的建议之后，江泽民发表讲话。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开发开放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战略意义，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方针，要抓住重点，统筹兼顾，搞好联合，发挥整体优势。李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是贯彻落实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向前推进，这是摆在全党与全国人民面前的战略任务。他提出，要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和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推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

6 月 28 日 中国工商总局对在汕头特区创办的“泰华国际银行”进行验资后正式发给该行营业执照。这家银行是于 6 月 26 日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总行。

6 月 30 日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的规定，并经国家能源部授权批准，在北京向各国石油公司驻华代表机构发布合作勘探海洋石油的第四轮招标通告，即向各国石油公司开放我国东海近海部分海域。这是中国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加快海洋石油工业发展、加快改

革开放的又一有力举措。至此，从渤海湾到北部湾，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全部进入开放行列。

7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建立了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工作的日常管理职权。办公会议由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负责召集，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经贸办、经贸部、税务总局、外汇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10个部委的负责同志组成，办事机构设在人民银行。

同日 公安部决定将公路沿线的公安交通检查站一律撤除，并要求各地于8月1日前全部完成。这是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改革，也是公安机关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7月4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最近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扩大开放的报告。对此，国务院专门致函批复，并给予新疆相应的类似沿海乃至特区的八条优惠政策与措施。主要战略构想是——通过贯彻“全方位开放、向西倾斜”和“内联外引，东联西出”的方针，形成以乌鲁木齐为龙头，以伊宁、博乐、塔城等市为窗口，以沿周边国家开放带为前沿，以铁路沿线开放为依托，以东部省区为后盾，覆盖全区的开放网络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合作、多元化市场的开放格局，使新疆成为东联西出的枢纽和连结东亚与中亚、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上的活跃区。

7月13日 劳动部召开“贯彻国务院通知，进一步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电话会议。劳动部长阮崇武在会上指出，在深化改革中，我国的劳动就业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培育市场机制，逐步建立起企业择优用人，个人竞争就业，社会提供服务，城乡协调发展的就业新格局。他还针对“八五”期间除城镇需要安排就业3000万劳动力外，企业和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严峻就业

形势,强调:今后必须改变国家包揽就业的做法,大力发展劳务市场,开拓劳动就业的新格局。劳动部门关键是做好服务工作,逐步建立完整的就业服务体系。职业介绍、就业训练、待业保险、生产自救等项事业,是配合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劳动部门要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扩大实施范围。

7月23日 李鹏总理签署第10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决定将业已经6月30日国务院第106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予以公布施行。

7月23日至29日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要全面加快财政改革步伐,近期出台六项改革措施,即:加速推行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财力划分关系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规范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利润分配关系的“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分利”办法,以及复式预算制度、税收制度、财务与会计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

7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加快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为国民经济加速发展服务,国家税务局将出台十项措施。十项措施主要有:调并一些税种,实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加快税收征管立法;改进税收征管方式;建议国务院在适当时机停止批发扣税,并相应建立对个体税收的控管新机制;适当调整税收检查站;改进出口退税管理,保护外贸企业合法经营;调整部分税收管理权限,给地方一定自主权;税务机关转变作风,增进服务意识,继续深入搞好促产增收。

7月26日至29日 由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西藏、重庆、成都组成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在昆明举行了第九次会议。五省区七方商定,在扩大对外开放和联合协作中,今后要围绕共同开拓东南亚、南亚市场这个重点,抓好交通、口岸和通信设施的建设,力争南(宁)昆(明)铁路提前两年完工。

7月29日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在北京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又有26个县市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至此,我国已有825

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

8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工商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撤除未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公路检查站，以利物资和商品流通。

8月3至7日 全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和研究如何贯彻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会议总结了我国在深化改革方面的新进展。即：一是落实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20条政策措施，随着有关政策的落实，1992年可使企业增加留用资金80亿元。二是贯彻落实《企业法》，制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三是各地进行了多种形式企业改革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试点企业已有8469户。目前多数试点企业发展健康，为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经验。

8月8日 深圳大胆打破传统体制束缚，率先向社会公开拍卖高新技术成果。这次拍卖是深圳特区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探索用市场机制激励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深圳这次拍卖的高新科技成果为334项，拍卖起价合计为2430万元人民币，大部分项目初期投资少，见效快，具有投入产出比高的特点。

8月10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美将合作勘探中国洞庭湖区的油气资源。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外资合作勘探内湖地区的油气资源。

8月11日 我国第一座自营勘探开发的海上气田——锦州20—2凝析气田建成投产。该气田工程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开发，总投资24亿人民币。该气田日产天然气150万立方米，轻质油413.6吨，系我国“八五”期间重点工程项目。

8月12日 我国又有4个县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至此，我国已有829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这次对外国人开放的县是吉林省的镇赉县、通榆县、长岭县和乾安县。

8月13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发出通知,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省府)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地区省会(省府)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至此,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已初步形成。

同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我国内陆最大港口武汉港近日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向外轮开放。至此长江对外开放港口增加到9个。业已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态势。9个港口是:上海港、南通港、张家港、镇江港、南京港、江阴港、芜湖港、九江港和武汉港。1991年这9个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5亿吨,约占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的80%。

8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交通部负责人日前宣布,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运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交通部提出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其主要内容为:1、将直属水运企业按计划运输的物资分为计划运输和市场调节两部分。2、改革我国国际海运业管理,凡有经营管理能力的国际船舶公司均可经营远洋航线。允许外国船舶公司在我境内办独资或合资船务企业。3、适度开放国内运输市场。鼓励外商与中方合资或独资从事运输建设和经营。

同日 海南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的重大举措付诸实施,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北京签字。海南省有偿出让的这块土地是目前中国政府批准的最大的外商投资开发经营的成片土地。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在15年中将投入180亿元港币用于洋浦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将达1300多亿元港币。15年以后,这片乱石遍地的荒凉之地将出现一个发达的工业区。有偿出让洋浦土地使用权,引进外资成片开发,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

8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深圳大胆探索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和增值的路子。1987年7月,深圳率先

在全国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把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一般经济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权交给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逐步通过向市属国有企业派资产代表董事长等形式,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代表为核心,以经营者为主体,以党的领导为保证或以股东代表为监督的新的运行机制。从而大大加强了对资产运营过程中的监督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与此同时,深圳的优胜劣汰机制也不断完善,推动了国有资产的重组和优化。

8月29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国内首例拍卖破产合资企业在天津举行。由原天津家用电器工业公司、中国银行天津信托咨询公司、澳大利亚辛普森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建和经营的天津辛普森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于1991年8月1日被宣布破产。1992年8月29日,该公司被最大的债权人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依法收买。

8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最早出现的地方自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国务院于最近批准成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该区规划面积为10平方公里,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优惠政策。

8月31日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全国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座谈会上宣布,我国投资建设领域将全面推行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建设项目业主责任制。他要求,今后凡新开工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原则上都要实行项目业主责任制,使我国的投资效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他还说推行项目业主责任制,不仅是一种新的项目组织管理形式,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投资建设领域实际运行的重要基础。各级领导要把建立此项制度作为投资建设领域改革与发展的大事来抓。

9月1日 我国价格改革迈出突破性步伐,自即日起取消原油、成品油、钢材、纯碱等计划外生产资料全国统一最高出厂或销售限价。据统计,在我国目前实行的价格修订目录中,国家物价局

和国家有关部门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已由 1991 年底的 737 种,减少到 89 种。其中,下放给企业定价的有原料油、煤、部分钢材、绝大部分机电产品等 571 种,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部门管理的有 22 种。采取上述措施,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有利于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朝着解决价格“双轨制”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使得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价格方面处在一个起跑线上,从而有利于展开公平竞争,有利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发展。

9月3日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在北京宣布,未来 10 年,我国将通过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利用外资,尽快提高我国旅游产品的档次,这是我国旅游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我国旅游产品结构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使我国跻身世界旅游大国的重要部署。他还宣布了对国家旅游度假区投资企业的 8 条优惠政策。据悉,目前已有广州的南湖、海南的三亚、江苏的太湖等 26 个地方申报兴办国家旅游度假区。

9月14日 中国专利局局长高卢麟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宣布:自 1993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将正式实施修改后的专利法。修改后的新专利法保护范围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标准,为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消除了一个障碍。高卢麟透露,中国专利局正在申请加入 PCP(国际专利合作条约),如获批准,中国就可以受理中文和英文的国际专利申请,中国还将作为国际检索局和初审局对申请进行检索和审查,这也将为港、澳、台和周边国家申请国际专利创造有利条件。据悉,专利法实施细则将与修改后的专利法同步施行。中国专利制度的成功运行就使中国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世界五大专利国的行列。

9月16日 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办的银行——华夏银行即日起在北京开业。该行由首钢总公司开办,经营范围包括人民币、外币、外汇、信贷、信托和租赁等业务。目前,该行在北京石景山设立了 3 个储蓄所,以后还将在外省市及国外设立分所。行长则由首钢

财务部长担任。

9月22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我国将组建三个大的全国性证券公司,这是国家为培育和完善我国统一的证券市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即将组建的三大证券公司是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的股份制、市场型的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发起并入股组建,注册资本均为10亿元人民币。其中,华夏证券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牵头筹建,总部设在北京;国泰证券公司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牵头组建,总部设在上海;南方证券公司由中国农业银行领头筹办,总部设在深圳。三大公司随即分别在京、沪、深分别成立,它们均实行独立核算、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方针,将主要致力于开拓中国证券市场业务,扩大融资渠道,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其业务范围包括证券买卖、企业资信评估等,经人民银行批准后,在适当时候还将进入国际证券市场。

9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计委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培育市场已第一次被列为我国计划部门的一项主要职责。用28个字概括这一职责就是:研究战略、制定规划、综合平衡、培育市场、重点建设、宏观调控、协调服务。

9月28日 我国目前最大集装箱装卸桥在天津港集装箱公司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该装卸桥起重负荷40.5吨、起升高度为30米,外伸距为44米。它的建成使用结束了我国不能接卸第四代3500箱位大型国际集装箱船舶的历史,也是我国集装箱运输中转枢纽港,集中优势发展强项,大力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而达成的又一技术突破。

同日 中国大陆首家由农民股份制经营的航空公司在烟台正式营业。该公司由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东陌堂村农工商总公司与中国长城航空公司合资经营,目前通过租赁和购买方式共拥有10余架各种型号飞机,主要经营中短程客货航空运输业务。首家农民

航空公司的出现,是胶东半岛富裕起来的农民,继经营民办铁路、海运运输业务之后的又一创举,是胶东半岛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又一新事物。

10月3日 首届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字画拍卖会在深圳举行,共成交画83幅,成交总额达226万多元,显示出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

10月5日 国家科委、人事部、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联合发布了《全民所有制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暂行办法》,对科研机构实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作了具体规定。科研机构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是在坚持科研机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合同的形式,明确国家和科研机构的责权利关系,使科研机构做到自主研究、开发和经营管理。

10月9日 中国华晨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这是中国公司的股票首次进入美国市场。该公司股票本次在美发售量为500万股(普通股票,每股16美元),但订购量却高达6000万股,是预定发行量的12倍,充分反映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信心与兴趣。

10月11至14日 “92北京国际拍卖会”在北京举行,本次拍卖会共有2020件套商品参加拍卖,拍卖成交920件套,成交率45%,成交金额335万美元。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拍卖活动。

10月15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统计资料指出,改革开放14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生机最旺盛、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1年的71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316元增加到1544元。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平均为175元,到1991年提高到803元。大部分居民家庭的饮食消费正在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到1991年底,城镇居民家庭中“六大

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收音机、照相机)的普及程度已达到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城镇住宅建设也迅速发展,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已由过去的仅求栖身转变为追求舒适宽敞。

10月17日 中国首家资源综合开发区——攀(枝花)西资源综合开发区正式建立。攀西地区是中国资源最富集、发展潜力最大区域之一,尤以钒钛磁铁矿储量而驰名世界。该资源综合开发区面积2.96万平方公里,人口288万。

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 组成人员考析

钱 听 涛

从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至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路线统治全党、党经历了严峻考验的四年。这期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究竟叫什么名称、由哪些人员组成,在许多党史书刊中或语焉不详、或互有出入。弄清这方面史实对研究党的组织史是不可缺少的。以下,笔者根据近年来所接触到的史料,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四年间的中央领导机构——重点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也涉及中央政治局——及其组成成员作一些考证。对存疑的问题,也予以注明,以就正于党史界同行。

一、关于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的名称

六大通过的党章第 40 条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①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就是中央最高领导机构、最高领导人则称“主席”。六届四中全会后仍然如此。但习惯上又把“主席”称为总书记,因为四大、五大时均曾称为总书记,甚至党的文件中也如此使用。如向忠发被捕后,1931 年 6 月 24 日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中称“本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6 月版,第 43 页。

党总书记向忠发”^①。虽然如此,这一阶段中央领导机构中从未出现“书记处”的名称。

“书记处”究竟何时出现,其职权是什么,迄无定论。陈云同志1982年12月28日《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中称“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立书记处,也没有常委”。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央虽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却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②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档案馆李云龙同志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会议记录后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设立书记处。如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政治局和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此外,新发现的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也提及此事,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致共产国际电及同年12月12日国际对此电之复电均提到将在五中全会设立书记处^③。我认为五中全会设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因此在习惯称呼中常把书记处和常委会混用,其成员有时称书记,有时称常委。如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称:“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④。遵义会议召开后,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电》下面的署名又是“书记处”^⑤。陈云同志所以会产生前述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年谱》中称:

① 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第244页注文。

②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73、74页。

③ 李云龙:《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何时设立的?》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

④ 《遵义会议文献》,第42、33页。

⑤ 《遵义会议文献》,第73、74页。

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竟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政治局常委，仅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作军事顾问的李德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却在博古支持下取得了军事指挥上的决策权，早已超过顾问的职权范围了。这种书记处、常委会混用称谓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所作《党纪党法的报告》中，提出把“党章的常委改为书记处”。此后就只用书记处而不用常委会名义了，其成员也只称书记而不称常委。

至于这个最高领导机构的第一把手的名称如上所述，在六大以后正式称主席，习惯上甚至行文时亦称总书记。但在1931年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被杀后，中央就再未设总书记。一些回忆文章称曾任此职的博古、张闻天是总书记是不确切的。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9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的第五部分对此已详加论证。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所作的党史报告中讲到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现在党史界已取得共识，都采用陈云同志《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的“负总的责任”或“负总责”这一提法。

二、关于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的成员

据现有资料，中央核心领导人员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共经历五次变化。

（一）1931年1月10日至3月28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称：1月7日召开了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5个为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这一段叙述不大完整。六届四中全会

改选的中央政治局是在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基础上进行的。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是：

正式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候补委员：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六届四中全会退出政治局的是正式委员瞿秋白、李立三、候补委员李维汉。新选的正式委员是陈郁、任弼时、王明。由候补委员递升为正式委员的是徐锡根、卢福坦。由正式委员降为候补委员的是关向应。新选出的候补委员是刘少奇、王克全。至此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是：

正式委员：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

候补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①。

政治局常委，六届三中全会时是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六届四中全会时改为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但因四中全会是由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操纵的，因此，1月1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委员分工及中央常委人选时，米夫即提出王明应担任中央候补常委。但是周恩来提出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这次会议的最后结果王明未能进入中央常委^②。会后王明是怎样在米夫支持下仍旧进入了常委并实际操纵了中央大权的，现在无确切的第一手史料。但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的确讲到在四中全会后不久王明就成为中央常委。

（二）1931年3月28日至9月中旬

四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派中央常委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去担任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第181页。

^②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201页、208页。

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张国焘走后的中央常委人选问题。《周恩来年谱》称：“会议决定常委由五人组成：向忠发、罗登贤，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委参谋长参加会议。”^① 如何理解这一档案记载？常委是哪五人？我认为常委不可能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和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因为除向忠发、罗登贤（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总党团负责人）外，周恩来、王明还在上海、张国焘虽到鄂豫皖去了，但常委职务并未免去，因此当时常委五人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罗登贤。至于康生、张闻天和聂荣臻四中全会时他们还不是中央委员，这里谈他们“参加会议”，是列席会议的意思。如张闻天是四中全会结束后于1931年2月中旬回国的，因原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被派赴鄂豫皖苏区，中央即任命张闻天接替此职，但同时可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②。

3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后中央发生两起严重的政治事件：4月24日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央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叛变，虽然由于周恩来等采取紧急果断措施使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但是一度工作陷于停顿，政治局和常委会议都难以举行。6月22日隐蔽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擅自外出被捕叛变，不久被杀。此后王明基本上不工作了，周恩来工作也更加困难。鉴于上年10月中央已决定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就要准备前去；王明则得到共产国际同意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余下惟一个常委罗登贤也决定到满洲省委任中央代表，9月即赴东北。政治局委员中的其他成员：徐锡根因追随罗章龙反对四中全会，1931年1月20日即与罗章龙、余飞一起被中央撤销担任的全总党团领导工作，已无法再参加政治局工作。陈郁也因反对四

^①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201页、208页。

^② 《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19页。

中全会，参加了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虽不久即承认错误，但也在当年6月与李维汉一起被派到苏联学习^①。项英在四中全会前夕就被派赴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也于1931年3月率领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另外两个成员是王稼祥、顾作霖）。政治局正式委员中只留下一个卢福坦在上海。他原任河南省委书记，1931年2月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②。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除顾顺章叛变外，毛泽东一直在中央苏区。刘少奇1930年夏即赴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四中全会未参加。1931年秋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长和全总组织部长，但他一贯对王明路线持不同看法。王克全在江苏省委内部追随罗章龙成立“第二省委”，已于1931年1月27日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1月30日又被开除党籍。关向应则因顾顺章告密而于4月被捕，直到同年12月才被党营救出狱并派赴湘鄂西苏区。最后一个温裕成，四中全会前即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3月因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及贪污等问题，先后受到严重警告和撤职处分并被派往鄂豫皖苏区^③。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时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已无法进行工作。

（三）1931年9月中旬至1933年1月

在上述情况下，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继续领导全党工作。当时留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只有正式委员卢福坦、候补委员刘少奇两人。刘少奇又对左倾路线持批评态度，因此王明只好在政治局以外物色人选，他主要是找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博古。据博古1943年11月13日在延安整风中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一个酒店开会，决定博古当临时中央局书记，实权是总书记、但并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1页。

② 陆友山：《卢福坦其人》，《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第244页。

③ 《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59页。

无总书记名义。其他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中央组织部长康生以及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中方副校长、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一贯积极追随王明的李竹声(这三个人当时和博古一样都不是中央委员),还有四中全会后当选的中央委员、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顾顺章叛变后积极协助周恩来处理善后事宜的陈云,再加上卢福坦共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得到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①。中央政治局还设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成立时间是1931年9月下旬。

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共历时1年3个月。在此期间王明于1931年10月18日离沪,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周恩来也于同年12月上旬离沪,年底到达瑞金。卢福坦于1932年3月因工作中犯错误离开常委岗位,由陈云递补为常委^②。卢于1932年底或1933年初被捕叛变。徐锡根是原四中全会政治局候补委员,虽被撤销全总党团领导工作,但还在党内。他在1932年也被捕叛变。刘少奇于1932年3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撤销中央职工部长职务,调任上海市工联会党团书记,同年冬赴中央苏区。这一时期敌人加紧了对我地下中央机关的破坏。1932年9月全总代理委员长余飞(俞慕怀)被捕叛变,10月负责全总工作被临时中央派赴天津的黄平在津被捕叛变。特别是1932年10月团中央机关的大破坏,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被捕叛变,直接威胁到曾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博古、张闻天的安全。在请示共产国际后,决定临时中央迁中央苏区。常委张闻天1932年底离沪,博古、陈云随后亦离沪,并于1933年1月先后到达瑞金。留下两个政治局委员李竹声、康生在上海组成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由李竹声任书记。康生于1933年7月

^① 《张闻天传》,第131页。根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认为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也是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此说待考。

^② 《张闻天传》,第131页,《卢福坦其人》一文则称在9月。

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竹声及其继任人盛忠亮等均在后来相继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直到1935年夏才完全停止工作。

(四)1933年1月至1934年1月

博古到瑞金后随即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从上海去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原在苏区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即在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是否到瑞金参加会议不详。其他未参加会议的中央局成员还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会议仍推举博古负总责。这个机构开始仍叫苏区中央局，约在六月改称中共中央局，其成员就是上述12人。博古、张闻天等为常委^①。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即不再存在。在此之前，1933年4月任弼时已调任湘赣省委书记赴永新，所遗中央局党校校长一职由张闻天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由李维汉接任；同月顾作霖调任闽赣省委书记，所遗少共中央局书记一职由何凯丰接任。毛泽东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被剥夺了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当时最紧迫的军事指挥权原由在前方的红军兼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责。但1933年5月8日苏区中央局建议、中央政府决定将中革军委迁至瑞金，增补项英、博古为委员、项英任代主席、前方另建红军总司令部，周恩来、朱德虽仍为总政委、总司令，但一切听命于项英、博古。1933年李德到瑞金后，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都交给了李德。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五)1934年1月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在瑞金召开五中全会。全会增选中央委员王稼

^① 综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1898—1949）》、《朱德年谱》、《朱德传》、《任弼时年谱》，其中有矛盾的，从多数说法为准。周恩来、陈云在上海时为常委，这时是否仍是常委无确切史料。

祥、何凯丰、中央候补委员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总政副主任)、李富春(江西省委书记)、李维汉、孔原(中央驻北方代表)。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候补委员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何凯丰。选出中央书记处(常委会),成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是否常委待考,由博古负总责^①。

1934年夏,长征前夕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从此成为最高领导核心。

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增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1935年2月5日前后讨论常委分工时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在此之前1月18日遵义会议刚结束政治局开会时,即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此后3月4日中革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1日左右又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这表明毛泽东在实际上已成为新的中央领导的核心。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这一变化对其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而深远的影响。

^① 李云龙:《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何时设立的?》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反腐化斗争

叶 成 林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及其主要机关的驻地,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政府和党的各级组织把“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①作为施政目标之一,采取思想教育、干部管理、制度规范、法律禁止和多方监督等措施,始终不渝地抓反腐化斗争,使边区成为全国廉洁政治的楷模。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反腐化斗争及其若干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无疑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陕甘宁边区开展反腐化斗争的主要做法有:

一、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公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形成防腐化的内在自律机制。

(一)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抵御国民党“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②。党和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各级公务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民的翻身与解放,为了“增进人民福利”^③,而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对个别人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的腐化思想则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二)进行艰苦奋斗传统教育,克服剥削阶级的升官发财享乐思想。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后,陕甘宁边区的环境和干部战士的生活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2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有了一定的改善。于是，“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奋斗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①开始滋生。对此，边区党和政府有针对性地用红军时期“豆苗野菜清水煮着吃得津津有味”等艰苦奋斗的传统，来“教育新党员，提醒老党员”^②。特别是教育从事经济工作和合作社工作的党员、干部，要时刻想着群众的利益，不能成为剥削阶级升官发财享乐思想的俘虏。

（三）要求党员和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形成清正廉洁的风气。如1941年的《征粮工作团工作纲要》中要求：“党政工作人员起模范作用——地方干部应当影响自己的家庭、亲戚踊跃应征，给群众作模范”^③。边区曾涌现了李丕义、王怀仁等一批“勤劳奉公，公而忘私”、“为人正直、办事公平、从来不要私情”的模范干部^④。边区政府及时发现这些廉洁奉公的典型，通过一定的途径表彰他们的事迹，宣传他们的革命精神，号召边区全体公务人员向他们学习，形成廉洁奉公、克勤克俭的良好风气。

这些教育，使“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⑤成为边区公务人员的共识，也成为他们的道德信条，从而造成一种抑制腐化思想和腐化行为发生的内在约束。

二、严格干部管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防止腐化的重要环节。

边区在廉政建设中，注意干部队伍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从干部的选拔抓起。边区政府《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明确规定，干部管理包括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免调动、考绩奖惩、待遇保健等方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页。

② 《谢觉哉文集》，第370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477页。

④ 同上，第6辑，第397—39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边区政府规定,选拔任用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必须符合下列标准:“一、拥护并忠实于边区的施政纲领;二、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三、关心群众利益;四、积极负责,廉洁奉公”。而对“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行为者,不得任用^①。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不仅发挥组织部门的作用,也注意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1941年边区自上而下进行干部改选时,就让群众参与,把那些廉洁奉公者选进政府机关,淘汰相形见绌者,使干部队伍素质大大改善。

边区政府还制定了《政纪总则草案》和《政务人员公约》,要求公务人员为民表率,在勤政廉洁方面遵守“八不”纪律:“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②。

在生活方面,边区在初期对公务人员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1.4斤小米、7分钱菜金,每月1元至5元的津贴。从1942年起,边区对公务人员又逐步改行薪俸制。但不论改行何种制度,边区都要求公务人员“努力节约”,“除招待外宾外,一切伙食、节日、纪念、结婚等等,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宴会”^③。

边区还运用奖惩机制,激励公务人员奉公守法,保持清正廉洁;通过精兵简政等举措来淘汰不良分子,纯洁干部队伍。

三、逐步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和规程,规范各类公务人员的行为。

贪污腐化行为最容易发生在那些与财经相关的部门。陕甘宁边区在制度建设中突出抓了财经制度的建立健全。1939年6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要求“特别注意认真的严格的建立财政经济的制度,发扬艰苦的作风,厉行

^① 《陕甘宁革命根据在史料选辑》第1辑,第304页。

^② 同上,第316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466页。

节省。”^① 在中央的领导下边区政府根据财经工作的特点,严格划分收入、支出、保管和审核四大系统,使其互相制约,收钱者不用钱,用钱者不收钱。边区政府要求在边区的任何机关、部队、团体“绝对不许再有自收自用、假造帐簿、任意募捐、贪污浪费等情事发生”^②,使不法之徒没有可乘之机。

边区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制定有《各县市地方财政收入暂行章程》等;在金库管理方面制定了《边区财政厅金库条例》;在预算决算方面有《边区暂行预算章程(草案)》、《边区暂行决算章程》;对公粮的征收、管理制定有《征收救国公粮条例》、《救国公粮保管分配条例》等;对国有财产管理制定了《公产管理办法》、《各级仓库管理办法》、《边区公草管理办法》等;关于税收管理方面有《税务总局办事细则》、《各级税务机关税款报解规则》、《税警人员办事程序》等。还针对工作移交容易发生舞弊的情况,制定了《政务人员交代条例》、《税务人员移交规则》、《粮食工作人员移交规则》等。其中特别规定:“交代清册如有虚构或漏报情事,前后任均得受行政处分”,“如前后任或监交人员通同作弊时,得依法惩办之。”^③

各类制度、规章的制定,规范了各类公务人员的行为,防范了贪污、浪费和各种舞弊行为的发生。

四、制定法律,严厉惩治不法分子,为防止腐化提供法律保障。

边区政府对那些蔑视制度、破坏纪律而又不思悔改的不法分子,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予以制裁。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文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一)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78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90页。

③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288页。

营利者；(七)违法收募捐税者；(八)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财物者。”

《条例》在量刑方面规定：“(一)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除了判刑，还要“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分，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①

对其他腐败罪行，边区政府规定也要一体惩处。如《三十年征收救国公粮条例》规定：公务人员如有“徇情袒私致有幸免，或冤屈情事经告发查有实据者，处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之徒刑”；“私自增减公粮数目，经告发查有实据者，处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之徒刑。”^②

边区政府针对腐化行为的执法是十分严厉的，尤其对“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③。董必武解释说：“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④ 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贸易局副局长和张家畔税务局局长的肖玉璧，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学员案发后，曾有人以黄克功过去功劳大，现在又是用人之际而提议将其免于死刑。但法律是无情的，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毛泽东等的过问下，黄最终被处以极刑。以上案件的处理，从反面极为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的边区干部群众。

五、建立监督机制，保证制度的贯彻、法律的实施，有效抑制腐

① 《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8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91—92页。

④ 《董必武选集》，第58—59页。

败行为的滋生。

1945年,毛泽东对访问延安的黄炎培说,边区政府防止环境渐好,精神渐下进而惰性发作的成功经验是,让人民监督政府。人民群众对边区政府的监督,主要是人民选举之各级参议会的监督和群众的直接监督,政府机关内部的监督也是监督的重要方面。

边区各级参议会的参议员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参议会是反映民意的机关,它“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①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员”的职权^②,边区政府也希望各级参议会参议员负起责任,行使职权,“对干部中的贪污现象、非法行为、以及把持包办一意孤行的作风,分别轻重给以批评、弹劾。”^③1942年绥德县辛店二乡乡长范存金贪污腐化、征粮舞弊,被乡参议会罢免。群众高兴地说:“参议会开美了,真真地为老乡作了主了。”^④

政府机关的内部监督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上级对下级的工作检查监督。如边区财政厅巡视团的任务包括:“纠正擅动公款、税款、乱借、滥支的弊病”并有“揭发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及纠正违反政府财政政策法令之权”^⑤;二是由组织部门主持对干部的审查工作;三是开民主生活会,由公务人员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实行自我监督;四是听取在政府机关中非党成员的意见。边区政府的组成成分为“三三”制构成,即政府中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1/3,故认真听取非党成员的意见对改进边区的工作,防止公务人员腐化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边区,人民群众在利益受到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

①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7日。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57页。

③ 同上,第58辑,第312—313页。

④ 《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0日。

⑤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第2辑,第520—521页。

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①。为了保护群众行使这一权利，边区政府于1942年专门发出《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的命令》，要求办案人员“不得有丝毫袒护或者敷衍了事的情形”^②。有些地方，群众则自动起来与贪污腐化分子作斗争。如1945年夏，清涧县解家沟区一乡群众就自动起来揭发乡长贪污和区长包庇的情事，得到县政府支持后，区长被罢免，乡长贺思斌被判处3年徒刑。这一事件及其解决在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极大地促进了干部中良好作风的树立。

边区政府坚持不懈地抓反腐化斗争，不仅克服了各种腐败现象，实现了施政纲领，而且培养了艰苦奋斗，蓬勃向上的延安精神，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廉政建设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310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第232页。